



樊仲雲編譯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新生命書局發行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目次

一 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 E. Varga (1)

一 農業問題與中國封建制度之特質

二 進向資本主義的轉換過程

三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中國國家之瓦解

四 由資本主義造成農民層之分解

五 由資本主義造成都市手工業之衰亡

六 勞動者階級之狀態

七 中國匯兌市場之紊亂

八 客觀的革命的情勢與今後發展之希望

二 對中國作如是觀…………… 長谷川如是閑 (四 九)

三 謎樣的中國問題…………… 山川菊榮 (八 七)

一 中國人的要求

二 最近中國經濟界的發達

三 國民運動與列強之利害

四 中國革命之必然性與其世界的意義

四 現代中國論……………稻垣直文(一〇七)

一 緒言

二 中國政治的統制形式之發展

三 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與集權政治

四 現代中國經濟的構造

五 中國社會推移的方向

五 現代國家與中國革命……………長谷川如是閑(一三五)

六 中國的農業經濟……………L. Madjar (一六〇)

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

E. Varga

今日的世界，不論那一國要像中國樣滿是多種多樣的矛盾情形的，怕一國也沒有罷。所以要理解事態的推移而加以綜合，是非常的困難。不過我們相信在一般的情形上可以把全部過程像下面似的總括起來。

中國現今正是在以單純再生產為基礎（即馬克斯所謂「亞洲的生產方法」），由內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通過未完成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階段，而進向勞動者與農民的執政之革命的變動時期。

言其特質，有如下述。即由中國經濟之特殊構造，資本主義不但破壞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且若無生產這東西之破滅的沒落，及伴此而生的一切勞動者之一般的窮乏化，不能自己完成。所以在向資本主義的社會為全輻的轉換以前，早已是開始了革命。這革命，便是勞動者農民的反叛，是反抗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

式，同時也是反抗新資本主義的（國內的及帝國主義的）榨取形式的革命，是必然的須對地主，軍閥，中國及外國資產階級，即支配階級之各層，取反抗的鬥爭的革命。

於此，我們想對此極複雜的中國發展上的若干主要契機，加以一番檢討，而由此以引出對於下之主要問題的結論。

在中國的資產階級，農業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果有解決的可能性沒有呢？

這個問題，由我們之所見，實是關係中國革命今後的運命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的檢討，由我們之所見，應為仔細分析中國革命之諸問題的根柢。事情倘是這樣，資產階級對於農業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能夠解決的，那末，中國工業的無產階級，要想把巨大的農民大眾引入自己方面，就難免失敗了。但是，若沒有農民階級的援助——況且還要與農民層相鬥爭——則數量弱小的工業無產階級，要想打倒（中國的及外國的）資產階級與軍閥的支配，於事為不可能。所以說起來，農業問題實為中國這樣情勢的核心問題。

農業問題之研究，與一切中國問題之研究同樣，當面的便是許多障礙，如語學素養的缺乏，有用的統計資料之無有，而中國文化之表現形式又與歐洲的非常不同等。所以對於所有我們的論述，我們應加以非常的斟酌始可。

一 農業問題與中國封建制度之特質

我們由農業問題之理解，知道要特別引徵中國事情，則應用所謂封建制度的表現，實是害多於利。因為這種表現雖以中國現實之某種的事實為正當特徵，然而此表現的應用却使許多人陷於謬誤，把單純的歐洲封建制度之一切要素，以為中國也有，而自假定起這樣的前提來，這決不是與現實相一致的，並且還是產生許多混亂的。

所謂封建制度之表現，只有在與『前資本主義的』同其意義而應用時，我們可以以中國社會的構造喚作封建制度。（於此，我們要把向資本主義以轉換的要素——這是在歐洲封建制度，亦向在一定的發展階段——暫置不問。）其消極的要

素，即前資本主義的性質，這是歐洲封建制度與中國之社會構造相共通的。但此共通的事物，在其內部實大有差別。我們以下就要來略述此最重要的事物。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土地支配制與農奴制。土地支配制是由君主承受領地代代世襲的。但其所得的數量不是由於領地的面積，而是由農奴之人數而定。所以其對於土地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勞動力的支配則纔是決定的。所以其所登錄的不是領地的畝數，而為人的口數——當向資本主義以轉換之初時——以人口之顯著增加——使所謂土地的生產要素優於所謂勞動力的生產要素（故在英國與普魯士等有令農民退去的命令）。

但在中國却完全不同。為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雖曾有成立，但為昔日之諸農業革命早已破壞完了。（為一切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雖曾有破壞，而勝於歐洲工場手工業時代之技術的技術雖曾有存在，何以獨特的土著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却絲毫沒有發展？何以此種發展始終不能超於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主義的階段——即與封建制度能相調和的？這是另外的問題，

我們不想在這裏加以討論)。所以對於勞動力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土地的支配，則在中國本土自遠昔以來即是決定的。不過我們所注重的是指中國本土而言，若滿洲蒙古西藏等住民稀薄之邊地，則不能爲準。原來中國人口六分之五是從古即密集於此領土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生活的。故在此決定的地域，像歐洲那樣封建制度的土地分配制與農奴制是早就已不存在了的（或者這樣的制度是大概不會有過的）。

爲免去誤解與曲解起見，一言以蔽之，中國雖有大土地所有，但却無土地支配制。（且即就中國的大土地所有言，其土地面積也不如歐洲樣的是幾萬頃，而至多之數只爲數百頃，且大多數還不過數十頃。這樣的事情，與經濟的真正之大土地所有，原毫無妨礙。因爲中國是有一年三回或四回的收穫的）。固然，有以地租收入以生活的階級，但此地租就其許多還是現物地租以言，這也不是固有之封建的支配地租。且中國之土地所有，常有區分不絕的以貨幣爲賣買。中國收納地租的階級不如歐洲封建制度土地支配貴族那樣的特權階級，而與商人階級及高利貸階級有最密

接的融合。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之所得，與爲國用而聚集起來的財產，自古以來即可投於土地所有。只要有了貨幣，則便可求得土地，或加入地主階級的隊伍，而這在本來的歐洲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固然現今尚有農奴制，但此農奴制，却不真正的帶封建的性質。其經濟的本質，不像封建制度上，領主——他雖支配有許多土地，但其所支配之勞動力則甚少——是把勞動力暴力的以限制在土地上的。在中國，因勞動力的巨大的過剩，故沒有這樣的根據。中國的農奴制是與此適相反對，由以下的事情而成立的。即貧窮的小佃農，以土地缺乏之結果致被束縛於地主，以常向地主借款，致於本來的地租以外，不得不以其勞賃的大部分歸於地主，事實上完全是把其身分引渡於地主，舉其全身靈以隸屬於地主。但此農奴制之經濟的基礎，實與真正封建的農奴制者有別，在某種意味上還是相對立的經濟的基礎。

這不同的地方，雖不是一見本質的，但此不同在中國革命今後的運命上却是根本的重要的事物。資產階級所指導的農業革命，『第三階級』的革命，對於封建的

土地支配制之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共同革命（即法國型的革命），在中國都是不可能。這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不是真正封建的土地支配制，因爲資產階級的各層都同時是收納地租的，所以他們決不會對自己實行革命！並且，即事實上的農奴制有其存立，資產階級也不會把農民層由這事實上的農奴制解放出來的。爲什麼？因爲正是此資產階級，正是此與土地所有相結的高利貸資本，是把農民造成爲借款奴隸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農業革命，在中國須於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始能成功。故農民層只有與無產階級同盟，因之只有脫去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之範圍，纔能從重利地租之重壓下自己解放出來。……

我們現在再回來講歐洲及中國的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歐洲的農業是乾燥農耕，故其各個的土地支配（在現在還有各個的農民經濟），可以明白與鄰接地區劃，而有獨立之可能。但是中國農業自古即以灌溉農耕爲主，這是行於非常狹小的細分地域中的。因此，水利經濟之組織化爲死活的必要。這由地域之大小惟有共同協力始可能。所以於此有傳統的社會的拘束，且常帶宗教的色彩。（這且待講到水利經

濟諸問題時再來詳論) 在這裏，雖含有封建的諸要素，但這亦同樣帶着與歐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性質。故歐洲封建制度與中國，其國家的機能亦有同樣非常的差別。在封建時代，國家的機關本來是沒有的。當國家是分割的各個土地支配之時，此封建的領有者，輒常率其軍隊，聯合於統治者之指揮下作軍事行動或相互戰爭。如行政司法等，便是此土地支配之機能。反之，在中國，則國家具有廣及全領域的重大機能——即全領域內米之配給的組織化，最重要地方水利經濟之組織化，與監督等。與之相應的，故在中國有國家官吏這樣的特殊階級，他們受過規則的考試，爲帶着封建性質，具有學識的官僚貴族階級。但是歐洲的封建領主，普通却多是不能讀書識字，他們於土地支配制以外，如國務等等，幾於是不放在心上的。

中國之社會的構造——即在外國資本未侵入前所成立，及在今日尙大部分存續着的——便如這樣是前資本主義的，是含有封建制度之許多要素的，但因其沒有土地支配制與封建的農奴制，故決不是歐洲的意味上之封建制度。由這方面來觀，中國之社會的構造是比封建制度更爲進步的構造。但在他方面，此構造却含着傳統的

種類之諸拘束。這種拘束，便是由以前的時代直至現今都粘結着的。如經濟生活上家族的巨大的重要性，及由不使之開墾夥多土地的結果之祖先崇拜等。由此獨特的構造，於是乃產生下之事實。即在中國乃有無經濟的基礎，亦無階級權源，而純粹傳統的，以農民爲犧牲，收取封建的所得的諸層人物。如零落的士紳卽屬此類。他們對於官廳爲居間人，而由村鄉以爲供養。凡此，便是中國特殊的封建的要素。

故把中國現代之經濟構造，單純的名曰封建制度，由政治的，戰略的根據都是不對的。由這錯誤，實容易導入機會主義的誤謬。換言之，卽由歐洲的發展以類推，以爲彼此間雖有殊異，而某時期之資產制度必爲封建制度之續，實容易導入那樣的前提。故當此場合，一般人常把二個重要的契機輕易看過，就是：

(一) 中國之社會制度，現在還是由前資本主義的制度繼續着轉向資本主義的制度之過程，而此進行過程，並不是土著的發展，乃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影響下進展着的。卽在向資本主義而轉換的同時，含着中國從此屈服於外國資本，轉化爲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的意味。

(二) 這個轉換，現在是當着資本主義之沒落期。即此時期，資本主義在地球上已倒壞其巨大的一角，而帝國主義國家間，則在世界市場作狂暴的獲得販路的鬭爭，由這鬥爭，爲着強制的謀世界之再分割，將啓發而爲新戰爭。

這兩個契機，即中國向資本主義的轉換，是已遇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沒落期，且中國現在是向着轉化爲帝國主義列強之半殖民地的形態而進，故由此二契機，我們決不能把這轉換，以單純的歐洲諸國由封建制度轉換爲資本主義的類例來等量齊觀。

一一 進向資本主義的轉換過程

我們的目的是在討論中國歷史的發展。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一回至數回的農業革命，又其技術雖會到過與歐洲工場手工業時代有同等價值的階段，我們於此，只是想就其何以不發生進向產業資本主義的獨自的轉換，這一點來略加述說。中國的經濟，在外國資本未侵入以前，具着一種明顯的特徵，即惟無限的反覆着

『亞洲的生產方法』，即在同階梯上儘是同技術的生產過程。

『地租之現物形態，在亞洲，同時雖是國稅的主要分子，但此地租之現物形態，……在這裏是同着自然關係的轉向性以再生產的生產關係爲根基的：』

馬克斯曾這樣的說。

還有他處論述印度的，如：

『這種自足的共同體，不絕的在其共同形態中行再生產，或者即偶有破壞，也是能以同地域同名義而再興，這自足的共同體之單純生產的機構，實是打開亞洲社會不變性的祕密之鍵，我們看亞洲諸國間繼續不絕的崩壞與新興，以及循環不息的王朝的興亡，實是非常顯著的對照。社會經濟的根本要因之構造，是不受從所謂政治這上空地帶來的暴風的影響的。』

『亞洲生產方法』之成立，即不變的再生產的經濟的基礎之成立，決不是不許有某種資本之形成的。

『……在中世，有二個形態不同的資本。這二個形態在最多種多樣的經濟

的社會構成中趨於成熟，而依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時代以前的資本的作用，——這便是高利資本與商業資本。……」

『由高利貸業與商業以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農村中由封建制度，在都市則由 *Zunft* 制度，妨礙其轉化為產業資本。』

事實上，在中國是數百年前，不，數千年前已有商業資本了。中國商人把中國手工業及家內工業的製品運至印度及歐洲。但其輸出於外國者只是超於本國必要額——自然是極少的——的過剩部分。同樣，就高利資本也是非常強烈的，對獨立生產者行其榨取而言，故顯然沒有動搖在同樣級梯的再生產的基礎。但是因只是這樣，故不能導之以形成工業資本主義。

『只要指示中間形態便可十分明白。在這形態上，剩餘勞動是不由直接強制以剝削生產者，並且也不發生生產者公然的屈服於資本下之現象。在這裏，資本還沒有直接的佔領勞動過程。獨立生產者惟在以父子相傳的古昔的經營方法營手工業或作農耕時，乃有與此等獨立生產者相並的高利貸業者或商人，即

高利資本或商業資本的出現，像寄生蟲似的把他們吮吸以盡。在一社會中，若這樣的榨取形態佔其優勢，是不許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但在他方面，像中世之末期似的，却是使轉換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可能的。」

馬克斯曾一再有這樣的議論。

在資本論第三卷一一一——一二頁，也有這樣的話：

「但若將其自體來看，則此商業資本之發展……以之視為是由一生產方法轉換為他生產方法之媒介，且以此為說明，這是不充分的。」

馬克斯更續言曰：

「商人資本的資本，就其獨自的顯著的發展言，生產是不屈服於資本勢力下的，即此資本是與由無關係的資本而獨立的社會的生產形態為基礎之所發生的資本之發展同其意義。這樣的商人資本之獨自發展，與社會一般的經濟的發展正是立在相反的關係。」

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海岸橫暴的確保其根基，當最高發展階段之資本征

服中國之始，而情勢一變。其最重要的過程，我以為如下：

(一) 帝國主義的資本，把中國在前資本主義的階段所成立的資本種類，即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置於自己的隸屬之下。在階級上，這意義是這樣：即收聚不勞所得的中國支配階級之極夥多龐雜的要素，如國家官僚，紳士，商人，銀行家，高利貸業者，都直接或間接以多少程度之差而為外國資本効勞，同時使全支配階級都帶有「買辦」的性質。

所謂買辦之狹義的解說，是外國商品的買者，也是中國原料品之賣者，即立於中國商人與外國資本家間作居間人的中國富商。買辦一方面介紹買賣，而當信用賣買之際若買者無付款能力，則與以（全數的三成至七成五的）保證，同時更探求商品的買主，解釋一切營業上的紛議。在買貨的時候，買辦與各地方的原料仲買人以信用的保證，使居留在大商埠上的外國洋行與中國內地之商賈間結成關係。買辦的機能，就部分的言是頗與英國的 *broker* 相類似，照例，他的所得不過是極少額的固定報酬。他的主要所得則是由規定成數的經手費以來。普通，他劃分其利益之一

部雇用多數人員。這種人員。在對人方面是對買辦負責任，但其雇用，須得外國洋行的同意，並由外國洋行的意旨而解雇。買辦這樣以其經手費，與其外國洋行之興盛結緊密的關係（各買辦大概都只有一所房子以辦事）。

因為國土之廣大，人物言語文字之不通曉，省各不同之度量衡與貨幣的種類，以及與歐洲殊異的營業習慣（一切債務都在中國新年結算），凡此都使外國企業非有買辦不可。倘若沒有買辦，——由自己各地方的支店——想直接與中國商人結貿易關係，則照例必招巨大的損失。故沒有買辦以營業的，實不過二三最大的外國洋行而已。

外國資本一方面據着根據地，並使中國商業資本成爲外國資本的臣屬。中國商人爲出口洋行從農民那裏購集絲茶煙草大豆等，就資本力言，他們是遠不及外國人，加以外國人享有征服者的特殊權利，結果致中國商業資本益成爲依賴外國資本的現象。同樣，中國之銀行資本及高利資本，則賴外國銀行資本，其中特別是英國銀行資本所有的中國的大銀行而存在。

同時，紳士與以前的官僚，也這樣被捲入於外國資本與中國農民間的齒輪機械中。中國農民一方面是消費者，同時並是最初的原料供給者。官吏及定居於農村的紳士，以其權威使交易得以圓滿，他們以此獲得相當的謝禮。這樣，全支配階級便都帶着買辦的性質。

(二) 中國因爲並不是由一帝國主義強國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由彼此間激烈爭鬥的數強國（如英、美、法、日）而殖民地化的，故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各種對立關係，勢必要影響到其所連結之買辦即資產階級身上。這樣，帝國主義的對立關係，即在中國資產階級之內部亦存續着，使之趨於分裂，使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造成爲統一的階級。

(三) 中國資本不能獨力由商業資本及高利資本而得到轉換，中國資本的轉換是在外國資本之勢力下而與之相結始有其成就的。這過程的開始遠在外國資本一般的侵入以後。最初的近代工場，是發生於開港通商地的外國資本所建設的。此工業化當大戰中及戰爭直後，發展頗速，其後則爲平調的，最近數年，則以內亂的結果，

現退步的樣子。

資本主義的工業之發展，在中國，當面的有許多障害。如委身於無限制的榨取的非常低廉的勞動力之過剩，實使技術的改良無所用之，而極原始的勞動種類如苦力的存在，使大量財之運搬等仍殘留着。所以中國工業實呈着一切可能的生產形態之種種樣相。有備着最新式機械的全然近代的工場，同時與之相並的則有由舊式工場手工業前貸制度的家庭工業等。

此外，還有一個障害便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優越的地位。工業企業因為是由外國資本在中國自體中創設起來的，直至今日，外國資本的母國的工業利害，還是決定的。這事情表現最明顯的便是關稅政策。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關稅政策與關稅行政是在國際列強的手中。列強規定關稅不得超過於商品之名目價值五或百分之七·五。由這樣的稅率，中國的新工業雖能對勞動者行使無限制的榨取，但到底是不能與大工業國相競爭的。又在國內產業資本還有一樁不利的事，便是國內關稅，即厘金。國內產業在這裏實受到顯著的危害。外國輸入的商品，只要納其價值百分之二·五

的稅金，得到所謂『子口單』(Transit-pass)便可免去一切厘捐，運送至中國各地。但是國內商品則在各地的國內關稅線上非繳納厘金不能通過，往往有付稅至十次或十五次者。因此，此國內關稅常有比商品原價多至二倍以上的。

(四)中國資產階級就全體言是非常貧乏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各層的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可用以生產的生產手段』，如土地在農民的榨取上，在地租上，不過是其權源。私有之富，與民族之古文化相應，大抵都是由寶石，彫刻，綢緞，刺繡，骨董等而成，也是不容易轉化為資本的東西。(中國因為無金礦，故其蓄藏形體除銀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工藝品。)而數千年來所積集的剩餘勞動之存續形態，則為堤防，運河，萬里長城及無數的祠堂寺廟。其為生產的資本而存在者，為數甚少，且即此少數也是大部分為外國人所有，屬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所有者，實是微末不足齒數。

我們於是知道，中國人口雖比美國多至三倍或四倍，但此人口除其所不可缺的食料品，米以外，所保有的生產手段實不過美國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罷了。

產業的民族資產階級，由這貧乏狀態，可知是怎樣的孱弱了，因為貧乏，所以他們在一切形式上，都不得不與外國資產階級協同行動，因這協同行動，勢必至他們非陷入依賴外國資本不能獨立存在之狀態不止。不過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孱弱，却掌握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之指導權。這可由下以為說明。即民族資產階級是代表經濟的最高發展階段——惟在這裏有產業資本，——民族資產階級現在是與小資產階級及近代的智識階級有極密切的結合，由此，故民族資產階級實為支配階級之各層中，獨自的與外國資本立在直接的對峙地位的。

(五)產業的民族資產階級到了決定的頃刻，背叛國民革命而轉入帝國主義的陣營。這背叛的原因，實不單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之貧弱無力，也不是單因為他們對於外國資本的金融上的依存關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更深的地方。

原來一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狀態，都含着軋轢的傾向。殖民地資產階級，他們在打倒外國的支配這一點上是與其國的一切勞動民衆具有共通的利害。但是同時，殖民地資產階級，其在階級支配之維持這一點上，却與帝國主義資產階

級具有共通的利害。他們只有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帶着資產階級的性質上面，只有在這運動不轉向至社會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上面，是能立在此運動的前面的。但是中國國民革命，因為在此資本主義的沒落期，資產階級之倒壞問題，到處可以成爲事實，又因爲由前述的根據，在中國，共同的資產階級的農業革命爲不可能，因之中國的工農大衆只能以超過資產階級革命之範圍的口號而動員於國民革命，故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立於國民革命之前面，他們卒至背叛國民革命。

三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中國國家之瓦解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歐洲適相反對，在歐洲，資本主義是具有統一力的作用的，在中國，却使其國家瓦解，中央政府滅亡。

我們看今日的狀態，便是中國國家趨於瓦解，成爲各位將軍的權力地域的狀態。（惟其境界是令人目眩的不絕的變更着的。）

這現象的原因果何在呢？

革命以前的中國中央政府，其在一切階級社會所有的任務及維持階級支配的任務以外，還有若干一般的機能，如下所舉：

1. 防禦外敵

2. 水利經濟之保全

3. 從米穀倉庫網中行食糧的管理

(一) 在防禦外敵之機能上，中國政府自與帝國主義列強接觸以來，一再表示着無能。因為完全是舊式戰爭技術的結果，與比較的非常小數並具有近代的武裝之帝國主義軍隊接觸，卒凡有衝突必中國政府敗北。而以此故，政府遂失其權威。中國國家雖是具有亞洲的性質，在國家上，帶有宗教色彩之傳統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這樣的屈辱的敗北，實使全制度上發生破壞的作用。

我們在前面已講過由帝國主義的侵入致中國支配階級間發生分裂。這分裂，由與壓迫中國之帝國主義列強結合之如何，在國家權力上發生分解的作用。這事情是很明白的，況其政府機關的組織是支配階級出身的人，其中如地主階級出身的官

吏，或與此等人構成一階級的官吏所合成的呢。

(二)中央政府因屢次敗北與國家財源爲帝國主義者所押收的結果，遂沒有必要的財源可以繼續管理中國農業上決定的重要之水利經濟。關於這問題，我要待以後再詳論，茲不贅述。

(三)由帝國主義者之侵入，由鐵道的建設，還有由中國之被捲入世界經濟中，在外國貿易上實打開了新道路，使傳統的國立米穀倉庫制度，不能維持。

中央國家權力，以爲帝國主義者所打敗而屈服，致不能盡其就全社會言是最重要的諸機能。於是中央國家權力遂不得不趨於瓦解，權力移於轉變無常的軍閥之手。

這種軍閥立脚於雇傭軍隊上面。以資本主義之出現農民的及手工業的生產方法之崩壞，致有幾百萬的大衆被投出於生產過程之外。於是由此毫無技能的大羣之人造成了盜匪與雇傭軍隊。兩者的差別是極小的，從這一種形態實很容易成爲他一種形態。立於雇傭軍隊之頭上的，如張作霖張宗昌在以前爲馬賊的頭目，如吳佩孚是

頑舊的將軍。雇傭軍隊，不消說是以強奪誅求其勢力下之地域以爲生的。這地域倘若愈廣大，則其收入愈多。於是以當然的結果，各軍閥間，爲求其支配掠奪的地域之擴大，不絕的發生戰爭。

這現象的外面的情形與歐洲中世末期之傭兵隊長（Kondottieri）頗爲相似，但把這二個現象來作同樣的觀察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國家之瓦解與各個軍閥權力之構成，這是發生在帝國主義的作用下的。這含着下的意味，即各軍閥雖彼此互關，但對於帝國主義者則不作鬥爭，並且還多少迎合帝國主義者之意旨，即至少各軍閥還是以一帝國主義強國爲其後援的。故軍閥間彼此的互鬥，部分的反映着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支配階級內部的分裂，而在許多時候，還是帝國主義列強彼此間戴着假面的鬥爭。

與中世的傭兵隊長不同的，中國的將軍們同時還是大資本家。他們把原始的蓄積應用以最近代的手段。即他們對農民層實行單純的強奪。這種強奪，由徵收極高的租稅行之，往往有預徵至數年以後者。除對農民層之單純的強奪以外，他們並

強奪人民所有。這強奪，如發行不換紙幣，沒收銀行的現金，以紙幣購買原料品，（而將此原料品賣與外國換得現金），或在其支配地域內獨占重要商品之貿易（如鴉片之秘密買賣等），最後則竟作礦山工場等資本主義的企業。故他們的權力若能繼續較長，便可由本來的馬賊頭目一變而為國內有名的大資本家。凡是著名的中國軍閥，大抵都剝削有幾千萬的財產，以其一部換作外國貨幣，存貯於租界內的銀行。這樣，以中國國家之瓦解，地方的軍事權力之形成，使中國經濟基礎深刻的崩壞，同時與之並進的則有以原始的蓄積方法所聚集而成的資本主義的大財產。

在這問題上，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是滿着矛盾的。中國欲對內的建立強力的中央政府，但帝國主義列強藉其軍事的優越力之干涉，使之得以比現在更無危險的榨取中國，把中國成爲殖民地化。對外既然無力；對內要成爲強力的中央政府，到底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所以帝國主義列強雖怎樣誓言促進中國統一，他們却勢反是助長中國國家之分裂的。若舉事實以爲例，則如反對國民革命之進向北方，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日兩國不知幾多次的軍事行動，即足以爲證明。

但是，中國國家若分裂而為境界無定的多數支配地域，則因中國農業的特殊情形，統制的水利經濟是其死活的條件，這樣，必然的將使全國經濟狀態陷於破滅的惡化之路。

四 由資本主義造成農民層之分解

中國的農村人口，如資產階級著作家之所言，並不是耕種自己土地的單一農民階級，自古以來，——例如就在一般的貧窮中者而言——則可分為自耕農，佃農，及由賃銀勞動而生活的農業勞動者，而在其中間，則有極多種多樣的_{中間層}。農民自古即是受地主，高利資本及國家之最嚴厲的榨取的，因此，在農民，蓄積之事只在例外，惟最富裕的農民有之，所以再生產卒常是在同一的階梯上不絕的反覆着。

關於農民層之階級區別，不論那一國都是這樣的，在中國我們也是沒有統計。但是由種種個別的研究，我們於此要引錄一研究的結果，以見一斑。

西華大學於一九二六年調查五十戶的農家，這調查是在中國最富裕的地域之一，名爲「天府之國」的四川省的成都平原。在這平原中，有很好的灌溉。此種灌溉設施是向來給李希多芬 (Richtshofen) 嘆爲中國文化的奇蹟而記載着的。被調查的是五十戶的農家。其中二十二戶是只耕自己的土地的，五戶是自耕並租人之田而耕的，二十三戶純粹爲佃農。單是混合土地所有 (自耕兼佃耕) 的五農場而欲由此以引出結論未免過少，故我們把此種類，刪除於引錄之外。不過還有要說明的，由如何的觀點以選出各個農場，則我們是什麼報告都沒有，惟我們却在此二種類中何以推定是選的良好的農場的根據。總之，由這些資料，在中國農民層之內部有尖銳的階級對立，這是十分的結論。

二十二戶之自耕農，平均每戶有地七十三畝，反之，在二十三戶之佃農，則一戶所有不過三十畝之平均地積。

至家屋的價值，在自耕農爲一·一一四元，在佃農爲四一〇元。

由土地之缺乏，地價因以增高。自耕農一戶所有土地之平均買價，大概在一萬

元，卽一 hectare 值二千墨銀以上，卽當於四千馬克。土地佃租則亦與之。應爲一畝平均十二墨銀以上，但有在從八九至十四墨銀之間的，約達地價百分之十。至爲生產手段的支出，則爲數極小。包括修繕費在內，在自耕農，一年平均十四元，在佃農則平均八元。至沒有土地的農民或僅有極少土地以自耕並佃人之田以耕的農民之存在，則可以下之情形爲說明。卽在所調查的農場中都有爲賃銀勞動的支出，在自耕農一年平均四五·四元，佃農則一年一八·三元。勞賃收入在佃農爲一年平均五·四元，自耕農則爲二·七元。這平均，正因爲是平均之故，呈着虛僞的階級分離的樣相。只有自耕農的五分之一，是得到勞賃之所得的，由此，極貧的佃農，可知其在勞動所得上必占重要地位。佃農之百分之五十是由賣其勞動力得銀一〇元以上的。惟此外，佃農還做許多家內工業。佃農之百分之七九是由家內工業的副收入所得，計一年最多爲七〇元，平均則爲一八元。在自耕農，其由家內工業每年平均之所儲蓄不過七元。以財產之不同，此平均方法是非常的把事實抹去了的，如有一家農場，由土地之租賃，每年所得至八四〇元，我們由此可以想見了。

但是佃農之貧困，也可由此等抹去的數字中明白的看出。佃農之平均所得，在自己經營之農場，包括其所生產並消費的生活資料，一年達七七〇元以上。其中的支出則如下：

佃租	三四八元
工資	一八
修繕費及農具費	一五
肥料	二六
合計	四〇七元

在這裏為全家族人之生活得年有三六三元之餘。佃農家族平均八·三人（其中二·七人為成年男子），由這計算，計一人每年之所得，實在五〇元以下。而在這裏如租稅及貢納，還一點也沒有計算在內。

這調查是在中國最富裕的地方所行的，其最貧困的佃農是並沒有選出的，我們若承認這樣的並把這資料視為可以普遍適用於中國全土，則佃農之所得必比此處所

舉更少，這主張是有具體的基礎的。至於完全無自己的農場的農業無產階級，那是更不消說得了。

因資本主義的侵入使農村的階級的分離更尖銳，又使現存的自然經濟的殘滓掃蕩以盡，奪去了農民家內工業之基礎，並使國內資本主義的市場擴大。

『大工業完成了農耕與家內的農村的工業之分離。在這後者之根柢——紡織與機械——大工業值其根基。』（資本論第一卷七一四頁）

以資本主義之出現，所造成的農民層的分解過程，這是一般所熟知的。我們因此關於這點無討論的必要。但是把握中國經濟在這過程上的特殊性却是必要。而最重要的契機，則我們以為當如下。

在資本主義作用下的農民社會之分解，使中國農業沿着一般的衰微線以行，這主要原因如次：

（一）水利經濟之崩壞。在中國——凡是一切近東，中央亞細亞諸國都是同樣——秩序整然的水利經濟是其死活的問題。水利經濟含有二種任務；第一對於洪水的

防衛，即江河之調節。中國的大河床，因為比沿流的溪谷的地平面還要高，所以這在中國更爲重要。中國的河流在幾百年前增築了不知多少次的高隄間，比這還要高的流着，所以一旦堤防潰決，則其意義便是現在養數百萬人的地域立即變爲湖泊。第二是灌溉設施，這以中國的園圃式耕作爲基礎，故其崩壞，在中國農業，實即是破滅。

像這樣，水利經濟之社會的組織問題，在中國農業的將來，不，中國全經濟及全文化的將來，是具着中心的重要。以前，水利經濟之管理，是中央國家權力的任務。但是這樣的中央國家權力，現在已沒有了！然則由何種社會組織來管理此水利經濟呢？

對於洪水的防衛，這惟統一全個流域始能辦到。倘若不是亘於全河流，而只在河流的一部建設堅固的堤防，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所以在彼此相互爭戰，勢力範圍不定，支配也不久長的許多將軍不能支配一河流，實施其統一的堤防政策之時，則堤防制度勢必崩壞，因之發生大洪水使其地方陷於全滅。並且即是小

堤防之潰決——因為從河流引水入田的灌溉設備將以之全滅——也會發生大災害。灌溉設施是收約的中國農業基礎之一。倘若沒有灌溉，收穫就會立即減到現在一半以下。水田之米的收穫比之旱田，是多可至二倍。灌溉實使同一的田地一年可有數次的收穫。綿延數千百里的灌溉用的運河，這便是以幾千年農業的結果，而縱橫的貫於中國平原的。我們由此等運河，可以證明水利經濟之基本的重要。水利之獨占的重要，其價值實等於土地之獨占。在為獲得土地而鬥爭的時候，同時最先的便是獲得用水的鬥爭。

就灌溉之社會的組織而言，一個水源，有廣大的地域是要由此引水，故可說是極多種多樣的。有為私產的井以供給個人用水者，有為資本主義企業，以供給用水者，如以備有唧筒的發動機船往來河上販賣用水，或築造貯水池，於一畝相當之灌溉，徵收若干費用。但其中有各種社會的傳統的形態。例如多數村落之用水供給是由小河共同取用，像山西樣是由村民間的協定以為規定的。至普通則由各村於所定的日數交相行使水利權。此日數之長短，則由人口之多寡與耕作面積之廣狹而定。

凡某村落在得以利用河水的期間內，村中農民俱有以其耕地的比例，利用河水的權利。如山西之農村因沒有鐘表，燃燭以計用水的時間。大概長七八寸之燭可以燃三十分時。有十畝田之農民則得於燃二燭之時間內，利用其水，有二十畝者則得於燃四燭的時間內有用水的權利。此等協定率有數百年來的文書以為規定。當有關係的諸村間發生爭議的時候，村之長老即彼此聚集於一定的寺院，像審判者似的以判斷此爭議。

但是像上述成都地方或揚子江下流的許多灌溉制度，其疏濬維持實需要國家統整的管理。因這種管理的缺乏，現在此種設施已非常荒廢了。倘若再戰爭不絕，那末饑饉的慘狀——如現在的山東——便將不可避免，這地域內的全部文化之沒落，便將迫着到來。

固然，農民層之傳統的宗教的態度，對於灌溉制度之維持尚有作用的能力，如成都平原，在上述調查中，曾有如下的話：

「此偉大的灌溉制度之諸建設者是像神樣的崇拜着的。而同時對於用水供

給統制之祝典，在這平原中，幾占民衆宗教的儀式之大部，每年如掃墓，修墳及整理地面的高度等事，都以宗教的熱意行之，不受戰爭及賊盜的影響，實爲個別的所行的改良事業之典型，這在目觀着此外之一切生活方面都是混亂糾紛的樣子的人，是要視爲一種驚異的。』

但是沒有了中央政府，這種傳說的宗教的基礎到底能維持至何時，實爲一疑問。

(二)與灌溉制度相並爲中國農業之第二基柱者，是最設備周到的肥料經濟。這雖不是多養家畜而爲收約耕作，但却是使中國土地之營養分得以均衡的。把爲植物的營養的一切成分，都歸於土地。由都市最周到的聚集人之糞尿移送到鄉村。此外如泥，稻藁，樹葉，及一切有機物的廢物，灰，住屋之壁土等等，都混合之而爲肥料，施之土地。在中國，便是單藉這歐洲農業所不知的這一切廢物的利用，即不用人造肥料，而數千年來依舊得維持其土地的地味的。固然，也有周期的饑饉，但這是天災（旱魃或洪水）的結果。因國內交通手段的缺乏而一地方的凶年不能由他地方

輸送穀物以調劑之的結果。（本來，在歐洲，當鐵道網未建設成功以前，也是同樣發生饑饉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把數千年來維持至今的中國土地營養分之均衡，加以破壞。連年不絕的內亂，使都市的肥料不容易運至田間，而兵火又破壞了有機物的成分。又農業產物繼續向外輸出，使其中所含之營養分，這樣便喪失於國內的土地。……

（二）因雇傭軍隊對農民的誅求與單純的掠奪，趨於非常的大規模，致貧苦的農民層，現在的狀態成爲不能維持其極少的生產手段如耕用家畜種子農具等。農民這樣益趨於無產階級化，使階級的分化日益尖銳。但是這情形是沿着全農業的衰微線的，即在低下階梯之傳統的單純再生產，現在成爲一般的貧窮化。

以上所述，便是我們覺得以資本主義之普及，在中國農民層所視爲最可痛恨的特殊之諸契機。如在山東的大饑饉，實不是普通中國之饑饉樣的天災，而大半的原因是由於中國軍閥中最狂暴的掠奪者張宗昌，殘酷無比的掠奪的結果。如紐約時報

通信員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夕刊中之所述：

「據公布報告山東省之三分之二已爲災區。爲使此二千四百萬以上的人口的一部所以不致餓死，故百零七縣中七十縣，不得不有賴於外部的救濟。在山東已有九百萬人是營養不良，以不適於人間的消費的生活資料過着日子。有四百萬人，成爲乞丐，或賴慈善事業以生活。

「……許多地方的收穫，都是在常年收穫以下，據從事救災事業的中國人言，去年山東之收穫，只足供維持其人口之冬期及早春的生活資料。但是由他們所言，今日的災情，實是由七年前，即無道的政府日益惡化的期間所漸次造成的。

「倘若沒有苛求人民的租稅，沒有軍隊的掠奪與沒收，山東今年或者可以不致招災。這完全是督軍張宗昌的責任，所以造成這樣的情狀。

「……張宗昌爲一切中國軍閥中最無道最貪慾的暴徒，不論外國人間中國人間，這是定評。……張宗昌向人民苛求剝削，他的部下則向他索詐。……

譬如張宗昌決定要三百萬元的用處，於是招致顧問命之發明新稅。顧問把租稅定得很高，可以得到千二百萬元。張宗昌這樣得其預定的三百萬元，其餘的則由其部下與顧問去分配。普通由顧問出錢去買得此徵稅權，而從人民身上去求得比買價不知多少倍的錢。

「張宗昌個人的支出，一天須五千元以上。士兵一名平均每月之維持費是十元。所以有人說，張宗昌閨房一月的經費，可以維持戰士六千人的一旅團。」

「在沂州以北的九縣，救災人員除一頭半狂的狗外，什麼生物都見不到，這九縣的情狀與一日用費五千元以上的，正是極尖銳的對立。」

「因為饑災，使奴隸賣買急速的復活。許多衰落至於乞食生活的家族，把他的男孩，出售與人，因為這樣，這男孩就確實的可以得食了。此等男孩，大概五個銅幣就會賣掉。」

「更可慘的是為白色奴隸市場的少女賣買，雖然女孩的年齡不過是十二歲

的幼年，也被帶到市場上去。在濟南，妙齡的少女，就可以賣得五十元的身價。因此有許多貪婪的棍徒，到災區去收買少女，每人身價五元，這樣便在濟南以賣人爲娼而成爲富人。」

苛稅與饑災的關係，這位通信員也記得極明白。

『山東西部的人民是異常的貧困。即是，豐年其收穫的餘剩，也是極可憐的少。……然而這些窮困的地方，却招收稅官吏不知幾多次的枉顧。地租是二倍而三倍了，房捐也增加了，每頭家畜現在也要徵稅。還有，把租稅分作一年後，二年後，三年後的迫着人民預繳。

『農民倘若拿不出錢，收稅官吏即奪取其穀米，馬匹家畜以爲代。因此之故，農民遂成爲破家蕩產，把房屋拆毀當薪出賣以償稅。

『這樣幾萬的人們是被放逐出他祖傳的住家及所有的土地，現在這等縣中是到處不見生物，連一頭小貓也沒有了。以前一英畝七百五十元的地價，現在二十五元就可出賣。……山東的運命便是這樣不過歷史的一部了。至直隸南部

現在也有三百萬人鬧着災荒。河南北部，則連不足食的食物也沒有的，亦不下數百萬人。總之遭災的人數，今年山東直隸合計實在千二百萬以上，來年若再加上他二三省，則將多至三千萬或五千萬以上。故戰爭，暴政，掠奪若仍繼續下去，二年以後或至二倍及二倍以上也不可知的。」

五 由資本主義造成都市手工業之衰亡

因資本主義的出現，致世界各地，同樣在中國，不但是農家的家內工業，即都市手工業亦因之發生衰亡作用。中國的特殊性——像印度樣——是都市手工業之破滅並不是由於本國所興起的大工業，因之，在手工業失其生活的勞動力，不能在大工業尋到勞動。倘若中國像印度樣有定期的人口調查，則我們可以看到即在中國，其從事於工業者的人數，也一定是十年十年的減少的罷。但是在印度，從都市放逐出來的手工業者，還可以到那裏去從事農業——因英國棉布的侵入致幾千萬的印度麻布織工因而餓死，這是數十年前的事了。然中國的農業則以上述諸原因，失

其生活的手工業者，却在無處可以收容的狀態，正與被掠奪以盡從生產中逐出的農民相當，中國大批的手工業者不得不放棄其職務。因此，完全失其糊口之資的幾十萬，不，也許還是幾百萬的大批人民，遂惟每年加入盜賊乞丐兵士之羣，或者到滿洲蒙古尋求新生活之路。從中國北方以不絕的向滿洲蒙古遷徙的民族移動，其規模之大，實遠過古典的民族移動爲有史以來最大民族移動之一。

手工業之沒落，亦有如從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或使手工業者到前所未聞的榨取的資本主義前貸制度，爲部分的轉換。茲舉一具體之例如下。

D. K. Tien 記在浙江編織工業之狀態如次（見大陸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當一九二六年之初，當地有數萬的織機。本來此工業是與大手工的工場相連結的，但以需要的激增，而工場中無收容新勞動者之餘地，於是把機器分置於勞動者的家中。原料之絲仍由工場供給。機器每架銀二十元。因爲勞動者租機每月須付租費二元，所以這在工場是一樁非常賺錢的事，凡有機千架者，單由

機之租費就可每月有二千元之收入。至就勞動者而言，則此設施在他們也很好。他們一面做活，一面可以料理家事，他們每月所得，除去租機費約有五元——這使在家庭中的婦人有相當的生活，還有這工作的學習是不要什麼時間的。』我們由此知出租機器之資本家，從每月七元的收入中取得二元，這樣在十個月後，就可償清機價之全部。這實是歐洲資本主義在最黑暗的初期也未曾有過的榨取。此外，落於資本主義的前貸人之手的其他工業部門，其情形也如這樣。

六 勞動者階級之狀態

關於中國勞動者階級之狀態，即一切勞力者之狀態，恰與馬克斯論一八七〇年代德國的特徵相當。

「……這與在以外全部西歐大陸者相同，不單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發展，即其沒有此發展，也是使我們困苦的。與近代的窮乏狀態相並，有遺傳的窮乏狀態之全系列，實使我們困惱。後者是由與時世逆行的社會政治諸關係相連之

古代的時代落後的生產方法之存命所發生。我們是不但由生，並且由死，也是被困惱着。」（資本論第一版序文）

在中國，便是最困苦的前資本主義的災難與資本主義的苦惱同時合流。中國無產階級之可怖的勞動狀態，如一日繼續十四小時的勞動時間，每星期之沒有假日，以及不能補償用出的勞動力的低廉的賃銀，凡此都是一般所熟知的。現在也沒有特別可以供新資料的東西。因為在農業及手工業中有數百萬人的過剩，致在工場工業，勞動力之供給非常夥多，於是資本家遂得如昔日英國棉紗紡織業者一樣，每年榨取新的勞動婦女與兒童，酷烈的奪取他們的勞動力，這樣使他們亘着長年月或一生涯，把勞動力喪失以盡。而用盡的勞動力的補充，則以在有餘力的時候，常爲着飢餓，使不幸的勞動者不得不把其勞動力即最後的一點點也施用以盡。

所以駐華商務官安諾耳（J. Arnold）在中國提要二六九頁中有這樣的斷言！

『中國的勞動，若就其費用而言是能率的（efficient）故勞動價格雖然低

廉，在於此道深有經驗的外國人，熱心的稱述謂中國勞動者若能置於適當的指導下，他們的能力是很好的。』

中國農民層與手工業之衰落繼續不絕，並且每年由生產過程有數十萬或數百萬的人被逐以出，由此可知以改良主義的方法，是決不能對中國無產階級的狀態有何等的改善，這是很明白的。

上述的美國人，常裝作中國民衆之友似的，是帝國主義強國之代表者，他以下的所述，恰表示帝國主義者之見解：

『在中國尚沒有所謂勞動法。在中國的經濟生活，要想行有實效的兒童勞動保護方法，時期還早得很。從各方面言，兒童在工場實比在家庭保護得更優良。』

由此可知欲改善中國無產階級的狀態，很明白的已惟有革命的一條路了。

七 中國匯兌市場之混亂

在中國剝削勞力者手段之最重要之一，便是中國一切匯兌市場之下落。爲明白中國的特殊狀態，要就各階級，即各各的匯兌市場來說明。

(一) 在無產階級之匯兌市場是銅幣。約二十年以來，私立及省立的造幣廠，鑄造銅質漸漸減少的銅幣，以大量的流通於市面，因此之故，銅幣之購買力遂繼續下落。在這過剩勞動力像洪水樣泛濫於勞動市場的現狀，這情形，其意義便是工資之繼續減低。

(二) 都市及農村小資產階級之匯兌市場是銀幣。但是銀在世界市場之價格是絕的低落的。中國被強力的世界經濟既愈捲愈深，此銀價之低落，在中國的銀幣市場，遂益發生強力的作用。(加以此外還有大規模的偽幣)。所以這樣發生了資本家層對小資產階級層之榨取。因爲前者是由外國匯兌市場以行其營業或定其價格的。且因銀幣的成分，省各不同，重量亦彼此互殊，所以這樣的銀幣，實與高利金融業者以獲得巨大利潤與欺騙的機會。

(三) 資本家——外國及國內的——他們所用的是爲其營業基礎之銀的世界市場

價格。惟事實上他們仍以金計算，以固定的匯兌市場向外國購物，這樣——與通貨膨脹經濟之機構相應——繼續減價，而在匯兌市場則仍得合於計算，以下層人民層之犧牲而不絕的增加其財富。

(四)最後是軍閥，以其強制通用力，由發行無價值的紙幣而強奪人民所有。每次統治者之更換，從來流通的紙幣即停止通用，發行銀行之準備金——倘若還有的話——則被強奪以去，再以新紙幣無理的用於商人及手工業者。兵士以巨數的紙幣至店舖購少數商品，手上拿着武器要求找還現銀。不管商人願將商品不要分文的送贈，兵士還是不肯。因此之故，所以當統治者每次的轉移，一切店舖都關門把東西藏起，這事情，現在的商人與手工業者差不多成爲一般的習慣了。

但是在滿洲及中國北部像張作霖之統治下，即軍閥的支配相對的安定的地方，只有在那裏，紙幣尙價值低落的流行着。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在貨幣制度之領域，實完全是混亂狀態，這混亂，便是把在最低限度的勞力者之所得，弱肉強食的使之更爲減少的手段。

八 客觀的革命的情勢與今後發展之展望

我們這樣由分析的結果，可以確定中國經濟的基礎之瓦解，中國社會是在最深刻的危機。因資本主義的侵入——天災暫時擱開——至少以單純再生產為基礎而確保其社會的成立之傳統的社會制度是被破壞。本來為這經濟的基礎的事物，是建築在水利經濟與農地營養分之均衡上面，並且是與農村的工業密切相結的農民的農業。這基礎現正繼續在瓦解中。水利經濟是被棄置不顧，土地則其所消失的營養分完全不能得到壅培。農民因為工場製品之侵入，失其家內工業之副收入，而因負着田租，高利貸，通貨膨脹等重担，及無法避免的苛稅而完全趨於破滅，農民所有最少限度的生產手段是被奪去了，現在正不絕的轉化為沒有土地沒有故鄉的無產階級。幾百萬的農民，羣趨而為賃銀勞動者，為農村之無賴漢盜賊以及兵士，還有幾百萬人則在飢餓之中，還有的則暴動為亂。同樣，廣汎的都市手工業大眾，亦以被逐出生產過程而去為亂。

以生活手段被奪而尋求謀生之道的幾百萬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不過是使過剩的無產階級的隊伍更膨脹，成爲常瀕於飢餓之境的恆久的失業者，使全勞動者階級下落於最黑暗的貧困境。

然則欲解決中國社會這個最深刻的危機，到底有怎樣的可能性沒有呢？則在抽象的理論上面，有五種可能性：

(一)反動的解決，即復歸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這是太平天國革命之意義。這解決方法，在現實上爲不可能。我們無再討論的必要。

(二)民族的資產階級的解決，即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上得到勝利的民族資產階級之獨裁。這是日本型與土耳其型。惟這樣的解決，須對於地主軍閥帝國主義者之鬥爭，有農民與民族資產階級之共同協力始有其可能。但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貧弱，他們自己財產之一部係投於農地，這與地主階級有緊密的融合，因此有保持高地租的利害關係，並參加以高利剝削農民階級的行動。同時在他方面，他們屈服於外國資本之下，與征服中國之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特殊利益相應，有內部

的分裂。最後，他們對於工業無產階級本身之要求與叛亂，不得不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之保護。因此，他們遂卒與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事業相背。這樣，此第二解決的可能性也是沒有的。

(三)從半殖民地的中國轉化爲殖民地的中國，這類同型便是印度。我們覺得這有其可能性，不以爲這是全然不可能。中國民衆因爲疲於軍閥間不絕的戰爭與沒有決定點的常是彼此激蕩着的階級戰，而結果乃屈服於外國的征服者——像印度的一樣由征服者再把秩序建立起來——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在帝國主義列強，以中國市場對於外國商品的吸收能力之減退，實使其佔領中國的衝動更爲強烈起來。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印度之轉化爲殖民地歷時在二世紀以上，而此轉化又是當資本主義發展期的時候，是由當時惟一的稱霸世界的強國——英國——來造成的。然而中國的危機則其進展已甚深，所以決無一步步占領中國之餘裕。現在想占有中國的四帝國主義——英美法日——正在彼此互鬥。一強國欲占領中國全部或一部的

企圖實最易引起世界戰爭。至若爲共同占領或分割中國而彼此聯合，則以帝國主義列強間有尖銳的對立，於事爲不可能。且亞洲的發展線正沿着殖民地之解放而進，自不能再以擴大殖民地的支配爲企圖。

(四)鬥爭中的諸階級共同沒落，或以物質的基礎即水利經濟之破壞而中國全部物質的精神的文化趨於滅亡。類同型如亞洲歷史上多數偉大文化之沒落。這樣的終局是可能的，但亦可不致發生。如居住中國本部外（滿洲蒙古南方亞洲）的多數中國人與中國本身的革命運動的偉大的力，即表示這樣的終局是不會有的。

(五)勞力者即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之布爾熱瓦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惟有這纔是唯一現實的解決此危機的。亞洲現在一般的發展即向此線進行。……

對中國作如是觀

長谷川如是閑

初次往中國大陸的日本人，不論是誰，輒感到一種自己毫不以為奇異的大的奇異。

渡過了海到中國去的，我們日本人，驀地見了『這便是中國』的中國，不論在大連青島或者上海，都不禁發生一種反問，『中國在那裏呢？』一面覺得這是歐洲大都會樣的文明都市。如令人疑心進了馬塞港的大連，如令人誤會以為漫步安太屯里屯（譯者按為柏林街名）的青島，又如熱鬧喧闐令人以為湖太晤士河，停輪倫敦埠頭的上海，這都是中國的。

在本國，以中國為比我國遠遜的未開的後進國的日本人，他們沒有什麼預備智識，一旦見了這中國都市，自然要以此奇異現象為可異的。

但是把這奇異忘了的，不但是日本人，歐洲人也是這樣。尤其是日本人所不覺得奇異的，如大連青島的街市，不論何處，都與其在本國所見的木板房子完全不同，是堂堂的磚瓦建築。冬季，這種家屋的 *Peculiar* 與 *Slow* 的煙，蓬蓬勃勃的迷漫着，像倫敦的街市樣。這種中國的都市是超越於中國的，同樣其中的日本人，則也是超越乎日本人的。但是，却誰也不以此為可異。

這有什麼可異呢？既然向海外發展，這樣的進步在他們或者還以為是當然的。但是在昔日向美洲大陸發展的英國人，與向中國大陸發展的日本人是正相反對的，他們是從本國的瓦磚房屋——在那時，即是英國，或者尙未必是磚瓦房屋也不可不知——回返到木板房屋以下的原始的生活。因此，在他們便覺得毫不以為異。

但是，中國這種奇異現象，在日本人及歐洲人所頑固的視為毫不足異的，却漸覺得可異。不足異的事，到底不能不感到可異的時候是到來了。

說起可異的事，如築有滿洲鐵道約千七百哩——即歐亞連絡線之滿鐵七百哩弱，中東鐵道千哩強——的細長的地帶，日本與俄國，流了無數的血，各在這裏造其國家的延長；而在一定之期間以後，約好照樣仍屬於中國，但是反之，不曾在一定期間要歸中國，日本與俄國仍努力以造其地為本國的延長，這種奇異的事到底是令人奇異的。

像這樣的事，雖是誰也不以為怪。但是在以前的世界歷史上到底未嘗有過。這現象，不論青島上海及中國其他一切商埠地方，都是相同的。在以前的歷史上，若在此情形，必毫不客氣的把地圖改換了顏色。尤其因為中國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大國，這在以前的歷史上，說起來便是印度樣的國家。自科倫布所活躍着的十五世紀後半以至十八九世紀之交，歐洲列強，其對於歐洲以外諸國的方法，結局大抵是瓜分其領土。如美洲，非洲，及南洋諸島等野蠻民族的故鄉是不消說，即是印度樣強大的文明國，葡萄牙及英法，曾爭着謀瓜分，而結果則到底塗上英國的顏色。

然自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世界地圖的顏色，殆都已確定，此時餘着的惟中國大

陸。於是各國遂猛然的以中國大陸爲舞台，開始其最後的分割競爭，但是到底只能在古的中華帝國設立新的外國街市，像日俄兩國，雖賭着國運以事戰爭，而卒不能把滿洲地圖塗上二國的顏色。

三

這樣的事情，在以前的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這以千八百年代爲其境界線，因爲全世界之國家形態，至此發生了一大變化。

但是使世界各國發生這樣的變化的事情，却並不是在十九世紀告其終局，這種作用之發生，實在此以後。

爲歐洲列強食慾的對象而在最後惟一的留着的中國大陸，以安南香港及黑龍江省之一部之喪失而告終止，以後算在各國所揭『中國不分割』的招牌下，好容易得到保存。這其間的經過，凡讀外交史的，想來誰都能夠明白。但是在以前，各國不惜流血犧牲以求滿足其領土的獲得慾的，爲什麼到十九世紀後半忽然一變而爲『不

分割主義」呢？

這是因為歐洲列強之國家形態發生變化之故。據外交史家的說法，以列強競爭之結果，乃使各國陷於窮境，但是即在此境地，若是十八世紀以前的國家，則無論如何必睹國運以相爭。例如印度便是。葡英法三國之在印度，決不是因為陷於窮境而共採取印度不分割主義的。

中國大陸上各國勢力的均衡，這決不是由於中國之分割不可能，因為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歐洲列強之國家形態發生變化，換句話說，即自此失其舊國家的性質，完成了近代國家的性質，於是中國之分割遂不是不可能，而實為不必要了。

四

當近世之初，歐洲列強派遣遠征隊至西印度，東印度，南洋及遠東各方面，盛極一時，這與封建國家之在歐洲內部相互征伐相同，思以領土之擴張而掠奪其領土上之富源。蓋舊國家之領土慾，大抵與其以掠奪的財政為基礎之國家組織相關，而

歐洲各國之互相征伐，大半是由此目的。

但是歐洲內部的掠奪的組織，在一方面既招經濟源泉之枯竭，同時在他方面由防護經濟源泉之枯竭，於是促進一切民族統一的機運，而有使之膨脹為強國形態的傾向，但是這種膨大的國家，其經濟實陷於枯竭狀態，致各國不得不再事掠奪的戰爭。於是由彼此爭亂以至枯竭的歐洲各國，乃知閉鎖於歐洲大陸，而欲維持掠奪的財政，在事為不可能，因此，當近代之初，遂在太平洋上發生了猛烈的掠奪競爭。

於此最振其暴威的便是以所謂無敵艦隊(Armada)獨霸大西洋的西班牙，如其將軍科爾推斯(Cortez)「大王」的征墨西哥，軍行所至，像非洲蟻羣的襲來一樣，掠奪淨盡，無復有絲毫遺留。但是此外各國，其遠征的原則，實與西班牙完全無二，這是與當時非常跋扈的海賊羣同其指導原理的。

但是，由國家之掠奪經濟以形成的組織，迨其掠奪的舞台，廣及於全個世界，於是不期然的來了使其性質發生轉換的機會。以世界的交通之發達及其與新發見的新世界之經濟交通，於是代着掠奪，漸次形成了各國國家的及私人的經濟之根柢。

而妨害此經濟交通之武力與掠奪，則結果反是使各國失其經濟的根柢的。

這種形勢，當然與歐洲各國國內經濟狀態之進展互爲因果關係。於是至此世界的促進近代產業組織的發達之舊國家的全國的掠奪組織，遂進化而爲經濟的榨取新世界未開發諸國之組織。達於此階段的強國對未開國家的態度，現在不用科爾推斯式對於相手國取敲剝及於骨髓的辦法，而取一種產業的並文化的開拓相手國，使之成爲原料供給國及消費國的行動，所以當此時代，英國對於印度，頗非難偶然運用科爾推斯手段的東印度公司，斥責赫斯丁（Hastings）爲不當。

五

當這樣以軍國的掠奪組織爲根基的國家變化爲商人的產業組織的時候，中國恰好是一個最有力的對象，呈現於世界產業國家之前。

所以當此時代，歐美列強對東洋的侵略，以其本國產業之目的爲動機，在歐洲各國國家的侵略史上，適當第三階段。即第一階段是以隨着人類移動而來的軍事行

動的侵略爲主的國家的態度，第二階段是以對於新發見的新世界之經濟的掠奪爲目的之侵略，而第三階段則爲由本國產業的目的而生的侵略。古代軍國國家之遠征及吞併近鄰，暫言之，不外孤立的社會羣，以人類的移動發生接觸，在彼此混淆的過程上所起的現象。由此混淆狀態之如何，於是促種種文化形態之發生。如亞歷山大之遠征，希臘之殖民，羅馬帝國之成立，日耳曼民族之勃興，都是國家侵略的形式上的社會形態之更生。割據的社會形態，至此爲所打破。如凡羅馬帝國世界的道路所至之地，即搏成一團爲歐洲文明的一大系統。同時，孤立的民族宗教，亦爲世界的宗教基督教所代替，說起來到底是生活大混淆的心的反映。

因此，中世紀之小國家割據狀態，是反動的分化現象，而大混淆，即是由各中心而結晶的中間過程。故在未至近代各民族的統一與結晶以前，此種分裂鬥爭是完全沒有人文史的意義的，即所謂暗黑時代的亂鬥。到了最後於是成爲近代國家之外的發展，進於前所述之第二階段，有世界的交通路之發見，而爲對新世界之軍國的掠奪時代。以此影響的結果，使諸強國國內的產業狀態發生巨變。惟其國家的遠

征，究不外國內的產業組織之外的延長。十九世紀時列強對於中國與日本的遠征，質言之，便是爲的要迫之「開國」而用武力的。所以此時的戰爭，是只在產業上的必要受到阻害的時候，例如英國，當東印度公司順利無事，在中國得自由的售賣其鴉片之時——這是一個百年以上的長期間——其對中國是不用戰爭行爲的，但一旦以中國的醒覺，發布鴉片禁令，於是英國遂不惜犯中國的國禁，以謀繼續其不法的賣買，反斥此不正當物品之處分爲不當，而起所謂「鴉片戰爭」那樣最無恥的名義的無法的戰爭。

英國這樣在廣東起這無名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實是劃一大紀元的端緒，而以此新紀元之開拓，使廣東人民由七十年前英國的軍事行動，認識了中華帝國武力組織的脆弱，這決不是偶然的。

六

國家的侵略史上之三個階段，就其具有人文史上重大意義之點而言，則第三階

段可以與第一階段相匹配。由單純的人類移動而生的侵略，當原始的社會羣彼此接觸之時，兩方都是軍國的，言其性質，幾於凡相接觸必發生戰爭。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幾乎是當時社會的交通之惟一方法，是一種社會羣的生存的試驗。惟經過此過程而生存於世，並具有生活力與生活的組織的社會羣，是遺留着的文化構成的要素，故是具有未來的運命的。

但是以世界的交通之發達而來的產業組織的進步，既成爲社會的生活組織之第一條件的生產過程之發展，於是以生存資料之缺乏形成遠征的動機，恰與第一階段相反，凡生產最發達的國家，是最感到有遠征的必要的。這不是爲求被掠奪國的遠征，這是爲求原料供給國與消費國的遠征。這遠征的方法便是強迫人由「鎖國」而爲「開國」。這是第三階段上國家的侵略的特徵。

中國具着此第三階段之性質，是國家的侵略之標的，現在的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即由此而生，說起來也是決定革命的性質，同時，並革命的現在與將來的。

但是，第三階段強迫開國主義的侵略，更可分前期的與後期的。當前者之時，

侵略國之——的在與被侵略國結其本國生產過程上的關係；而在後者之時，則以侵略國的生產的支配，已由生產事業管理者之手，移轉於所謂金融資本家之手，於是被侵略國成爲以資本關係與侵略國相結。前者是物之交換的關係，後者是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係。侵略國由其投資的權利，把被侵略國成爲抵押物件化。這是一般研究的學者已說的很明白了。

上面前期的關係，因爲是受資本主義經濟初期之自由主義的貿易關係所支配的，故世界的平和是其正則，至於武力則惟強迫人開國時用之，一旦兩國若進於交換關係，則武力實爲非經濟的事物，倘若可能，戰爭是竭力以求避免的。但是在後期，強行投資，而爲的資本的消費，於是利用鐵道政策，這是第三階段的特徵。平和的市民的交換關係，現在一變而爲險惡的國家的政治關係，從前竭力以求避去戰爭，現在却一易而爲挑撥戰爭，結果致兩者的關係常在爲此危險所脅的狀態。

中國革命，在後期的侵略過程上便是給與最後的機會的。故以近代的產業在發達期的影響，使中國之舊國家趨於潰滅，而近代產業終結期之帝國主義，便是中國

革命完成的條件。

七

中國當革命以前，不知歐美列強之近代的侵略形式，而誤解爲前世紀式之軍國的侵略，歐美人士常以此爲中國人昏瞶之證。但是如英國之入寇廣東，強佔九龍，法國之掠取安南，俄國之據有黑龍江省，日本之奪取遼東以及英德之分據山東等事實，若最公平地由冷靜而客觀的觀察，則到底不能不疑有瓜分中國的危機在內。蓋就歐美近代國家之生存問題言，這種中世國家的侵略行爲固是不必要，但是各國現在尙不能全脫前世紀殖民政策的餘波。而由本國產業的恐慌，有失業人口之加增，馴致有勞動運動之勃興，凡此都使之歸合於人口過剩問題，於是遂以『殖民』的人口移動，與對殖民地的舊式的軍國的掠奪或新式的產業的榨取，視爲惟一的救濟方策，所以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殖民地戰爭，成爲世界之一大流行。

這個流行，實是已經過殖民時代以後的時代落伍的流行，故如已經過此時代的

歐洲先進國，與美國樣毫不感到殖民地的必要的國家，都幾乎沒有什麼實際利益得到，只是比較的落後入於殖民地時代的俄國與日本。則由此而踏上入於世界的資本國家之列的過程，而如俄國，則以此故，造成了帝國沒落之第一原因。

先進諸國對於中國的領土的侵略，如香港是英國鴉片賣買的根據地，爲實際利益所關，黑龍江省是俄國的殖民地，有實際用處，滿洲是所以備俄國侵略的防衛地帶，於日本也有實際用處，除此以外，如廣州灣，青島，威海衛，對於英德法等國殊毫無實際利益，即以還給中國，也是沒有什麼大損害的。不但此也，如安南在法國不過一個潰瘍狀態的事物，而如香港九龍，時至今日，若以之歸還中國，在英國也沒有什樣大的打擊。因爲今日的鴉片貿易，即沒有領土的根據，在輸入或祕密輸入上已是毫無關係了。

所以想領土的瓜分中國的事，在今日已非各國的主意，但是直到最近，因爲各國都沒有捨棄其傳統的國家的侵略的信條的勇氣，故仍觀念的保存着產業國家所必要的領土慾，而其政策亦不免以此思想爲基礎。

各國這種錯誤的行動與其不錯誤的侵略的行動相關聯，同時與中國之舊國家形態以致命的打擊。受着這個打擊的中國本身，則亦對之發生反應，自然是還得受中國特有的事情的支配的。

八

自然，孫文所圖謀的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其直接的刺激是日本的維新史及其後的憲政運動，這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來的，質言之，這實在不外是轉向世界近代國家的運動之重演，所以帝國之潰滅而成爲共和國，決不是特殊現象。蓋事實上軍國的統一者若依舊爲帝國之制度的中心，則其轉向近代國家之運動，必捨去帝國而轉爲共和國；故當此過程，卽不形成共和國，在某程度上，事實上之軍國的統一者亦必非至與帝國制度上之中心分離不止。中國既完全不是此種分離的形式，故由事實上的軍國家中心的倒塌，制度上的帝國之潰滅乃爲當然的事。因此市民社會的組織的近代國家，對於共和國多一點也不感到不便。凡此諸點，中國實是一點特有的現

象也沒有。

但是舊帝國倒壞了，中國於此却不見如日本及其他向近代國家而推進的歷史，而成爲一種軍閥割據狀態。近代革命，結果却使中國逆轉至封建割據的中世紀的國家狀態。固然，日本維新的當時，也差不多有這種危險潛伏着，以德川政府之急激潰滅，實具有形成封建諸侯小軍國的割據狀態的傾向。而日本之所以卒脫此狀態者，則因爲維新的革命，其爲國民的統一之信仰的中心，卽皇室，是存在着的，日本有此以爲國民統一運動之心的中心，而由封建末期之疲敝狀態與德川政府之傳統的政策以來的封建諸侯之財政狀態，則實未嘗與此等小軍國國家以可以自立的經濟的根基。

中國的情形與日本不同，當清朝之末期，中心帝國之財政關係，對於地方官之專擅已在無可如何的狀態，國家的收入，大半入於地方官吏之腰包，自己課着中央國家所不知的重稅，甚至以水旱饑饉等虛僞的報告，私扣稅金，要求國帑。據劉坤一張之洞的上奏，說這是地方官俸銀過低之故，而實則是因爲中央權力之弛緩致發

露地方權力之獨立性，以後軍閥之產生，到底不外是以此地方的勢力爲立腳點的。故以中央軍國的統一之倒壞，遂使此等地方勢力成爲獨立的封建國家的形態，本來，以地方政治及軍國的組織之均衡爲基礎的權力關係，便是使全國陷於無政府狀態，並發生無數的地方國家的。

但是中國的此種形勢，却不是革命後的現象，反之，中國革命，實是由此等地方的國家形態之協力以成立的。如爲此地方勢力之一的袁世凱，其態度的向背，實決定中華民國之成立。

民國之所以成爲軍閥割據狀態，其主因雖別有在，但其所以致此，外國勢力實非常有力，是造成此亂脈狀態之重大原因，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關於這點，外國還應當擔負十分之九的責任。各國一方面以其利權之地理的分布，聯結以此爲根據的軍閥，同時並由中央有勢力者之收買，實行其借款政策。向來各國對於中國軍閥的政策便是這樣。

但是若說此是今日中國特有的事情，則毋甯說根本不是中國的事情，因爲當拿

破命時代，尤其是拿破侖三世時代，在歐洲，這現象也很盛行的。

九

至於說根本的是中國的事情，與民國的現狀以特殊的色彩的，則在一方是中國市民社會之特殊性質，在他方是中國過剩人口的社會的重要性。

中國之市民社會，即在現今已表示着與世界的市民社會並不是什麼性質相異的，但是仍不能脫幾分中國特有的情形。中國之資本主義化，既已是確定的事實，其市民階級的性質，亦為由資本主義之世界的共通性而構成的事物，但孫文的革命，結果却不是立憲政治，而為軍閥的割據狀態，推原其故，實由中國市民階級所具有的一種特質。

中國之商人與農工大衆，自古即是決定中國這樣一個大區域的社會形態之根本要素，對於中國之社會形態——不是對於國家形態——其勢力實是獨占的，且決定的。至於中國的國家，則與此社會形態相離，浮遊於其上空，恰如一個外國的征服

國家。因此，要像中國國家形態與中國社會形態樣之無交涉者，實世無其匹。看來這好如外國的支配者，但是外國的支配若爲近代的，則因爲支配國是產業國家，常把被征服國的社會形態當作本國產業的補助的事物，結果使被征服國的社會形態隨之發生變化。但是中國的國家，却不是這樣，因其征服國不是產業國家而爲軍國國家，故其支配，爲對於全個中國社會的一種具有合法的掠奪制度的事物，是古代的。

一般的，對於這樣形式的國家社會是取怎樣的態度的呢？則在中世紀的社會，由其實例之所示，卽以商工社會之獨立的形態而存在。此種獨立的形態，以商人工人對於社會之機能爲基礎，自己成立形式上與政治的支配相對立的社會集團。此種社會，或爲基爾特，或爲組合，有一定的組織，（雖然也有無組織的），大抵都在市或村之地方的社會，以共同的職業，原樣的使機能的社會實際繼續着，如農民方面，很多是取這種地方的形式的。中國社會，在各種意味上，各種對立社會的形態都甚發達。比較進步的商人，其基爾特的形態，當未發達爲商會樣的行政團體之初

起，曾以同業，同鄉等要素，其對立社會之結合，亦非常發達。這是純粹的使軍國的組織得以持續的事物，與軍國國家形態互為因果關係，而國家形態愈與社會形態無交涉，則與此相對，立脚於社會生活之諸集團益成爲對立的。又，此等工人商人農人的集團，愈成爲對立的，國家便愈成爲浮游的存在。

民國成立以來的中國，所以與日本維新後不同，產生許多軍閥國家，致戰亂彌蔓於全國，這種對立的形態實應負其責任。原來一切對立的社會，由其自然的傾向，以生活樣式的殊異，致異其生活心理，各對立社會成爲非常偏狹而排他的，其性質恰如舊國家之互爲排他的一樣。要之，此種社會，上面戴着專以掠奪壓迫爲事的軍國國家，而在橫的方面則有社會生活上之生存競爭者，爲維持各自的生存，採取極端的防護的態度。如日本樣，因爲自然的領域甚小，不能產生大軍國國家，因之，其國家形態亦不如中國埃及希臘那樣與社會形態分離。日本中世的領主，在某程度，由生存上的必要及傳統的地位，對於社會雖處在壓迫掠奪的地位，但是卒沒有完全成爲如外國的支配之形態。故在日本，其社會之諸集團，亦不如諸國之基爾

特與組合樣具着極端的獨立社會的性質，因之，其對國家，一般社會的關心之刺激亦比較的急速。

日本維新的革命，所以能急速的刺激一般社會對於國家的關心，即由此故。反之，中國革命是由先覺之士之社會的覺醒而規畫發生的，此等先覺之士，對於援助自己之商人社會，不能立即喚起其對國家的關心，如日本商人社會樣，故結果一般社會依然保持着基爾特的形態，對於國家之變革，認為與中世紀支配集團之轉換相同，出以冷眼旁觀的態度。

因為中國商人取的基爾特人員 (guildman) 的態度，對於國家組織毫不關心，結果實與中國革命以特殊的性質。

十

原來孫文的革命，是受的東洋日本成立近代的商人國家的刺激。遠在日本成立近代的商人國家以前，受西洋產業國家的侵略的中國，由歷史的順序言，其由軍國

國家推進而爲近代國家，照理應當是在日本之前，但是依然保持着舊國家的形態，這實由中國龐大的國家形態使然。故就其離去全部停頓狀態而進步的地域以言，其以全部停頓狀態爲根基的國家之依然存在，可說是完全不可解的現象。但是此等進步的地域之所在，是有多數發達的商埠地方的南方，故中國近代國家化之必然性，先出現於南方是當然的，因此，革命亦由南方開始進展。再，此等進步地域之進步的社會狀態中，其活躍的社會人，實爲漢民族，因此，革命成爲漢人的事業，以『倒滿興漢』爲標語。

但是這個革命決不是人種之爭，這是因爲有了近代的進化的社會人，處在進化以前之國家形態下面成爲不可能的事情的緣故。自然，全是由於社會組織之進化而來。但是，不管有此進化現象，中國商人依然以爲上面是舊形態國家，固守着基爾特的獨立的地位，因此之故，能夠明白認識社會組織之進化及與之相一致的國家形態者，不是商人，而爲通曉世界形勢的知識階級。商人只因知識階級的運動是所以排除阻止商人自體組織之近代化的舊國家，因之對革命運動與以援助，商人的地位

實是這樣。但是這種情勢，仍不能打破中國商人傳統的基爾特的地位，商人對於在商人國家形成過程上之近代革命，依然是第三者的態度，於是結果，革命幾爲知識階級的事業，是在孤立狀態。

革命，倘若只是由於知識階級的動機而生的事業，那末當時的中華帝國，即清朝，或尙不致滅亡亦說不定。但是中國之近代國家化，當清朝之末世，最初由政府自身的自覺，知以軍國國家的組織爲基礎的傳統的國家組織之變更，實不容緩，既而一般政府部也意識到這情形，由所謂『變法自強』的根本的改革，以應此時代的要求。由當時單純的知識階級的要求，我們即推擴其政策至於極端，或者還是以保存帝國而加以近代國家化爲滿足的，但革命不是此種知識階級的要求，這是代表由商人社會之進化而與帝國的國家形態不相容的，近代意識的產物，革命的圖謀，便是想把歐美近代國家的形態立即移置於中國。這到底還是知識階級的事業，但却不是舊來中國所產的知識階級，這是爲歐美近代國家運動的產兒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人雖是中國人，但是產生他們的是歐美及日本的近代國家的歷史。本來，這

種傾向，近代國家的趨勢，早已入於昔日中國之商人社會，故產生中國革命家的歐美的近代國家的意識，同時亦爲中國商人社會之潛意識——因爲他們自身，還沒有自覺呢。

十一

當時中國商人社會之近代國家意識，因爲完全是潛意識的，他們自身尙沒有自覺，故商人社會對於壓迫自己的軍國國家之摧毀運動，卽革命，只立在援助的地位。因之，對於由此革命以成立的民國的組織，沒有干預的意向，對於此新國家，依然守着基爾特的獨立的地位而對立着。

在這樣對立的形勢之下，以知識階級的事業而成就的革命，其形式自不得不與單純的政治革命相似。革命在這形勢之下，依然與政治階級之內亂相同，隨着形式的與抽象的政治組織的變化，墮落而爲政治的權力之轉換。本來，要求實際革命的是社會的進化。此進化的社會之生活組織，因爲有對國家組織，基爾特的相對立的

事物，故國家形態即與此相應而有變化，亦完全只是形式的變化；故與其說進化的社會有自體的國家的成立，其性質甯說是應着進化的社會之形式有政治階級的國家之成立。但是這個政治階級在尙沒有得到十分的獨占的地位之時，却不得不由一般政治階級諸勢力的均衡狀態，以支持此政治組織。

革命像這樣成爲與政治階級內部的內亂相似，這並不是因爲中華帝國向來的組織滅亡了，而因這只止於權力關係之變化。以此之故，由舊統一國家之分解發生諸勢力的對立關係，乃爲當然的事。民國成立以來軍閥之割據狀態，全因中央對於舊國家的諸勢力，失其統制的結果所發生的現象，民國對此既沒有收拾方法，故所謂革命政府，到底只是由此諸勢力的均衡狀態以成立的事物，是繼承舊國家的政治組織的。

十一

中國革命尤其與日本維新的革命相對比，值得我們的研究。中國革命是因爲在

統一的軍國國家之內，有近代的國家狀態之成立而發生的，至其近代國家的條件，則早已有社會的成立。不過因爲其社黨的組織是基爾特的與舊國家組織相對立，採取一種非政治的態度，致革命成爲政治階級的性質之事物，與近代化之社會組織遊離，政治組織自體的機構亦墮落於舊國家的權力關係。反之，日本維新，其動機肇始於謀統一封建的國家組織以爲帝國之過程，比之中國革命，實爲更前代的。但是此封建國家之崩壞，可不是由於國內已有近代的社會狀態之成立，而是由於諸外國的侵襲，致爲封建國家之中心勢力的德川政府之軍國的組織，完全暴露其無能力。因此之故，國家組織不得不求相異的中心以代有力的封建國家。這個變化的動機是由於外國的侵襲，於是自然的，有日本民族意識之勃興，及以此爲意識中心的朝廷的復興，通過與世界各國封建國家崩壞的歷史相同的過程，而有統一的民族國家之成立。所以其國家形式之變化，是因近代的產業社會在形式不同之新國家下發生了出來。關於這個發生，新國家之諸權力，實盡了協同的努力。換句話說，日本轉向近代國家的進化，是由社會與國家的協力而達到的。故在日本，新國家之組織，實

是延攬協力者共同努力而成，社會上的諸勢力，對於國家組織，決不是立在對立的地位，而是加入其中的。這是日本的立憲政治所以能成立較早的緣故。

在日本，向來中世紀的基爾特不十分發達，加以也不像中國似的，國家之一部已成立爲近代化之社會形態，而對於舊國家仍取一種對立的地位，日本因爲沒有這種事情的存在，所以其社會上的諸勢力，都能在國家的構成上發生作用。在他方面，日本之近代社會形態，發達於日本國家有統一的形式以後，是促進新國家的進展的條件。至與此進展相關聯的舊國家的諸勢力則既失其向來使小國家組織得以繼續的條件，並完全沒有保持封建的獨立形態之可能性。

但是中國，早就成立的近代的社會形態，其對舊統一國家毫不相關的存在着的歷史，到了新國家仍是繼續着，還有同時，更具備有使從統一國家分解來的諸勢力，逆轉至封建組織的條件。此等有力的條件之一，便是前曾提及的中國過剩人口問題。

中國革命之動機是由於市民階級的產生，但因市民階級之基爾特的態度，對於革命意識之把持者與爲革命之社會的動因的階級仍然是對立的，因此革命不能如所期的成爲市民國家，而爲軍閥的小軍國國家之割據狀態，這是我們在前面業已講過的。不過市民的態度對於此小軍國國家之成立，還只是間接的責任，爲其直接的責任者是中國特有的過剩人口。倘若沒有具有着過剩人口的社會狀態，則帝國崩壞後之小軍國國家是無從簇生的。

關於中國的過剩人口，除每年移居滿蒙之貧民外無正確的統計，但由中國本部移居滿蒙的人數以觀，在最近一年即有一百萬人。此等人民，大抵去自山東直隸等人口稠密的地方，固然這是不能律之全體的，但從國家之一部，每年移出的人口數目達於百萬，這樣的國家——並且還具有滿蒙樣真空地帶的物理的情形——真是世界稀有的。

此種過剩人口，與近代的產業國家之失業者不同。失業者是由於消化此失業者之產業機關之停頓，即不消化的結果而生，所以他的過剩是以特殊的近代的產業組

織之發達爲其前提的，而中國的人口之過剩，則爲近代的產業組織之前，在軍國的掠奪政治下之幼稚的產業狀態所生的結果。

中國的過剩人口，其發生是由於以幼稚的產業狀態與使產業狀態陷於幼稚二者爲成立條件的軍國政治；再因爲產業狀態的幼稚，所以自始即無消化此人口的機關之存在，於是有過剩人口的產生。但是軍國的支配，其立腳實在幼稚的產業上的掠奪的財政，因此使人口二重的過剩。

但是此種過剩人口，在古代之軍國國家亦有發生的可能，而事實上並是能夠很多的產生的，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在中國，這實是數千年來的事實。於是結果，中國的過剩人口，形成了一種完全特殊的生活狀態。貧民階級的人們，雖在極端貧乏的狀態，而仍能適當的保其生存。他們是在這樣的一種生物學的狀態。他們能夠忍耐普通人所不能忍的生活，極端的說一句，他們是能夠忍耐動物的簡易生活的一種特殊的人類。

這樣性質的過剩人口，至多惟在古代軍國國家，把敵國人民當作奴隸時，始有

此現象。此種奴隸，在希臘羅馬等國，即已失其原始的狀態而與自由民的水準相近，這是因為希臘羅馬的文明狀態，富於人口的消化力，至其所以有向外國獵取奴隸的必要，則因為諸國的勞動人口不足的緣故。

但在中國，其原始的奴隸人口，因為產業狀態常在原始的情形，造成了高率的過剩人口，而此人口既獲得忍耐窮乏的生物學的形質，遂具有盛大的繁殖力，於是比例一天天的增高，以至有今日的現象。

所以這樣的人口存在，實即是對於原始的軍國國家的奴隸人口的需要，具有十分的供給力。原來軍國國家，不論是他的武力的構成，或者軍國的設施，或者文化的設施，都是需要此種奴隸人口非常之多的。倘若那地方沒有可充這需要的奴隸人口的供給，那末決不能產生大軍國國家，並且也是不能存續的。

中國對於這種軍國國家的需要，實是具有無限的供給力的國家。在非人間的生存條件的待遇之下，有為兵士，為工人的無限的人口存在，這是中國歷代帝國國家成立的條件。

但是此同樣的條件，也就是大清帝國崩壞以後所發生的小軍國國家所以成立的條件。軍閥的諸勢力，要之，與古代的軍國國家相同，是由掠奪的財政，及使過剩人口武力化的資力爲比例的。不過革命後中國軍閥的勢力，則於掠奪的財政之外，還以外國資力所加的程度爲消長。

十四

中國革命，以上面所述似的那種特殊的形勢，於是說這是使中國常爲異於世界近代國家形態之事物而保存着的，但這是沒有理由的。

這說法與中國到底能否成爲世界的市民社會的問題相關，然而此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本來，中國商人之基爾特的組織，是由中國商業社會在中國大陸上的政治情形而生，正與歐洲的基爾特由歐洲大陸的政治情形而生一樣。即中國大陸的商業，是超過中國帝國國家中地方勢力之小國家的支配領域而國際的行動着的，因此，其商業社會，自不得不形成一種與國家的支配相對立的基爾特國家。在這種狀

態下的商業社會，其商業區域逐漸次擴大爲世界的。故具有此種中國的特性的基爾特，由其近代商業之世界的性質，是必然的能夠制勝的。中國商人，因爲既進於世界的資本主義之中，自然勢必要消失以中國大陸之舊政治狀態爲條件，發生於中國大陸，限定於中國大陸的商業上的諸性質，而具備世界的商業，即資本主義的產業組織之諸性質。

由上所述，在理論上是沒有疑問的餘地的，此外，還有可資以爲證據者，則以美國日本的近代國家的發達之刺激而起的革命，中國商人都對之與以財政的援助。如以前所曾言，所謂革命家的，單是意識的把持者，至以社會的現實作此意識的根底，使成爲生活者，則爲商人的市民社會。固然，中國人對於近代的產業組織是沒有習慣的，給一般主張中國未嘗資本主義化的人們引爲實證，但此雖爲由中國數千年來之國家形態所生的習性，當此世界資本主義既已侵入中國大陸，以中國商人加入世界的活動，實具着使中國人脫離此習性的力量，這是由現在中國產業之着着資本主義化，便可以明白的。並且革命的要求，不論他的歸結是怎樣，本來是以圖

謀建立近代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爲起因的。

中國革命所要求的是近代國家，然而當其革命的進行中，世界上的近代國家，已現着向下一時代轉換的徵兆，即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破綻，而有世界戰爭，以作殖民地的榨取的目的地之未開國的產業的發達，對於外國的侵略，成爲自然的及人爲的障壁，而一般的產業的不安，亦使以資本主義的侵略爲背景的軍國的勢力，發生影響，此外還有促進殖民地的反抗的許多事情及俄國共產主義國家之成立，凡此都是在此歷史的過程上益促其相應的意識之發達的。

又中國革命以世界的形勢，當然要從政治的性質移轉於產業的性質。即從到近代的自由主義國家的革命，轉向社會主義國家的路。孫文三民主義中的社會主義的傾向，即其結果，而蘇俄的物質的及精神的援助，實使之有加速度的進展，使之向以共產主義爲其理論與實行的中心而進。

中國的土地，所以合於共產主義的培養的理由，歷史的社會情形固爲其一，而與之相伴的民族的性格，亦有不少影響，但是比比此更重要的，如今日樣的有過剩人

口的存在，到底不能不認是有力的條件。不過若說這是成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有利的條件，則毋甯說是使共產主義的運動有利的條件，比較與現在情形相適合。

十五

在中國，向來反抗歷代帝國國家之叛徒，都是由結合過剩人口而成，並且還多少常帶着共產的性質，但是此共產的性質，若說是反亂團體結成的條件，則毋甯認構成可以結合的過剩人口，是無產者集團生活的特徵。即其說不是具體的生活的特徵，但其具有此意識的傾向是確然的，所謂共產者，由財產私有的事實，這並不是與人以特殊的所有心理的一種人類自然的心理，因此，無產者心的傾向，不問國家與民族之如何，其必為共產的，蓋為共通的事實。中國革命之共產主義，在理論上不管是怎樣的形質，而結合中國大眾的能力，實比其理論的特殊性，更能利用人類本來的共產的傾向，這是與古來的反亂團體，我們可說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若中國近代的產業組織的發達，能把過剩人口的性質從古代國家變為近

代國家的，那末事態自然是要不同的。由此情勢，以近代的勞動大眾之結成，共產主義自必向着政治的形式而發展，這時的共產主義，決不是古代的人間心理，而為近代的社會科學的意識。

所以中國革命中的某種共產主義，決不是立足在這近代社會的條件上的。共產主義者之主張與理論，雖然是社會科學的，但其運動之具體的性質仍舊是此具有高級社會意識的政治階級的勢力，是由結合古代的過剩人口而成的。這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故由此以觀，所謂共產軍隊，實是與軍閥軍隊同在一社會的條件之下成立的實力。現在中國革命中共產主義勢力之所以衰落至今日的狀態者，便是由這緣故。

中國革命的歷史，凡是今日以前的，無論怎麼說，是在向着資本主義的近代國家前進的過程上的。以結合過剩人口為中心的共產主義，實在不是具有與革命運動之社會的條件相一致的科學的性質的事物。科學的共產主義須有政治階級的意識始可能，不是支持革命的社會的要素的意識。而況支持革命的社會的要素之意識，還

依然是正向着近代國家的過程而前進的市民社會呢。

十六

不但使這種形勢更頑強，並且致於墮落的形勢者，是革命運動之具體的方法。

革命當以廣東爲中心，南方一帶爲其領域的時候，其性質之共產主義化尙比較的不困難。自然此所謂共產主義化，在那一帶地方到底能否發達成爲共產國家，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在那地方的獨裁力，實表示着有可達到某一程度的可能。如對於香港之壓迫能夠非常有效，對於以廣東商人基爾特的武力爲反抗的行動，能夠有強力的壓迫都是。

但是此種革命的勢力，隨着漸漸的領域之擴大，而失其獨裁力。這是革命的軍事行動之必然的結果。因爲各地方的勢力，多少保有一點舊國家的實力，其對於革命的軍事行動，或者參加，或者加以阻害，是具有這樣的力量。加以同時，構成革命軍的諸勢力，也是含有此等舊軍事勢力，而其歷史的性質尙沒有完全消失的。

因此，這種軍事勢力之鬥爭，勢必要承襲舊軍國國家之舊套，爲毫無社會勢力的根柢的軍國國家之殘片，以其掠奪財政，結合過剩人口成一勢力而彼此戰爭。

這樣的形勢，在革命政府進到長江沿岸以後，更有急速的發展，這是當然的。因爲小地域的獨裁勢力，以進到中心地域，遂不得不與更強力的近代的市民社會相接觸了。長江沿岸，在中國是近代國家的地域。因爲革命政府在未進到此處以前，沒有打倒近代國家的科學的方法，所以所謂共產主義，結果遂反爲此廣大地域之資本主義社會所打倒。

然而於此，革命政府還不能不實行不可能的北伐。由今日的成功看來，這或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由北伐的成功，革命政府完全降服於市民社會，則爲不可掩的事實。因此之故，致排除了革命中最革命的要素。國民黨最後的進展到社會革命的性質，現在却逆轉於最初的目標，漸次結晶於近代國家之政治形態。

自然，這是中國國家的異常的進展。中國，本來已在限定的地域以內，完成其近代國家之社會形態。民國紀元，可說是近代國家的紀元。在中國大陸建設近代國

家的政治，這是歷史上的大事件。這事情若成功，歐美列強在中國大陸的殖民的慾望，便將全部斷絕了。

但是，中國革命，倘若不以某種事情，自限於名義上的中國統一的目標，分中國爲二，以其一半，建設與近代國家全異其形態之新國家，要是由此能夠造成完善的基礎，那末革命的性質，其支配中國大陸將來的運命，比之今日，也許更有力罷。由此，我們可以說北伐實是使革命的性質逆轉的一個有力的動因。

十七

中國革命，具着於近代國家之成立告其終結的形勢，本來我們是早已預見到的。當舊民國崩壞之時，中國社會之市民階級的性質，尙難於透視，故頗以爲有逆轉至軍國的帝國的危險，但是事實却漸漸的向着市民國家的運動進展，只是有一種非常有力的阻害，那便是外國勢力。爲的要保存中國的殖民地的形質，向着市民國家的進展是一種禁止的行動。外國的意思便是想在中國大陸的重要地點，建設完全

是近代國家的形態的非中國的地域，而保存其背後廣大的未開地域，為培養近代產業的地域，這實是最有利的方法。

由這方法，於是中國之近代國家化遂漸漸的不免有不可能之勢。尤其因為中國人，就其商業的能力言，就其資力言，就其勞動力言，就其莫大的勞動人口言，就其產業地域之廣大一點言，就其供給力與消費力之無際限一點言，這樣的國家，若一旦發達而為近代國家，則我們儘可以說世界的中心難免要移到遠東來了。

到了那時，本文先頭所述的奇異現象，將由注定須有這許多奇異現象的運命而消滅於中國大陸了。而如上海青島大連等，必將繼續發展為比現今更文明的都市，由中國自己收回了。

中國現政府正是向着近代國家的過程而進，這使我不禁抱着這樣的理想。因為我們到底還是希望其有此非常的進展的。但是中國若從國內而轉至美國，那末結果實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以新生命。自然，在這其間，資本主義的國家形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那是另一問題了。

謎樣的中國問題

——山川菊榮

一 中國人的要求

「是距今四年前的事了，從上海到北京去的火車，在半路上受到了盜匪的襲擊，致全體乘客都被擄以去。其中有許多是外國人。後來這一行人總算釋放了。列強壓迫中國政府，要求外人在拘禁期間損害賠償，每人每日二百五十元。

「恰巧在這擄人事件的時候，上海租界上，有外國人的汽車輾死了一個中國人。當時白種人管理下的會審公廨，判決無恤死者的遺族二十五元，作為損害賠償金。這個數目，恰合於把白種人，只是拘禁二小時所需的賠償。

「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現在，中國人的氣概，與前大不相同了。他們覺得在本國中這種毫無理由的人種的差別，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說起來，從前那樣的差別待遇，便是現在反感的原因。但是外國人怎樣呢？除了「最後通牒」，「強制」及「即

時共同動作，等高調以外，在這期間，外國人不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得麼？」

這是當南京事件時，某美國雜誌對於列強的干涉政策所下的批評。

可是中國爲了什麼這樣奮然四起的呢？一般中國人爲什麼覺得非奮鬥不可呢？因此之故，日本以及列強各國，難道便以爲非遣軍隊，派軍艦到中國不可了麼？說起中國所要求的，便是世界獨立國中無論誰都應該有的關稅自主權，及領事裁判權的撤廢；但是政府，既成政黨，及報紙新聞，爲什麼都覺得非反對不可呢？

中國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有『唇齒輔車』的關係的，這類的話，便是我們從國民小學起就教着的。但是我們對於這『同種同文』有『唇齒輔車』的關係的中國民族，試問曾有過應該怎樣相愛，應該怎樣去理解的教言麼？歷史教師在說中國古代是怎樣的代表文明的精華的同時，並說現在是怎樣，因爲自己無智無能的結果陷於奴隸的狀態中了，他不是這樣以之與日本的戰勝，領土及賠款的獲得等事相對照，用着譏嘲的語調說的麼？

對白種人呼叫『人種平等』的日本人，現在却與中國人口中對之有同樣要求的白

種人——除了俄國，因為俄國雖是白種人，却對中國已放棄不平等條約了——採取「共同動作」，用軍艦大炮以回答中國人的要求。原來在日本人，也是和白種人一樣，以為中國人的生命，不過值得自己二小時的拘禁的價值而已。

我們常聽到說，中國是「謎」樣的國家。

以這樣的偏見為基礎，對於中國問題，無怪其如謎一樣了。既然不是同等的人類，而竟要求同等的權利——這不是一個謎麼？據說上海外國公園的門口，嘗寫着「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通告。在外國人的眼光中，中國人是與狗同等的東西。以與狗同等的東西而竟向人要求撤廢不平等條約！這完全是一個「謎」了！

但是，白種人，還有日本人，一走進這如此可輕蔑的劣等人種的國家，雖然是怎樣的被憤恨憎惡，為什麼却一步也不肯讓的執着的呢？真的，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

一一 最近中國經濟界的發達

具有比北美合衆國更廣大的疆域，具有足以與全歐洲相匹敵的四萬萬的人口，而工商業未臻發達的中國，在已走到碰壁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當然是最有希望的市場。加之如鐵，煤，煤油，及其他近代社會所必要的各種地下的富藏，由肥沃的國土所產生的豐富的原料，幾乎都是未開發的富源。所以投資於中國，實就是握得這個無盡藏的寶庫的鎖鑰。

列強探手於『睡着的巨漢』的懷中，把這鎖鑰拿了來。巨漢在睡夢中聽只有悉力索落的珍寶偷運出去的聲音，不禁張開了眼，醒了過來。外來的貴客於是便用軍隊與軍艦來回答他的抗議。巨漢家中的主人，因為鎗刺逼着胸膛，只得承認寶庫鎖鑰的管理，是外人的既得權。照文明國法律的規定，凡是由脅迫所結的契約，在法律上是不發生効力的。但是，文明人以爲文明國的法律，是不適用於文明國與非文明國的關係的。倘若有人抱着這種疑慮，那末他便是犯罪！這樣的疑慮是只有用大炮的巨彈去擊破的！因此，世界資本主義國。說起來是以刀鎗與大炮的力量，在中國

實行其普及『文明』的使命的。

最初強輸這種『文明』於中國的是英國。大約九十年前的時候，英國爲了販賣鴉片於中國人的自由，與中國政府宣戰；還有是包括鴉片在內的貿易自由，於是奪取了中國南部軍事上及商業上的重要地點香港。自此以後，漸漸的扶植其勢力於長江沿岸，把這一帶廣大的地方，成爲其資本的屬領。因爲這一帶是產生近代工業上最重要的煤鐵最多的地方。

到了中日戰爭及義和團事件的前後，看透了老朽的中國，封建的中國的內幕的列強，爭相以武力或賄買腐敗政府的大員等手段，占有中國的領土，以榨取其富源。其後經過了中日，日俄兩役，日本在中國北方的地位遂如英國在中國南方一樣，或者更過了，成爲牢不可拔。現在似無須再說了。

對於這樣無盡藏的自然富源。及以低廉的賃銀而可以如牛馬樣加以役使的無智順從的勞動者，立在無限制的榨取地位的外國資本家，於是以突飛猛進的勢力，布其根基於中國全土。只在二三十年以前，那時中國還是原始的農業與幼稚的小手工業，但是現在，長江沿岸各地，有最新的設備與組織的大工廠，水陸兩方都有近

代的運輸交通機關，正以凌駕先進國的速度，開始着工業化。說起工業急速的發達，試以棉業爲例以示一般。中國是世界第三的棉產地，當棉紗工業未發達時，他輸出棉花，輸入棉紗。但是以棉業之發達，中國內地亦有棉紗的生產，於是一九一三年度約三億六千萬磅的輸入，到了一九二二年度只是一億六千萬磅，即減少到一半以下，棉紗的輸出在一九二三年度是五百十七萬磅左右，比之前年度增加百分之五十。這個棉紗輸入額之減少與輸出額之增加，合計約一億九千餘萬磅，這便是中國棉紗生產之增加。實際上，在這期間，紡績工廠是倍增，同時以棉紗生產之增加，織布業方面亦大進步，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這四年間，動力機增加至四倍。至於其他工業，雖然沒有紡績業那樣明顯的變化，尤其是機械工業的進步較落後，但是在中國其必要的資源既這樣的富饒，當列強各國爭着努力以開發其富源的今日，在這方面自必有躍進的發展的。

在生產技術方面，既然有了這樣顯著的進化，結果自必至連帶引起社會的變化。封建的中國是農民的中國。即在今日，全人口之八十五乃至九十，還都是農民。

但是以工業化的結果，人口的比例上，勢必產生在社會上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勞動階級。這種階級中人，大都是在外國資本底下，強迫的承受着極惡劣的勞動條件與低下的賃銀，他們爲着要維持勞動條件及圖謀改善，不，還是說爲着要維持生命，勢必至時時有與資本家的抗爭。但是在這裏，有所謂領事裁判權。對於中國，以一切人種的偏見與差別的習慣，儼然有不成文法之存在。而中國官廳——封建的軍閥——實際上是列強帝國主義之傀儡，他們對於本國的民衆，却一點也沒有保護的能力，保護的意思！

中國農民，其大部分爲小自耕農，一部分爲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與佃農，在外國資本未流入以前，雖有軍閥地主，及寄生在他們身上的中間階級，苛斂誅求，但是日夜克勤克儉，到底尙能維持其貧乏的生活。其後以交通的發達，貿易的興盛，中國農民所生產的低廉的糧食，源源不絕的輸出於日本及其他各國，於是內地食品的價格遂以高漲。加以工業之發達，棉花煙草之種植成爲有利的事業，馴致種植五穀的面積日以減少，即種植工業原料品的面積於以擴大。再以連年內亂不絕，

支配階級的剝削因此益烈。由此社會的變化，於是在飢餓的鞭撻下的中國農民，遂不得不捨其祖宗相傳的土地與事業，或者是被攘奪了，致他們成爲除勞動力以外，毫無所有的無產者，相率而流入列強帝國主義之根據地，卽商埠的大工場地帶。在這中國的貧農階級與勞動者階級間，其日常的直接交涉，茲姑不問，我們從根本的來看，他們實是政治上，經濟上，被虐待最甚的，最貧困的階級。由這一點，所以彼此之間，有鞏固的一致的利害關係。所以爲反帝國主義之原動力者，便是這二個階級。

但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不單是貧農及都市無產者的運動。這是一種遍於中國全國，包括各級社會的人們的東西。可是我們要知道，在這點，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特色，也是他所含的弱點。

在國民當中，有一種階級，介於外國工商業者與中國市場之間而從中取利的，或者與外國資本共同經營事業的，這是中國的資本家。這種人因爲與外國資本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對於自己有不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自然沒有參加的勇氣。

其次，就中國的工商業資本家而言，他們因為外國資本家有妨其經濟的發達，在這點上，他們是與帝國主義為敵的。因此，在打倒外人的特權這點上，他們贊助反帝國主義運動。可是反帝國主義運動，不只反對外國的資本家，中國資本家也是敵人，因這一點，所以他們到底不是誠心的贊助的。質言之，他們不過欲利用貧農及勞動者之力，驅逐外國資本家，而確立中國資本家的地位而已。

再其次，有所謂小商人及夥友店員等都市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與貧農及勞動者同是帝國主義保護下的封建的軍閥的犧牲品，在這點上因利害的相通，所以他們是能共同行動的。

再在地方上，尚有誇着門第與豪華的統傳生活之地主階級，他們是與列國資本家及軍閥，彼此互相呼應，以榨取農民的。

在中國國民運動當中，便是包括着這許多複雜的利害懸殊的社會的階級。

三 國民運動與列強之利害

中國之國民運動，不是日本維新當時那樣的排外運動。國民革命在某程度內固與明治維新含有共通的社會的意義，但是以五六十年來世界進步的結果，現在的中國民族，決不如往年之日本主義者，目的在禁止與外人的貿易及外人的登岸。中國人所要求的，只是獨立國應有的權利。即不平等條約之撤廢。關稅自主權等。說起來凡屬獨立國，在今日的世界，不論是誰，這都是當然的權利。

但是列強各國却不承認中國有這當然的權利。其照例的藉口，便是中國現在還沒有達到文化的水準——如說每年內亂不絕，國內不能統一，沒有能夠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力量之中央政府等。

可是我們禁不住要想起。這種內亂的原因。實是封建的軍閥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從前與張作霖相對峙以逐鹿中原的吳佩孚，誰都知道是英國資本的工具。後來吳佩孚戰敗了，一個兵也沒有，一文錢也沒有，這樣的大家以為從此當消滅了；可是不久，他帶了數師的軍隊與無數軍餉又在那裏出現了。英國某報曾說，「英國領事的神氣完全像從自己的袋內把吳佩孚拿出來似的。」吳佩孚因為南方國民軍，

現在是被擊敗到不能再起的地位，聽說已到什麼山寺出家去了。由這事實看來，不幸失敗的吳佩孚，在飼主的英國，也許是要從此捨棄不顧了。但是吳佩孚雖然失敗消滅了，像他那樣寄生於外國資本，不惜出賣其祖國與同胞的東西，却多着哩。因此，倘若一旦有了比他更好的後繼者，他當然是要被棄的。日趨衰落的英帝國主義者，對於年老無用的走狗，也是吝惜着他的食餌的。

日本與滿洲，即是與滿洲王張作霖的關係，現在是誰都以此為問題了！日本的報紙，照例中國的形勢若發展到與張作霖不利時，當即大聲的喊着『帝國的既得權』，『邦人的生命財產』，以及『東洋和平的威脅』等等來覺醒我們。張軍的不利，只要這樣，便可無須宣戰佈告，軍事費不經議會的通過，立即派遣軍隊到鄰國的領土，因為這已是很充足的理由了。所以張的地位，實與從袋內拿出的吳佩孚一樣，或者比這更奇妙，使世界的觀客真不知已幾次嘆為異觀了！

德國因為大戰的結果，拋棄了他在戰前所獲得的特權的地位。俄國由勞農政府進而與中國廢棄其不平等條約。在現在，對中國仍舊想維持不平等條約的只是日英

美法四國。法國爲利害關係最少的。美國在中國，一點土地也不會佔有過，以前對於中國政府，其債權與投資金額，都不十分巨大，只是在市場上與中國的利害關係比較的深，所以如英日的既得權，能夠一旦打破，於他是有利的；再從將來金融資本的活動領域來看，由不平等條約的撤廢以博得中國的好感，他反是希望中國能夠早一天和平統一的。只有少數在華的美人，因爲神經過敏要求對華武力干涉，但是美國一般的輿論，却反對這些，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撤廢很有勢力。因爲美國對華的輸入，大概以機械爲主，在這點上，所以即使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於他的影響也是很輕的。

英國的對華貿易，在大戰中雖大爲美國及日本所略奪，致失其獨占的地位，但是依舊具有莫大的貿易額，如長江一帶仍是他的勢力圈。這種利害關係，在美國實具着致命的重要意味。英國某政治家會說，「中國是能夠立即解決我們的失業問題的世界市場。因爲那裏能夠吸收巨額的棉貨，鋼鐵器具，鐵道材料，橋梁，電器機械，及我國多量生產的各種物品。」又英國某雜誌亦說，「能夠消化英國工業生產

品的偉大的，並且能夠繼續擴大的市場，在現在世界，無過於中國了。」

但是在英國，中國不但這樣經濟上佔着重要地位。其在政治上，實具有決定英

國在東洋方面——因之在世界方面的地位的偉力。使英國能夠發達到現在這樣的地步的，總說一句，是由於印度的征服。倘是印度的佔領及其民族之極端的掠奪，一旦不可能，則英國今日的地位固不能保，即在將來也是維持不下去的。但是印度是與中國接壤的，彼此都具有東洋最偉大的文明之先驅者的歷史，都是要在英帝國主義之下要求獨立，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具着共同的利害關係的。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地位若一旦發生動搖，則其在印度的地位，自然是不難推想而得。但是印度自己間，却內亂不絕，其國民運動之進展，並不與英國以怎樣的預感。太戈爾因為英國利用印度軍隊以鎮壓中國革命，曾發表這樣激烈的抗議，說「這是蹂躪印人人格的難堪的恥辱。」大戈爾不消說了，即如有此自覺的印度軍隊，他們因為反對上海當局，不願意砲擊中國勞動者，致英人對於這種已派遣於上海香港及其他中國各地的，禁止其與中國人說話。總之，印度人不是盲目的，不是聽不見的。中國人是為

着什麼而戰？因此而收得怎樣的成績？凡此事實，在他們——同被英國在虐待的他們——的眼中，總不致毫無所見罷。中國人是爲着獨立而戰的。印度怎樣呢？印度人是爲的什麼而不戰的呢？

由上所說，所以在英國，中國的反叛其意即是對英國的反叛；而印度的喪失，其意即是印度的喪失。可是印度若真一旦喪失了呢？印度若真喪失，那末其意便將沒有所謂英帝國，可不是這樣麼？因爲沒有了印度，英國在世界的霸權，便將無由保持。所以英國政府，無論如何要拚着性命以與中國國民革命相抗爭，因此，英國對華的武力干涉，其所以要求日本共同動作，內幕意思，當可不言而喻了。

可是日本怎樣呢？日本在中國的利益關係，實比英國更爲深刻。日本以資本主義國在世界之一角唱着霸權，因此，滿洲與其所產的煤鐵，在他是絕對的必要。同時，爲的要無限制的榨取中國民族，於是領事裁判權亦覺得必要。而關稅自主權，其結果足以使中國的國內產業，以保護而發達，把日本貨物驅逐以盡，因此亦有反對的必要。這便是日本的既成政黨，不論是那一黨，其所取的對華政策，所以常以

「既得權的尊重」，「我們在滿洲有特殊地位」等等，露骨的表现其是帝國主義的由來了。

不過中國如欲建設鞏固的中央政府，則其權威所從以確立的「領事判裁權之撤廢」「關稅自主權的恢復」在他實爲必要；因爲鞏固的中央政府若既已有了，則此等不平等的事當然無從實現了。關稅照例是國庫歲入的重要部門，但在中國，他的關稅當作了債務的抵押，須受列強的管理，而其稅率若沒有列強的承諾，不得變更，數十年來，不能增加過於百分之五。這自然只是列強因爲要保護其自國的貿易，所以才反對中國增高稅率。一九〇二年，雖然與英國間有增加七五至一二五之協定，後來日本等國亦相繼承認，但是事實上還是毫無影響。據近來消息，南京政府已決定以九月一日爲實行關稅自主之期，宣言從此徵收七五，然而日本政府却提出嚴重抗議，說「有害親交」，而我們的紡績業者，亦因此而有「這是關係在華紡績業的重大問題，……近曾開委員會以討論對付方策，陳請當局採取適當手段」這樣的事。

日本因爲「國產品獎勵」，即保護本國產業起見，對於某種外國貨，曾一躍增收

百分之百的關稅，這事並不遠！最近因為恐懼米價跌落，於是徵收保護關稅以制限外國米的輸入。自己，關稅的障壁可以儘自一天天的提高，而對於鄰國相同的企圖則嚴重抗議，說是『有害親交』。說起來真不愧是有『唇齒輔車』，『同種同文』的關係的國家了，不愧是東洋的君子國了。

由上所說，所以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從日本資本家的立場來看，實是有關生死的問題。日本為維持其工業起見，必須從中國廉價輸入原料，加以製造，然後又低廉的輸至中國這樣才可能；但是中國若一旦為保護其自己的產業，與其他獨立國同樣，徵收保護關稅以制限輸出入，則在中國佔着首位的貿易的日本，勢必受到最大打擊，而日本工業的發展亦將為所阻止。中國現今，其蠶絲工業的發展，正漸漸的為日本的勁敵。現在廣東一省，若採適當方法，其生產能力已儘足與日本全國之繭產額相匹敵。所以這實是日本生絲事業前途的威脅。再，若美國的棉花的輸入，中國的棉製品的輸出，一旦斷絕，日本真是什麼都沒有似的就要發生恐慌。至於英國，其對中國的輸出，大抵是高級工業品，非中國一時所能自己生產，而如機械等

物，以後的需要恐將更加增大，所以關稅自主，即使實行，中國也不至課此以重稅，所以在這一點，英國的地位，比日本來得安全。

列強的利害，這樣以中國爲中心，實是異常複雜的。列強對於封建的軍閥，借以金錢，與以槍械，或使之戰爭，或使之妥協，而於其間造干涉的口實，候利權獲得的機會。列強以中國沒有鞏固的中央政府爲其繼續不平等條約的理由。但是中國若真有這樣的政府，則列強在中國當然得不到今日這樣的地位；不然，倘然將來而有這樣的政府，則列強決不能維持其今日似的特權的地位。說起來在列強，若沒有某種程度的和平與統一，他所投下的資本，所經營的事業，也是不能安全，不能有相當的好結果的。因此之故，各國只求在某程度內，於自己最有利的形勢下，有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這不是爲的中國人，這是列強爲自己所希望的和平統一。這與中國人自己所希望的既不相同，而列強間的利害又有不同，所以其間當然意見不能一致。而亦以此故，中國問題遂愈覺糾紛重重，莫可究詰。

四 中國革命之必然性與其世界的意義

我們常常聽到說，中國之國民運動是俄國活動的結果，不，是受鮑羅庭的嗾使的結果。真的，俄國革命對於中國人思想上的直接及間接的影響，也許是超於想像以上的。與中國的國境，蜿蜒幾千里的相連接着，屬於舊俄帝國之東洋弱小民族，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來，俱被認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利，得以任意的加盟於蘇維埃同盟，與俄羅斯共和國為對等之社會主義共和國，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都男女平等，並得自由的處理國政。在他們的領土內，既沒有隨意苛斂誅求的地主，也沒有資本家。既沒有領事裁判權，也沒有內亂，並且更無須恐懼外國軍隊的蹂躪。在中國民族看來，都是文化程度很低，半未開化的，在數目上連十分之一也數不上的弱小民族，他們的解放後的狀態，在中國民族是怎樣的激動啊！再，進一步更廢除帝政時代的不平等條約，而關於這條約的廢棄的，又只有俄國。在這樣的情狀中，中國民族的感情是怎樣，自不難想像而得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若沒有俄國革命，若沒有布爾什維克，則中國印度，也許永遠的甘心於帝國主義的支配罷？質言之，俄國革命對於彼壓迫民族的刺激，使之能

夠及早覺醒，力量實在非常之大的。但是覺醒的素因，即其反叛的根本原因，到底也是本來已含在中國印度之內部的。這是由帝國主義者的培養，及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而成熟的東西。原來印度人，中國人都是活的民族。他們的社會，在其受外界的刺激而有反應，其必須受進化法則之支配這二點上，是與白種人及日本人的社會，沒有分別的。列強的資本主義，爲了他自身的發展與膨脹，於是對封建的中國，睡眠不醒的中國，實行『文明化』的注射——輸入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由這刺激，乃卒引起全中國的自覺。

中國之國民運動，在其通乎一切階級而代表國民的獨立之要求這點上，是帶着單純的國民革命之性質；惟其內部，更含着新興工商資本家及勞動者農民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在這點上，却顯然的是社會革命的性質；而如勞動者貧農對資本家及地主反叛這一點，却是含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的。因爲是具有這樣複雜的性質，所以列強的陰謀，即在利用諸階級間利害的不一致。國民革命的進路，真是多艱多難呢。說起來中國國民革命，既是以其經濟的發達之現在事實爲其根柢之社會的必

然，則其要求必能更加強固，運動必能更爲活潑，這是一定的。自然，因着國民革命的發展，其內部的階級鬥爭，必隨着而日趨深刻化。從全體看，因爲這是推進黨民運動的力量，而不是阻止革命的，所以結局，不論由那一條路達到國民革命，不平等條約，到底只是時日問題而已。

但是中國是列強資本主義生命之糧所依賴的市場及寶庫。列強固然是互爭獨占的特權，但是倘若有關於共通的特權的問題，可也不會忘懷其一致的行動。因此之故，列強在中國的爭霸戰，一方面是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同時在他方，以中國國民革命爲中心，亦暗示着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諸國之對立鬥爭——由此更進而爲社會主義的世界與資本主義的世界之決戰——的繼續發展。

總之，中國問題是支配世界運命的問題。中國真是一個偉大的世界的「謎」呢。大概只有到那時候，到中國四億的民衆，與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勞動者，農民，都同時奮起斬斷帝國主義的鐵鏈的時候，到他們共同一致的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的時候，只有到那時候，這個偉大的「謎」才能得到解答罷！

現代中國論

稻垣直文

一 緒言

我們試避去妄想與武斷來觀察中國的時局，則對於人類社會所從而構成或變動的嚴密的社會科學上的法則，決不能加以蔑視。但是同時，我們若沒却中國的個性與特質，而律以造成現在歐洲各國的過程與原理，忘懷「對於普遍法則之具體的環境的依存性」及「對於個性之普遍的意義」，則在理論上固沒有比此更可憐的，並且在實際上也沒有比此更可笑的了。凡普遍的各種法則，在不同的結合關係上，或與特殊條件共同動作時，於是乃產生個性，產生「具體」。因此，特定的社會若沒有進到與其經濟的生存相矛盾的的政治的關係，則在政治社會必自有其構成與變動的普遍的法則，而中國社會決不能單獨外於此例。中國的一般民衆據說是多不關心政治的也許這是實情；但亦只在此法則的限界以內爲限。中國民衆，若其政治的關係，

一旦成爲他們經濟的生存的威脅，則對於政治決不能漠不關心，且事實亦不許如此。

但是像這種個性與特質，在構成或變更政治社會的普遍法則上，究不能視爲例外。許多普遍的科學法則，當其與中國的特殊環境相合，或者此種普遍的法則是在特殊的共動作用時，於是產生中國的政治社會的個性與特質。我現在便以一般關於政治社會之發展的諸法則爲前提，曠觀數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史，來論測組成中國這樣特殊環境的「現代的中國。」

一 中國政治的統制形式之發展

族長政治 不論那一個民族，當原始的共產社會崩壞以後，必進於族長政治的社會。中國通過此種社會進化時，當然是在有史以前。但他的所謂族長政治，則在三皇五帝時代。考社會進化的根底，必不能無強固的經濟的要求。原始社會崩解之動因，是由狩獵生活而進於牧畜生活。由此生產方法的進化，於是發生財產制度與

奴隸制度，母系制度則變爲父系制度，原始社會的崩壞至此乃告完畢，以後建設的便是族長社會。因爲族長社會之經濟的根底，正是牧畜生活。由社會學上的原則說，牧畜生活所立脚的族長社會，本是種族制度的社會，而農業的新生產方法之發達，則爲種族制度的社會改變成封建社會的初步。

據 August Meitzen 所言，凡在牧畜社會力足以瞻養百人的土地，在農業社會則可以瞻養至三四百人。因此，由人口的增加牧畜社會勢不得不變爲農業社會不止。但是，「從事農業的每天黎明就須至田耕作，要到晚間星月既上纔得回家，因爲這樣，所以住家若與田地相距過遠，實在不便，由往還的時間的虛耗，勞動時間不得不受削減，故說起農業社會的發展，自須受一定的制限，即人口增加到某種程度以後，維持舊日單一的部落必感困難，於是分遣其人口的一部，選擇附近相當的地域而占領之，另外建立子部落。以後歷時既久，子部落遂由二而三而四的日益增加，且由于部落更發生孫部落。」田崎博士著由社會的結合及統制之發展史的觀察上論現代支那，社會學研究第一卷第二號。農業的生產方法，依着這樣的過程，

遂把種族社會毀壞了。中國上古的族長社會，便是依着這樣而經過種族社會崩解的過程的。我們試看三皇五帝之最初，庖犧氏教民射獵畜牧，並定嫁娶之禮，神農氏則教民農耕之法；因爲當時既已在農耕畜牧的發展，於是圖騰團體遂趨崩壞，而永久的婚姻制度遂以確定。

由圖騰團體所支配的原始社會而進化爲種族社會，考其結合的要素，實不外明確的血統關係。原來所謂種族社會者，是一種以爲同出一祖的團體；在種族社會中其握有政治的統制權者，常被視爲一族始祖的代表人物，是屬於特定的血統的最年長的男子，——便是一種族的族長。以後，種族社會雖分解爲親子部落，兄弟部落，而散處四方，但在各部落內其社會的結合的關係仍然是明確的血統因緣。可是從前的部落社會却從此成爲民族制度的社會了。以後，『又把數部落或多數部落搏成一個大的社會結合，而於其中各部落的會長中，推戴最偉大的一人以爲會長的首領。』田崎博士前書二二頁。因此，在民族社會，其政治的統制權力不得不分操於民族的族長之手。這便是權力的分立，而封建制度的萌芽，即根源於此。實際上民

族社會乃是種族社會進至封建社會的過渡狀態。因此，一般人稱此種民族社會之政治的統制形式曰民族的封建制度，實在是至當的見解。如中國古代史上的帝或元后，便是這樣的大領袖，所謂羣后便是民族的族長，在中國古代史上有所謂感生帝說，可知這是繼承此大領袖 (tribal chief) 地位的形式。而如三代的革命，實為民族族長間爭奪政權的戰爭；所為禪讓，只是避免此種政權的爭奪的一種方便而已。

(稻葉岩吉著支那政治史綱領三一頁以下)

封建政治

歐洲近世國家社會之起源為征服與移住。近世國家自其成立之初，就有一種想打破介在國家社會自身與各個臣民間的一切障阻的傾向。但是賢明的統治者知道這是不可一蹴而就的。他們並知道被他們所征服的人在他本地是立於庶民之上，具有牢不可破的勢力的。因此之故，事情隨不得不為封建的。且以人口的增加與農業生產的普及，社會單位日益擴大，交通方面既不能統一，而經濟單位亦為地方的，不能有國民的統一，於是政治權力勢不得不為分權的。實際上，「封建制度是一種調和純粹的家長社會與純粹的政治社會的代表形式。」(Edward Jenks)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P. 135) 不過在封建社會，部落間的相互關係如親子部落兄弟部落等的血統的紐帶，自然是更爲弛緩，即在部落之內，其血統關係也差不多斷絕了。因此，在封建社會，其所以維繫社會的結合者，實爲武力。故在封建社會其政治的統制之積極的原理爲武力，而消極的構成封建政治社會之原理則爲權力之分立。因此，在封建社會，若其爲政治的統制權力之基礎的武力，一旦衰弱，或者，中央權力想打破中間的障阻，收回各諸侯的權力，而對民衆爲直接的統治，那時，封建政治勢必至發生動搖。換言之，若以上構成封建政治的二原理，有一個發生動搖時，封建政治亦就不穩了。可是實際上，中世以前的集權政治的失敗，多由於那些可憐的君主不知社會的進行，其中實存着獨立於人類意思的一定的必然法則的限界，而過信自己的武力，信從如水泡一樣的 ideology 的緣故。

現在我們試來返觀中國的封建制度，他的發生却與歐洲不同，不是由於征服移住。他的原因果如禹貢所示的由於大洪水與否，我們姑置不問；總之，在周代時其族長社會所賴以結合的血統關係，業以非常疏遠，氏族制度已完全崩壞，另外形成

一種爲封建政治之社會的基礎的部落社會，至社會的結合之紐帶則一變而爲武力的要素。周代井田制度的所謂部落，在歐洲正當部落社會 (village community)。

原來封建政治所賴以成立的真實的基礎是在經濟的組織。周代因爲有適宜的分權制度與統制諸侯的強大的武力，即具備封建政治之科學的二條件，所以能有周代三百年的安定的政治社會，這當中實存着至理。到了周之末世，構成封建政治社會的積極的條件——即武力衰滅了，於是便釀成春秋戰國的混亂時代。其後，可憐的

ideologist 秦始皇復蔑視封建政治之消極的條件——即地方分權，結果中央集權不過十五年便爾崩壞。秦代十五年的集權政治，說起來誠不免是千古奇事，然其實却完全由於嚴密的科學的法則。至近世的集權政治，其物質的基礎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在中國，則當資本主義時代以前，他的經濟社會則除封建政治以外，幾不論何種政治形態都在排斥之列。因此，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必具備封建政治之二條件，王朝政治始能安定，否則，若缺其一，則其權力便受動搖。這種資本主義時代前的政治社會，便是根本的說明中國史的原理。漢高祖鑒於秦之滅亡由於不封其

宗室，於是大封其子弟。漢之所以歷四世紀而仍保其大王朝者，便由於此。又如前清，可說是典型的近世的征服國家之建設者，當開國之始，嘗封吳三桂於雲南，尙可喜於廣東，耿繼茂於福建，由歐洲封建制度成立的過程來看，實在不能不說是高明的辦法。歷史家嘗謂從前中國的獨裁政治，所謂集權不過一個名目，實際上或爲分權的組織，或爲違背科學的法則而短命以死的變態的畸形兒，二者必居其一。

專制的集權政治

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他的出現正當封建社會至純粹的

近世國家——卽立足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組織上的布爾熱瓦德模克拉西 (bourgeois democracy) 國家——的過渡期間。這是萌芽期內經濟交通的發達的必然的要求。

在封建的部分社會，經濟交通之所以不能發達，是由於經濟生活的單位以部分的地方性爲根本。其後，經濟交通既趨發達，因經濟單位之擴大，於是先前的分權與地方性遂爲打破，而要求政治的統一了。(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S.30.)

同時，此種經濟的要求又做了政權集中的手段，這便是貨幣經濟的發達與資本的誕生。「先前軍事的及封建的義務，必須以勞力服務的，現在可以貨幣償付了，於是

便產生了租稅制度。實際上，若沒有租稅制度，那便沒有近代國家。』(Jenks, op. cit. p. 156.) 『在西班牙，因其礦業及商業之國家的獨占，故富裕的並不是臣下而為王室，且從此反建立了專制政治堅固的基礎。在法蘭西，其永久的人類的設定，無非為王室保證獨立的收入，使其專制政治有實行的可能。』(W. Cunningham, — 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I p. 174.) 並且，集權國家之軍事的基礎在兵權的統一，而其由來則完全基於貨幣資本的誕生。(W. Cunningham, op. cit. Vol II. p. 171.) 桑巴爾德曾言：近代的軍隊，有常備軍，同時又有(並不是私兵的)國家的軍隊。(中略)這二個原則的抬頭，其象徵的表現，我們儘可於為編成及維持國家的常備軍之貨幣手段的不絕的供給中覘之。』(Werner Sombart, — Krieg und Kapitalismus, S. 24) 實言之，近世國家的成立，實與資本主義之發達有密接不離的關係。因此，我們討論中國政權的統一與強固的中央政府之確立，決不能輕易的把這個法則看過。

但是此種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之建設者所謂君主其人，現在還沒有到能夠發揮

其支配者的實力的地步，只是一個有充分實力的大諸侯。（蠟山學士著政治學之任務與對象，三七六頁。）而據金克斯所言：『西歐近世國家的建設者，都是富有土地的大諸侯，由此可注意的事實，於是臣下的態度其表現於下舉標語中者乃爲一有趣味之事。標語曰：「君主依其自己的所有而生活」』（Jenks, op. cit. p. 156.）

近世集權國家成立的過程，這樣遂由武力式的社會而進於所有式的社會，這是我們所不容忽視的。即從前封建的政治社會其構成的原理是武力，而近世集權政治之構成的原理則變爲所有了。所以近世集權政治之動搖常由於財政之紊亂，這確不是無故的。大諸侯們憑藉其個人的實力，乘着貨幣資本相繼抬頭的風雲，收回小諸侯的政權，建設起集權國家而自爲其專制君主；於是列小諸侯於貴族，免其租稅，而致意於農民及資產階級的榨取。『貴族們，僧侶們，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力雖然已被君主奪去，但對於其自己所有的領土，依然得維持其農奴經濟保着昔日的經濟關係』（蠟山學士前書三八一頁）。這樣在經濟上還純然是封建制度，等到資產階級革命起來此種關係才始打破，而市民的集權國家遂亦於此肇其始基。中國滿清的集權政

治本是這樣立足於經濟的封建制度之專制政治，所以說起他的成立與崩壞，也不過是將上述普遍的過程在中國翻譯一下而已。

三 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與集權政治

中國與西歐的交通開始於中古元朝時代，到了明末，遂爲西方東漸的動因。那時，恰好歐洲的集權國家在經濟上建立了基礎，像上述似的商業資本日趨發達。因此明末以後的所謂西方東漸，實即是抱着 mercantilism 熱忱的商業資本的東漸。此商業資本的東漸，在中國便是資本主義發芽的動因，是打破封建政治促成集權政治的原動力。清代的集權政治便如這樣應着萌芽期的資本主義的要求而生，而立脚於經濟的封建制度之過渡的形態中的。在西歐，政治方面是在君主的統制之下，而經濟方面，則有直接私有第三階級而榨取之的貴族；同樣在中國，政治方面在清朝中央權力的統制下，而經濟方面，則君主直接對於人民的榨取業已中斷，像西歐一樣有職司貴族社會的機能的官吏。摩史氏關於中國的稅制曾說：『歷史學者或者

要想起三四世紀前歐洲的行政組織。要是他對於中國素有了解，則在我們所視為陳舊的許多事情中，他必能見到各種的類似點罷。』(H. B. Morse, —op. cit. P. 26) 直哉是言！但是此種實質上的分權，不但在稅制上是如此，「總督自己編練海陸軍，在對外交通的初期，甚至於與強橫的外人的商議，也一任他們去辦。」(Hornbeck; op. cit. P. 33) 實在清朝的專制的政治，是「普遍的法則性在具體的關係下受有特殊變化」而成立的千古的畸形兒。

原來中國專制的集權，治之倒壞，像西歐一樣是由於清代財政的紊亂，完全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之故。辛亥革命時中國商民的活動雖然是不能蔑視的事實，但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的是清室財政的紊亂與西歐一樣，雖然半是由於外國資本的侵入，不能完全說是由於產業資本之抬頭與經濟的封建制度的矛盾。質言之，在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革命上充分的條件，其產業革命的力量尙不足以打倒專制政治。但是辛亥革命總是一種半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便是中國的個性與特質。倘是辛亥革命而只是政治革命，一點也不含社會革命的意義，那末具有一定形式的集權的專制政

治的社會爲什麼不能復活呢？現在，在中國式的集權的專制政治之組織與其資本主義的發達間，因爲不相和合已發生多少的衝突了。並且外國資本的共同活動，他的勢力是多麼大呀！

自從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期，在這時期間中國與葡西荷英俄等各國的通商，不過是各國商人以其船舶販運南洋諸島及印度地方的物產而已。這完全是單以貨物的交換爲媒介的商業資本之活動，乘着中國舊式生產方法的徐徐解體，而遂其充分的發展。但是直到一八三〇年，外國貿易的決算，在中國還是有利的。迨至一八三〇年以後，於是中國銀錢的流出，遂如馬克斯所言，「足以蕩盡全個天國」。由漫無底止的商業資本的侵入，於是更引起了鴉片戰爭。因了這次鴉片戰爭，於是西歐商業資本對於中國經濟的崩解作用遂達到一個劃時代的階段。中國因戰爭失敗，須負擔莫大的賠款，這在一面是清室財政的大打擊，使之不得不對國民徵課重稅，在他面則因商埠的設立，遂與外國商業資本的活動以堅固不拔的基礎。向來外國商船販運入華的商品，只是南洋印度的天產物及手工製造物。但自開港以後，其輸

入中國的商品却一變而為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資本家的商品。資本主義的大工業製品，其唯一有力的地方，便是商品的廉價。這是「力足以打破萬里長城的巨砲」。最近中國的手工業，不消說是在沒落的悲苦的運命中。中國目前是正行着逆轉的產業革命。中國貿易是一年年的陷於不利，其損失之大，真有非數字所能形容的。

接着，又發生了一樁劃時代的大事，使中國的財政，產業，益為擾亂，這便是中日戰爭。中國因為戰爭失敗，除須負擔鉅額的賠款以外，以下關條約的規定，並許外人在中國內地得自由購買貨物，在開港互市之地經營製造工業。這是一樁確定中國經濟地位的重要事件。向來侵入中國的外國資本，實際上不過是以貨物之交換為媒介的商業資本。可是現在對於經營產業的產業資本，中國的市場是被開放了。於是中國的產業革命，便只好在外國資本之下實行着，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只好在外國資本之勢力下萌芽發達。但是直到現今，中國却還沒有到產業革命的第一步。近年以來，貿易總額一天天的上升。自南京條約以來三十年，在一八七〇年時貿易總額僅一萬二千七百萬海關兩，而自南京條約後四十年即一八八〇年，實亦不過一

萬五千八百萬海關兩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於是漸次增加，現在竟超過十五萬萬海關兩，比之過去二十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過去五十年增加至百分之百又十六。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外國資本所產的剩餘價值畢竟是屬於外國資本，是入於外人的袋中的，中國不過是一片被榨取的地域而已。因此，中國雖具有無盡藏的富源，而其貿易的決算則常常是不利的。溯自一八六四年關稅報告發表以來，在五十九年間，出超者，不過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至七六年之六年，此外五十三年，莫不是年年入超。到了近年，入超額數，又年有激增，昔日不過二千萬兩內外者，到了今日，如一九二一年，竟多至三萬五百萬兩。在過去五十九年間入超平均約每年一萬萬兩內外，而最近十年乃增至十四萬二千萬兩，二十年間多至二十五萬萬兩。（大阪市調查課編支那貿易事情一一六頁）。像這樣的年年入超，自然只有藉外國投資及借款政策以爲彌縫。原來清室財政，自長髮亂後即已顯示紊亂之徵，迨經中日戰敗，接着又是拳亂賠款，於是遂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光緒末年，每年歲出至二萬萬兩以上，迨至宣統乃達二萬七千萬兩，宣統三年，竟至三萬萬兩之鉅，地方解款又不

能與此相應，中央政府真是山窮水盡，除利用列國的權利慾舉行經濟借款以外，已無他道。於是而滬甯鐵路借款（二百九十六萬鎊），道清鐵路借款（七十萬鎊），粵漢鐵路借款（百十萬鎊），廣九鐵路借款（百五十萬鎊），津浦鐵路借款（第一次五百萬鎊），滬杭甬鐵路借款（百五十萬鎊），京漢鐵路英法借款（五百萬鎊）等等相繼成立，大概都在此時期（一九〇〇—一九〇八）間。財政紊亂至於如此的清朝，其難免覆亡，固在意中，故武漢之革命旗一舉，各省即相繼獨立。中央國庫，本來已貧困萬狀，以列國的嚴守中立，致外債復無從着手，而由美國斡旋成功的幣制實業借款又停止交付，不得已發行愛國公債三千萬元，然應募極少，清朝威信至是遂蕩然無餘，人心離散，政令不行，於是宣統遂只好退位了。（東亞經濟研究會編支那經濟通說七三二頁。）中國專制的集權政治，是這樣倒壞了。讀中國革命史，可知辛亥革命的成否，實與其商民的嚮背有甚深的關係，所以辛亥革命只可以說是半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而不能說是全部。因為中國的產業革命還沒有澈底，半是起因於外國資本的侵入的。故中國集權的專制政治之崩解，與其成立的過程相同，是依着一

種變態的步驟，正當產業革命完成以前。

四 現代中國經濟的構造

近世國家社會之根本的特徵是個人主義，自由競爭，「家長社會的特徵，是慣習，不是自由競爭。這是游牧種族，部落社會，同業組合的特質。在慣習的社會是不能競爭的。因為各人的地位已有習慣爲之預定了。」(Jenks, op. cit. P. 131) 但是在近代的生產方法，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却是必要。原來「資本是一種崩解力。像土地對於農奴的束縛，職業組合對於職工的限界，資本便是打開這些東西的。」(Channingham, --op. cit. P. 167) 倘若沒有貿易，交通，契約等等的自由，近代國家是不會實現的。質言之，自由競爭實是近代文明的推進機。自由競爭與個人主義是彼此不可缺的條件。因爲一社會慣習的——即團體的，相互扶助的——紐帶之弛緩是以該社會近代生產方法之發達爲比例的。

但是在現代的中國，其個人主義的因素似還沒有發達到足以使中國內部社會的

團體性質完全崩解的地步。申言之，這便是說在中國，近代的生產方法還沒有發達。固然，中國近代的生產方法之萌芽與個人主義的長成，已遠在近古。且『自道光以後，因企業制的機械工業之發達，於是舊日的手工業日益彫落，同業組合亦日趨衰頹。』（支那經濟通說九七二頁。）但是『與歐洲的 guild 制度相彷彿的會館公所等特殊組合制度，到了現今還依然是中國經濟組織的基礎。』（中國之同業組合與商業慣習七頁）。『就現狀觀察，除大都市外，中國的商業狀態還是非常幼稚。尤其像邊境地方的市場，其所經營的商業狀態實更幼稚。故觀察中國商工業之狀態，從信用交易上看似漸漸脫離物物交換的狀態而進於貨幣經濟時代，但從分業生產上看則似還未脫農牧手工業時代的狀態。』（同上）。所以在這樣的經濟的基礎上的中國社會，大家族制度之不能完全打破，亦是勢所當然。稻葉氏謂小家族制度為近代國家的要素，是完全順着時代推移而立於近代的商工業的東西。（支那政治史綱領二九一頁）。『為欲締結契約起見，故各人對於其自己的身體，行動，及所有物，不得不有完全的自由，並且各人之間還須相互的立於平等條件之上。此種自由的

平等的個人之創造，便是資本家生產的一種重大機能。」(F.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trans, by F. Untermann, P. 96) 我們於此可知近代的生產方法與大家族制度實是互相矛盾衝突的。故在中國，其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對於政治的亂源尙不能有自衛的方策，即因經濟生活的不進步，故其力不足以打破此種結合關係。「一切民族應該合其年代上先後不同的社會的精神的兩方，併力進行，」併力的通過一切的文化階段。故政治的擾亂而不得安定，決不是中國獨有的事。東西各民族在未成爲近世的國家以前，在以幼稚的生產方法爲基礎的擾亂的政治下，其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實完全與中國相同。所以不同者各民族之通過文化階段，各因其獨有的環境，年代有先後而已。譬如說紀元十五六世紀的羅馬與日爾曼，在精神上是正與紀元前五六世紀的希臘相當，因爲希臘遠在古代與中世之前當紀元前五六世紀時已營着近世的生活，產有近世的文化了。」(M. Baer, a. a. O., S. 10) 意思便是說中國內部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還沒有完全崩壞，正如先進國民所通過的階段中國還沒有通過一樣。因爲中國之特點的社會的結合關係，實完全

是起原於生產方法之不進步之故。

但是現在，其大都市商埠方面的經濟組織，與中國內地時代落伍的社會的結合關係，却完全處於相異的範疇中。在大都市中，這是完全為近代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社會；其間，有階級的分裂，有勞資的對戰。但是此社會中的資本階級是外國的資產階級者與中國的資產階級者，至勞動階級則全部為中國人。中國這樣以此三個階級，在一面構成近代社會，而在他面則以代表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法的諸階級組成中國內部的社會。現在的中國，正是各部分社會的合併。中國政治的統制所以混亂到如此者，我想，這怕是經濟的混亂之政治的反映罷。

五 中國社會推移的方向

近代的生產方法所要求的政治的統制形式是中央集權。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結合於單一的政權之下而受統制的組織，這是惟有近代的生產方法方始可能。近代的

集權國家既像這樣是應着資本主義的要求而生的，故近代的集權國家與近代的生產法，不論歷史的，概念的，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國內部社會，現雖對於政治是怎樣的冷淡，但在受近代生產方法支配的一部分社會，却已以政權的統一為根本要求了。並且中國內部，其近代的生產方法，若日益發達，換言之，即日益資本主義化，則對於政權統一的要求，亦必益為明顯。不論那一個民族，若其經濟的生存不發生矛盾，是決不加入政治的關係的。由此意味，中國政治的統制形式在將來推移的方向，我們儘可於中國社會經濟生活要求之變遷中觀察出來；而中國內部所要求的政治的統制形式則可於其經濟組織之變遷如何觀察而得。

但是，因為使中國陷於混亂的種種事情，中國近代社會之自身在一面也未嘗不要求「政權的統一」與「強固的中央政府」；不過同時在他面，却繼續着政權的分裂作用。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則我們應該明白；原來構成中國近代社會的「資本」，並不是立於同一利害下的單一的資本，我現在略去詳細的數字，大概的來說一說：要知道在中國代表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紡績，煤礦，鐵道三種事業，外人所有的資本乃直

與華人相等。尤其像既成的鐵道，由外人設辦者達千零二十哩，而所名爲國有的數四千七百九十八哩中又大半是借款鐵道，質言之，可以說是華人自設自辦的不過五百八十哩而已。然而此種占有優勢的外國資本，都各自託庇在他利害不同的本國政府的保護下面的。在中國資本，其所要求的政府，自然要是能夠保護中國自己的資本的；可是同時中國的外國資本所要求的政府，却要能夠保護外國資本的，故如英法日俄各國資本所要求的政府遂只求他能夠爲各人利益的保護者。於是俄聯馮，日擁張，英美結吳孫，各國的資本互相排擠，以實行中國政權之分裂作用。這是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外國資本因受本質之要求之敦促，爲保證其自由活動起見，於是在一面，要求中國政權之統一，主張廢除釐金，大聲呼喊建設起強固的中央政府；但在他面却實行這樣的政權之分裂作用。質言之，這完全是一種兩頭論法(Dilemma)。因爲要使各國各以其資本安心的交託中國政府之保護而停止其對於中國政權之分裂作用，這簡直是比建設強固的中央政府更不可能的事。但是，如其欲建設起強固的中央政府，則資本的政權分裂作用無論如何非停止不可。這總不能說

是完全的乞食論法(Petio Principii)罷。

但是這樣的矛盾的發展却是進向更高的的社會關係之唯一的道程，是社會發達之普遍的原則。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之母，雖然在一面若無自由競爭，資本社會是無從產生的，但在他面却總是資本社會的桎梏。因此之故，在較爲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常廢止自由競爭而另作加特爾或托拉斯。因各國資本間利害的衝突，於是惹起世界大戰。但爲保證資本之自由而統一的活動起見，各國資本不得不避免鬭爭以求協調。所以戰後第一樁事大家即努力於交戰國間經濟的障害之打破，實際上，大戰的元兇却是資本主義本身。一言以蔽之，資本在一面是互相競爭，但在他面却反了一個面，在要求協調。這在中國，當各國資本互謀協調的潛在意識顯現心頭時，於是就有中國共管論；當其爭鬭意識顯現時，則有中國瓜分論。但是，矛盾的發展是進向綜合的歷程。廢止競爭與鬥爭，而向着協調，獨占，統一以發展，這本是資本社會發達之普遍法則。因此，由各國資本之協調，遂謂將一定沒有要求中國政權統一的時機，這是誰都不能保證的。但是現在，中國的近代社會却依然是在此矛盾的

歷程上急急的前進呢。

柯祖基在其所著 'Sozialismus u. Kolonialpolitik' 中有言：「對於資本家的榨取的反叛，要是榨取到了某種的高度，這是到處都會發生的。在自己國內，其國內資本的背後，有的是國權，有國權爲之保護，所以儘可安心。但是到了國外，却沒有這樣穩妥無虞了。並且因爲他是有礙外國資本的安全，所以其間像對於全體資本家之榨取的那種根本的無產階級的反抗，雖不一定是，但像負有外債的農業國的官吏與所有階級，他們自己爲謀實行資本家的榨取起見，却儘有進而利用這個脫離外國資本的壓制的機會。例如英國有許多資本曾以南美國有鐵道礦山之破產而完全喪失。推厥原因，殊不是由於缺乏付償能力，其中却有許多不過是拒絕付償。」

所以我想，就在中國，其近代社會之矛盾，也是可有排外運動的澈底，資本的等質化來解決的。即中國之近代社會，到了將來成爲由立足於華人資本的中國資本主義所組織的時候，則中國對於強固的中央政府必發生單一而等質的要求。而中國國內的外國資本若一旦失其保護，那時，外國資本之流入勢必至斷告絕。但是現在的

中國，若無外國資本之流入，其國民生活已簡直不能保持，這是我們由觀察俄國便可明白的。因此，中國近代社會展開的方向，勢惟有視外國資本對中國資本，以及外國資本間相互競爭或協調之發展如何而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內部社會之推移，到底是怎樣呢？

在中古時代，因為社會的結合之紐帶的崩解，於是產生資本；而近代社會的成
功，則為資本發達的動因。質言之，近世社會發達的過程，實即資本蓄積的過程。因
此，中國內部社會之如何推移，實無異是中國內部社會如何資本主義化之問題。在
中國內部，其資本的蓄積，非常遲緩：這是一般人所公認的狀態。推厥原因；中國
地方，其剩餘價值的大部，都是屬於外國資本的，這也許便是一個原因。但是照普
遍的法則的展開來說，雖然是中國內部社會但其終有一日成為資本主義化，則為確
定的事實。猶中世的社會終有一日變為近代的社會。不過以擁地至四百三十萬平方
哩之廣，人口至四萬萬之衆的巨大的農業國，現在消極的事實固在資本主義為最後
進，以我之見，恐至將來，必有非仍為農業國不可的積極的原因之釀成。資本主義

爲保持其自身的存立計，則非資本主義地方的存在，實爲其根本的必要條件」。羅查氏此言的當否，茲姑不問，但世界無論怎樣資本主義化，其必需有一定的農業地域，與夫農業的生產爲極難資本主義化的事，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世界產業資本，當其成立之初，即先着手於兩美大陸的榨取，接着又分割了非洲，最後乃轉而至中國。倘是世界的資本主義，是以一定的農業地域——即非資本主義的地方——的存在爲其根本的必要條件，那末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實無異是世界資本主義之自己否定。所以我嘗以爲中國內部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在某程度上必有窮盡不能再近的一天，便是由於這個緣故。

克魯特泡金所想望的中世社會的結合原則，在同時，就是歐文與路易白郎所憧憬的未來社會結合的紐帶。而個人主義的近代社會則爲處於中世社會與未來社會間的東西。社會發展的階段，凡是更高的社會之萌芽，常孕育於舊社會之胎內。使中世社會以之崩解的近代社會，現在正準備着未來社會的條件。或者會說股份公司異常的發達，就是進向生產社會化的歷程。韋勃謂消費組合，其發達的速度，是與資

本主義崩解的速度相一致的。穆勒謂在 Co-operation 中可以認識未來社會結合的形態 (J. S.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772) 現在的中國，還是以歐洲中古的財產相續制度，——衆子均分制爲其根本原則。而中國特有的商業經營便是以此制度爲共同經理的根據，於此共同經營的基礎上，建設起中國獨有的基爾特，中國這樣，沒有在中世社會中孕育其現代社會的萌芽，即準備著未來社會的條件。原來此種共同經營的事物，若不是完全的 Co-operation，則便無從說起 Co-Partnership。但是，在這樣「合數家族爲一村，而以一村爲一家族，自己選擇裁判官與正義的支配者」(Hornback, —op. cit. p. 35) 的經濟的構造上之政治生活，實是「最好的自治生活」，正是桑巴爾德的復古的社會主義 (Reaktionärer Socialismus) 所憧憬的中世社會，(Sombart, —Sozialismus u. Soziale Bewegung. qte. aufl. S. 24) 同時也是主張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之形態。質言之，中國內部，現在是正飛越過近代社會而向未來社會急進。什麼赤化，這只有對近代社會是可能，若在中世社會與未來社會，則是毫無意義的東西。任風吹也不動的靜靜的行着社會的

推移，倘是有這樣的國家，那便是中國了。巨大的東洋的睡獅，奮鬣長吼這樣的事，是不會有了，此後大概仍是默默的繼續着闊步罷。



現代國家與中國革命

長谷川如是閑

一

以軍國的統一組織爲主的舊國家，必自其軍國勢力之衰退而國家勢力乃失墜。其動因如何可不問，必由其軍國勢力之衰退乃開始崩壞，必在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之後，其國家乃滅亡。但在此等形勢中，因破壞舊國家軍國的統一的，爲其他軍事勢力，故舊國家之崩壞，同時即產生其他的軍事的統一，要之，其軍國的形態，仍沒有變化。中國所謂易姓革命便是這樣。

於此，當前國家已崩壞，繼着的其他的統一尙沒有成立之時，輒產生所謂春秋戰國的形勢。這是軍事勢力完成其統一間的過渡的混亂。溯自清室之滅亡，繼着的是袁世凱好容易造成的軍國的統一，因了袁氏之死去，於是統一遂完全不可能，成爲許多小軍國勢力之對立狀態，像今日樣軍閥之間戰亂不絕。以現代國家的觀點來

看，這算是稀有的現象，中世國家的形勢還保存於今日——在某種意味是可寶貴的——實是歷史上的古董。中國現今，把數世紀前歐洲產生近代國家的歷史置在將來的道上，中國到底還要重走這條路呢，還是完全不再走了呢，這是一個問題。

說起舊國家之崩壞與近代國家之勃興，其間的界限，便是十六七世紀新世界探險的歷史。在自限於東半球之一部，以歐洲與亞洲之西部爲其全部世界之白人，由一般學術，尤其是航海術之進步，於是遂打開了先前完全是野蠻人的世界的大西洋，印度洋，南洋及其他海洋上的縱橫的通路，使已到窮境的舊國家的掠奪區域急急擴大，帝國主義開始有囊括水陸的世界的規模。以前，固曾有過羅馬大帝國所築有名於世界的道路，但只是從羅馬到各地的陸上的通路，在水上仍是非常困難的。然以西半球，遠東及南洋之發見，陸上的道路遂移轉於海上，帝國主義如字面所示的成爲世界的事物。這事實，雖與國家以最後的繁榮，但在同時，却使近代國家有攘奪舊國家的地位的機會。

舊國家之掠奪經濟以新世界之發見成爲世界的，如由此以造成世界的大帝國之

西班牙，其領土之廣大幾互西半球的全部，但卒不能不急遽的衰落者，則因世界交通之路業已打開，要想以此使舊國家式之掠奪的支配擴於全世界，是完全不可能。此時，舊國家所可能的極限，不過對此新天地，試其一時的掠奪的遠征罷了。西班牙的方法，是舊式的領土擴張，只想從此以獲得金銀財寶。反之，葡萄牙，荷蘭——尤其是後者——却不是大領土主義而為商業主義，他們在近代是世界的貿易制度之先驅。

但是近代國家，其貿易方法之一半，也採的舊國家之領土主義，不過此新領土不是置在西班牙式國家的掠奪組織之下，而為一種適合其商業組織的強制的支配。近代殖民地，與古代獻貢品於大國的領土不同，是一種交換組織的領域。故在近代若欲把其殖民地，成為舊式國家之領土，則悉與西班牙同其運命。法國殖民地的失敗，商業的條頓民族的殖民地之所以成功，即以此為其分歧點。因此，以世界的交通之發達而同時急速勃興的舊帝國國家，遂不得不讓其地位於近代的商業主義國家。

但是在此以前，近代國家亦如舊式國家需要軍國的方法。因為在不知商業主義的國家政策與軍國主義的國家政策之區別未開的閉關的國家，商業主義亦視為危險的侵略主義，非經武力的壓迫不能容受；不但此也，初期的商業主義，是以武力的壓迫所得的利權為『獅子的份子』，以此不平等的所得為計算其利益率的標準，決不是彼此立在同地位之“fair play”。蓋以強臨弱，要想除免由不公平的形勢以獲利之欲望的衝動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武力遂為其第一條件。近代商業主義在與對方作算盤的談判以前，必得先用武力的談判。葡萄牙政府以後對於東方探險者訓令停止使用武力，是恐武力為商業主義所濫用。如打破西班牙式的掠奪的殖民政策而為近代國家最後之勝利者的英國，為運印度之財富於本國，卒夷印度為屬邦。為欲銷售鴉片於中國，乃與中國開戰，取得香港。惟若說此是武力之濫用，則却不然，英國的使用武力可說是不出其近代的商業主義之必要的，蓋近代的交換，與古代及中世之掠奪同，是須伴有武力的現象的。商業主義，不論其為的主張公道或主張不公，都有使用武力的必要。質言之，即欲以商業主義代舊國家式之掠奪，打

破無敵艦隊的海軍力是必要的。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即因其本國受鄰國西班牙武力的壓迫而失敗。武力在近代國家商業主義之經濟上，雖不能如舊國家掠奪經濟之直接使用，但以之爲背後之力，依然是很有用的。至其並背後之力的效果而亦失却，這是最近目前的事。

一一

近代國家之殖民政策，雖有人說是普及白人文明於世界各地的人道的事業，但是此道德本身所要求的代價未免太高了。結果固使白人文明普及各地，但是說此爲出於列強有移殖此文明於他處的必要，則毋甯謂列強因爲要獲得維持其自己的文明之財富，故有此道德的事業。目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不是對方的生活。爲殖民政策之先驅者而活動着的基督教傳教師，不管其個人的意識是有怎樣的錯覺，其目的，行動，與其本國國家的行動，却決不是性質相背的。因此，由十八九世紀各國的殖民政策而開港通商的東洋各國，因直覺的豫感其當然的運命，對於開港通商取反對

態度。到了其後以各國之強制知道事情不能避免的時候，他們實感到了敗北的恥辱與以後的危險。

對於這種爲列強迫着開關的當時所感的恥辱與危險的感覺，要像日本那樣比較安全的通過到文明去的難關，而後日迴思以此爲歷史上的談資的，則除了日本，其餘被迫開關的國家，對於此所感的恥辱與危險，恐俱不能視爲談資，因爲他們現今還是酷烈的在恥辱與危險的運命當中。日本對於其他東洋國家，所以非常缺乏同情之心，這是因其現今的境遇，已能把自已被迫開關的當時的激昂的感情，視爲故事談資，故於對雖然相同的其他東洋各國的感情，乃視爲含有談笑資料的性質之喜劇的激昂。因此，日本動輒自己壓迫東洋兄弟之喜劇的激昂，而毫無不道德之感，不但如此，由其視般來（Perry）（譯者按即美國將軍強迫日本開港通商者）爲恩人的感情來推測，他還抱着一種自信，將來必有一日被強迫的國家將視日本爲恩人，因此遂良心上平氣的對東洋弟兄肆其壓迫了。日本直到最近，由某事情始覺悟到此種『良心』，不但是對方，卽在這方面也是不利的，這是因爲像『二十一條』要求

樣，以般來的良心的濫用受到了失敗的教訓的結果。不但此也，由在中國的列強最近的現勢，十八九世紀式的殖民主義，在今日是完全成爲時代錯誤，正如以前西班牙之侵略主義在十八九世紀是時代錯誤一樣，事情已表示的很明白，漸爲列強所注意到了。卽從此以後的時代，背後伴着武力的殖民主義，亦將不能收得功效了。此現象之表現於實事者便是現今的中國。正如美國脫離英國，墨西哥脫離西班牙，南美諸國脫離歐洲本國而獨立一樣，是表示貢物主義殖民政策之時代已告終結的一種相同的時代的表現。

中國之成立共和政治，言其發端，大概由於鴉片戰後各國強迫的開港通商，若照此說，則今日中國，正應對英國及其他各國致其感謝，而印度將來或亦有對克萊武 (Clive) 赫斯丁 (Hastings) (譯者按二人爲英國亡印度之元勳) 致感謝的日子罷。清室的推翻則與一般歷史的事實相同，決不能歸之某一單純的原因，質言之，世界各國所曾經歷的舊政治之破壞過程，中國亦須重走一次而已。惟此則因中國舊來的經濟組織，是由外國殖民地政策之強迫開港主義進化於近代的商業主義，而

反抗與此相伴的舊式的軍國統治之萬國共通的近代的事實，則在中國，是特別要以受有近代教育之智識階級來謀實現。或者以滿清末年變法自強的失敗及其他政治的過誤，是清室所以滅亡的原因，但是滿清可決不是以當時政治之消極的原因，而滅亡的，滿清之滅亡，是由於當時社會之積極的原因。正如法國革命，並不單是由於蒲魯蓬（Bourbon）朝廷軍國主義與奢侈的結果，而是由於當時社會之經濟的進化，一般無異。如拳匪之亂，這是因經濟的進化而感到脅威的人們之最後的反抗，與我國神風連之亂（譯者按，此為明治八九年頃，熊本地方，信奉神道，殺害外人之黨徒的擾亂）同其性質。又如美國之南北戰爭，這是南部因其經濟的進化與情形異於北部思欲保其舊經濟狀態，而與北部所發生的衝突。蓋當舊國家之崩壞時期，凡在此經濟的根據上者，必欲維持此舊國家觀念，實際是保守其經濟的根據。故在此等舊國家中，所謂守舊派者實並不是保守舊『精神』，而是欲保守舊經濟。故滿清的滅亡，並不是由於舊精神與由此精神所生的統治失其威勢，而為滿清國家所賴以成立的經濟組織之進化。中華民國之成立，與一切近代的『民國』之成立相同，是

近代商業所要求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的建設。民國革命之中心人物所以多是受有美國式的教育，而革命的發祥地所以爲南方外國貿易的中心地域，這決不是偶然的事。

三

但是，某統治組織崩壞的原因，直接的是由於其組織本體之分解作用。自然，使組織發生分解作用的是上述的社會的進化，但是雖有社會的進化，若統治組織能由自己的調節與此相適應，則組織的分解不過部分，還是能夠保全的。譬如人類，當其犯黴菌而致死之時，原因雖是黴菌，但就生理現象言，是由於內臟組織之分解作用。清室之滅亡，同樣固是中國社會向近代的經濟推移的過程之必然的結果，然其直接的生理的現象則爲統治組織之分解作用。

軍國的舊國家之分解作用即軍事的組織之分解。德川幕府之覆亡，固是由於封建的經濟之自壞作用及與之相伴的封建國家之財政難等事情爲其社會的動因，但其

直接的原因仍是軍事組織之分解作用。故當其軍國的統制內之諸藩，事實上證明已脫離其統制，即急速的向着崩壞的形勢而進。清室的覆亡，也是由於封建的軍閥脫離中央的統制而與革命方面相結合，尤其是最有力的軍閥，同意於推翻滿清，使舊國家不得不趨於滅亡之一途。

但是此分解作用，若爲市民革命之成功，那末中國革命或者能如法國樣結果完成近代國家，但是中國革命却比我明治維新之由藩閥之力還甚，是由軍閥之力而成功的，所以革命家的功業，遂如俗諺所謂狗用力，應得食，出現了督軍的共和政治。

確然的，近代國家即是商業國家，此商業，在資本主義未完成以前，必強烈的爲民族的，因之可以利用與民族國家同在的武力組織，以發展商業主義，有像前述那樣的理由，市民國家實與軍國的國無異，所以市民革命儘有發展成拿破侖樣大軍國主義的可能。在中國，袁世凱欲繼承拿破侖的地位，但此東方拿破侖之候補者卒以神經衰弱而致死亡，只留着銀元之半面，爲其短促的僭帝生活之紀念。所以不

論是袁世凱或是誰人，倘能在中國完成拿破崙的統一，則中國之國家形態，怕總比現今整齊多多，爲一個近代國家，即軍國的市民國家罷。

但是推倒了滿清這舊國家的市民運動，其武力的實力，是假自他人的，而最後的成功又是與軍閥妥協以成，故革命派自己既不能爲新組織之中心以代舊國家之統治組織，同時，與革命派妥協的軍閥，亦沒有一人具有完成軍國的統一的力量。而自惟一的似具有此力量的袁世凱中途死後，代清室以完成國家的統一的力量，因爲不論單獨的，焦團的，都沒有，結果，構成中央權力的遂爲由滿清這中央的軍國的勢力之衰落而發生分解作用的地方軍閥間之權力平均作用。此輩地方的軍閥，由清室之衰落及革命運動而得更與中央權力分離的機會，所以他們對於革命沒有阻止的理由，正如我國之封建諸侯，對於使自己脫離德川的統制的維新運動沒有反對的理由一樣。

因此之故，革命若只推翻中央權力，其繼起的新權力悉爲地方的，那末此由平均作用而成立的中央政府，不過是一時的表示地方權力之政治地位的，如國技館之

Program 那樣的事物而已。但是此 Program 可不是由老年力士所定，而為力士所自立，這是與國技館不同的。故即是革命軍自己，一入此渦中，於勢亦只有如軍閥樣保其地方的權力而存在了。

所以革命運動完成了，仍舊不能造成中央的權力，不但如此，因為有地方的小軍國國家插入於共和政治，致軍閥的小國家遂離合無常的表現其軍閥態度之行動。如與袁世凱的妥協是如此，孫文之客死於北京，便是與北方軍國國家結三角同盟之中途。

革命所以這樣忙殺於末梢的行動，便是因為推翻清室當時的中國，中央軍國國家之軍事組織及其統治組織中發生分解作用，而各個地方的軍國組織則尙未至完全分解的形勢。換言之，當時的中國實在大軍國的組織分解為小軍國的組織之過程，然而此各個小軍國自體，却還沒有達到分解的程度。

小軍國國家之成立，不過是大軍國國家大規模的掠奪經濟組織之縮小，其成立的條件，不論形式上，實質上，仍是掠奪的組織。即其形式上的條件是武力組織之

成立，而實質上的條件則爲與掠奪的徵收相應的富之社會的存在。由此二條件而軍國國家之掠奪經濟乃成立。因爲前者，故常期軍國組織之成立，因了後者乃常謀新領土的奪取。游牧人民逐水草而遷移的方法，是因其收穫地爲移動的以求收穫地的方法。至軍國國家，則其方法爲收穫者有定居而移動其收穫地，並且其收穫非由經濟的法則，而爲政治學的法則。中國軍閥國家之常以擴張領土而事戰爭，卽是反逆的水草生活。因爲決定軍閥國家之消長的是領土之大小與其生產狀態。

大規模的實行這種掠奪經濟的是中世以前的帝國國家，在此帝國之統一下，小軍國國家是不能免於大軍國國家之掠奪的。正如所謂掠奪所得者同時亦被人掠奪，故小軍國國家之軍國的存在，大軍國國家之掠奪經濟是不能免於經濟的危難的。我們的諸侯國家所以不憂心德川國家之崩壞，正與人民於諸侯國家之倒壞毫不憂心同其理由，因爲所倒的恰是奪取自己所有的事物的。

但是清室之末葉，清朝這個大軍國國家，其對地方的小軍國國家掠奪所得而再作掠奪的組織，已不能爲有效的活動，一般地方軍閥，恰與我們的諸侯相反，正

極端的發達着一種使以清室之名而掠奪所得的事物免於清室之掠奪的方法。軍國的中央權力所需要的是掠奪經濟之求心的地位，但是清之中央權力，當其末世，却不是掠奪之求心作用而為遠心作用，收穫不集於中央國家而為地方國家遠心的聚集。在這場合是正與我們的諸侯國家相反，但其無憂於中央權力之滅亡，是相同的，不但如此，他們還是積極的歡迎中央權力之滅亡，這也是相同的。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既已進到世界的經濟之渦中的中國經濟之發達，自然不能阻止得住。而因中國人自古即在這樣的掠奪國家之下忍耐着壓迫，一方自己堅固的組織着以與之相對抗，其經濟的發達便是這樣來的，故在現代商業之發達上，亦能保持 *self* 之獨立以與國家相對立，雖然只有遇到國家的妨害絲毫沒有受到庇護，但其經濟的繁榮却能繼續增高。而因此故，地方的小國家，其掠奪經濟之實質的維持乃得以無缺。

四

在中國，使上述那樣的組織得以繼續的中國自身的理由，是極惰力的。這在一方，從大軍國組織分解出來的細胞，成長爲小軍國國家，在他方，則有得以維持此與之相伴的軍隊組織之社會狀態的存在。倘若沒有後者，那末前者怕就不能存在。這便是說倘無可以招募爲兵士的過剩的人口之存在。故軍隊化的過剩人口之處分若無辦法，裁兵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是他方若無軍國組織，則此等過剩人口，必不致成爲軍隊而將另成爲無產人口。不過中國的小軍國國家之簇生，並不是由於過剩人口之存在，而是因爲清朝這個軍國組織之分解。

在此惰力以外，爲保存中國軍國國家之有力的積極的力量者，卽外國勢力。

列強對於中國之不能造成統一國家，爲了中國，爲了自己，似都視爲憾事，但是列強之要求中國有統一國家，則如多數人之言，是因他們所奪取的利權，其約束與實行，沒有強力的保障，因此覺得不便。所以若有更好的情形，這種不便，在列強到底不是難於忍受的。因爲分裂的權力比之統一的中央權力，不論在壓迫上，在操縱上，其利用總較自由。列強把許多商埠作成像一個自由國樣，在中國境內造許

多小國家——軍閥也如這樣——於是自由的行其資本主義的經營。這樣的行動，若說是中國有強力的中央政府的好，那是無論如何是一個問題。中國對於列強的地位現在還是殖民地的。列強把中國置於殖民地的地位，由此乃得在中國大陸，繼續行其十八九世紀的舊式殖民政策——但是得利却多。中國的革命，若是目的在完成完全民主的近代國家，與日本之完成憲政相同，那末其將在經濟上有驅逐外國勢力的傾向是必然無疑的。因為如日本在滿州的地位，其性質是以中國之不能充分近代化為條件而始保其存續的。列強各國，由其與各個小軍閥國家之結合，乃得在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作非常有利的活動。列強居這樣的地位，若對中國內之小國家各不以有力的援助，則如清朝的碎片樣的小軍閥國家也許早消滅了。固然，不是由於列強的援助，像上所述的，中國自身也有使之得以殘存的原因，但是這個原因，若無列強的保持，恐亦早失其効力了罷。

在中國，此小軍國國家之對立狀態，說是由於歷史的轉化，但到底還得由一般軍國國家之崩壞過程作一番考察。照事情說，惟在近代商業主義的機構，此軍國的構成始不可能。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當然的使軍國的組織陷於崩壞，即在其自身上崩壞作用尚不充分之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強力亦必拚着戰爭，要破壞其軍國主義的形態。

但是中國之小軍國國家，果然能準此一般的原則的過程而進展否，則有如下之問題。而此問題又分爲二：第一是中國能否資本主義化的問題，第二是與資本主義化相伴之市民運動，在中國能否建立市民國家的問題。孫文之三民主義，在民生，民權，民族等三主義之第二第三上，是主張市民革命的東西。但是在事實上所以失敗者，則主要原因，中國的市民是中世式的 *guildsmen*，不是近代的市民。正如日本市民，在未資本主義化以前，不能完成其憲政，中國人在未市民化以前，決不能成功市民革命。 *guildsmen* 所以與國家政治無關心，因爲他們有防禦政治的組織，以保持其經濟組織。至於市民，則必自身投入國家的政治，而由此以謀其經濟組織

之發展。前者是防備政治的，後者是掌握政治的。而中國人民則現在還屬前者。他們不願意自己參加政治，像 *guildmen* 一樣，對於政治由付納一定之特許金，政治乃與他們無關。市民的權利在要求有參預政治的特權，*guildmen* 之權利則在主張政治不與他們相干的特權。中國人民之所要求，不是前者而為後者。這自然是因為中國的國家組織，現在還是中世式之故。而中國人的生活，謂其欲除去此組織，似還是向着忍受此組織的生活而發展的。他們自主的組織以國家為不必要，這實是超於英人近代的國家觀以上。近代的英人，以國為『必要之惡』，中國人自數千年之古昔，已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國家的官吏便是賊盜，國家的軍隊便是強徒，而國家這東西便是經理贓物的機關。這樣的國家行動之參加，其光榮與必要，中國一般人民，是沒有感到的，正如謀生滿洲的日本商人不欲加入馬賊一樣。至欲參加此種政治之人，中國人中固然有之，則亦與在日本人當中也有願加入馬賊的人一樣。日本不是由有馬賊的傾向之日本人成立的，同樣，中國也不是由有政治的傾向的中國人成立的。

由此可知市民的政治運動，要發達到足以推翻中國的小軍國國家，實在不是易事。於此，若欲求有機的進化，則還是舉軍閥與 *seignior* 商人之結合——軍閥之商人化——由此以使軍國國家內部崩壞之傾向。但是中國人，即對於軍閥自己內部的崩壞也是傍觀的，如利用此事起而為獲得政權的組織的運動，現在還是不能。如對於張作霖樣，軍閥而又如半商人的支配者之利己的壓迫，中國人民，恰如誇示其忍耐力之強似的，一點沒有反抗政治的態度。在中國，對於支配者的暴虐，有政治的反抗行動者，只是職業政治家。

在 *guildmen*，其代參加政治的要求的是保有 *guild* 的實力以與政治相對抗。如收買將領，收買其戰爭，在此時，是具有武力以反抗政治的支配者的，但是却決不想參加入政治的權力。中國人便是這樣。如漢口附近常為戰爭的中心，其商人團體，輒出錢收買戰爭的當事者，以停止其附近的戰事。又如廣東商人之以武力反抗廣東政府。但是他們決不想參加入政治。

中國革命家嘗以中國人此種態度而非非常憤慨，在這一點他們非常歡慕日本人。

但是就中國人而言，沒有這東西，亦一點無害於他們的生活，政治的權力，果有什麼要求的必要呢？總之，市民的革命，即德模克拉西的革命，在中國所以困難，理由即在於此。

六

市民的革命在中國是一樁難事，既如前述，但是中國人決不許軍閥國家永久的存續下去。中國是農業國，工業國，商業國，由從事各業的人民，構成維持中國的生存之社會集團，但是中國的社會，決不是無政府的，數千年來由強大的軍國國家行其統治。因之，其屬於統治者一方之階級，與一般中國人別，有構成中國國家，以國家生活為生活的集團組織。中國歷代的革命，即是此種集團的交代的支配。中國人由歸化於此集團，為其構成員，乃得政治的及智識的支配階級之地位。

這階級，其對於國家與其政治的態度，恰與一般中國人視此為『不必要之惡』的漠不關心的態度相反，具有執着的政治的關心，以此為生活意識之全部。中國的

政治所以爲輿論政治，其意便是指此階級的意識常影響於政治，但決不是一般中國人對於政治的態度。中國政治之成立，與一般人民的意識完全無關，但若無視智識階級的意識，則中國政治即不能成立。

故在中國，企圖市民革命之形式的成功的，也是此智識階級的事。但此事實上決不能說是人民的革命，理由有如上述。中國革命家自身，直至最近始想到這點。市民革命在今日的中國爲不可能，同時在某意義上，也是無意義，這是因爲中國的輿論，即表示於智識階級之意識上的東西，在中國政治的進化上爲極重大的事實。由此事實，革命家的工作爲獲得新的目標與方法。即社會主義的革命，換言之即無產階級的革命。

在市民革命時代所視爲一般的中國人的，如上面之所述，很明白的是指 *guild-men* 階級。固然，中國人在未爲無產者以前有 *guild* 的構成，但是與國家對立，由貢獻稅金獲得特許證的却是有產階級。中國革命家眼中所有的中國人，即是此階級。但是在今日革命家之眼中，所謂一般的中國人，却是無產階級。關於革命的

國人的思想之革命的變化，固是由於俄國革命的教訓，但是有過於此的，我們須知這却是由中國人自己 trial and error 的手續而自得的。只是其意識與科學的方法則學自俄國。

無產者集團之大規模與其奴隸狀態之卑微，在世界，沒有更甚於中國的。所以倘能一旦加以統制而組織起來，其將成爲怎樣的社會的勢力是想像不到的。

但是這須伴着時代纔行。在羅馬時代，奴隸們因個人的反抗只是一個個像虱子樣遭受誅滅，于是有組織的反抗，然而結果徒是全體整個的遭受磔刑。中國的無產者運動，亦須以使無產者成爲有力的經濟組織之進展，與壓迫無產者之暴力的衰頹爲條件。而中國資本主義設施之發展，與世界大戰後列強社會的及軍事的地位之變便是可視爲上述之二條件的事物。廣東政府之赤化，卽是利用此機會的。俄國式的組織與鮑羅廷及其他俄人之參加，這不是中國赤化的原因，而是手段。正如張作霖之軍隊組織與作戰計畫都賴日本顧問一樣，不是他的軍國主義的原因，不過是一種手段。

由中國人自身所經驗的意識與爲其實現手段之俄國式方法，使南方政府的革命事業，得以急激進展，使廣東之國家的組織完備，使香港壓迫成功，使蔣介石軍出現，擴充勢力到揚子江一帶，接着有強制的收回租界那樣在國際史上可貴的新方面的開拓，並表示着有使世界最大強國之一的英國陷於窮境的可能性。

但是此方法果能貫徹到何等程度呢？這是一個疑問。又，到底能夠徹底的貫徹否呢？這也是一個疑問。

像上所述的，因爲在中國，什麼政治組織都有成立的可能性，既有無產者執政的可能性，也有張作霖獨裁的可能性。只是中國這樣廣大，而中央集權的傳統又這樣薄弱的國家，則不論實現那一種政治組織，都沒有統一全國的可能性，恐怕正反對的組織，還能同時並立於國內。現在的南北兩政府，即是這樣。但在這樣密接的國內關係下，而具有相異的組織的情勢中，承認私有財產制度之國家與不承認私產的國家那樣交錯的存在却爲不可能的事。即不論什麼組織，仍不能受一定條件之制限。現在的南方政府對於其占領區域內之私有財產制度，根本的沒有更動的可能。

廣東國家，並不是經由無產階級革命而來的國家，只是用着無產階級的戰術的。由廣東國家之革命領袖所成就的最大的功業，可見在中國是含着革命成功的性質。至其具體的實現形式怎樣，這是以後的問題。

目下爲革命事業的中心之國民黨的意識，與共產主義者完全不一致，本來富於實際的傾向之中國人，卽是共產主義者，其學術的理想上能有怎樣的固執性，實是很難斷定的。又，不論其成就何種主義，及何種組織的國家，若對於私有財產制度沒有根本的處置，則此國家怕仍將與從前的國家無異，是和一般中國人立在對峙的地位的國家。

現在南方政府所成就的事業中，其最有顯著的效果者，便是排外運動，由此運動，中國或者能從殖民地掠奪的目的物救出，或者能得到經濟的自主罷。若在列強則只有此事是他們所担心的，至於中國將建設怎樣的政府這樣的事，則不過用以滿足自己高尚的隨意的批評心而已。

南方政府軍事行動的成功，並其占領區域之廣大，由此使其經濟自主的範圍亦

擴大，在這意味上是很重要的；這樣，在某意味，也許更能成就市民國家的建設，使中國由殖民地的被掠奪的地位上升為資本家的掠奪的地位。南方政府若要在其新占領區域，布無產階級的組織，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南方政府亦沒有這意思。現實的效果，便是於此擴大自主的市民國家。

這是日本漸次脫離外國商人及外國事業家的掠奪時所行的過程，不過中國須激烈一點始能實現而已。實際上，中國已有這種實力了。阻止中國的發展的，是外國帝國主義的政策。為除去帝國主義而用暴力，這從帝國主義向來所用的兵力來觀，實是非常小規模，至其慘害則更不足相比。

要之，南方政府之向着無產階級的革命方法而進，這是中國自身經驗的行動，非常合於自然的順序的。即如其急激發展的排外運動，說是赤化，實為市民運動。中國全體現正同情於南方政府的出現，致反對方面的北京政府亦欲學此筆法，由此可知所謂革命行動的性質是如何了。

中國的農業經濟

L. Madjar

據說中國人的「生活標準非常的低，有十便士便可維持一家人至一個月了」。這樣廉價的人間勞動力，實是明白表示着爲中國經濟狀態與社會狀態的特徵之一。「陸地的搬運，用人比用牲口還更有利，」由此可知人間的勞動力是如何的廉價了。惟欲對此問題有個明白的認識，則對於現在中國混亂的原因，應該先弄清楚，還有對於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的資本關係則亦應有最露骨的分析。使中國陷於混亂而不可收拾者，不是中國的軍閥，不是中國固有的地理的環境，同時，也不是中國舊來的社會制度。推原其故，實由於帝國主義各國的資本關係。以此帝國主義各國的資本關係，於是在產業上，尤其是在農業上乃有相對的過剩人口之出現。說起來中國人低度的生活標準，並不是由於中國人的生理關係，而爲此相對的過剩人口所造成。自然，中國人傳統的生活方法對於此低

度的生活標準也是有關係的。但是此種所固有的傳統的生活方法，果是由什麼以造成的呢？則說是由於中國固有的地理的關係，毋甯說是由中國的社會組織社會制度以來，而帝國主義各國的資本，則爲使中國陷於混亂狀態的。至使中國常在此混亂狀態中者，則爲此相對的過剩人口。軍閥不過是此等關係的影子，軍閥間的爭鬥則只是世界再分割的戰爭之一前哨戰。這是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便可明白的，所以中國的統一，是帝國主義資本的統一，『不論中國在如何的名義以得到政治的獨立，結局是仍不免於外部列強之一的實質的支配的。』

在中國，帝國主義的資本關係表示的最露骨的，便是中國的農業狀態。所以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預測中國現在及將來唯一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這也不只是中國，凡是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全體，這都是共通的條件。本篇爲 L.

Madjar 所著 *Die Oekoomik der Landwirtschaft in China* 之譯文，便是由此意味以譯載的。本文初載於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mus Jahrgang*

III Heft Nr. 1, Feb, 1929. 茲則據社會思想六七月所載而重譯。

一

要想研究中國的農業問題，則不論在理論上，實際上都要遇到非常的困難。理論上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對於前資本主義時代之社會構成的完成，沒有全面的理論。馬克斯主義的創始者雖然對於資產階級社會有周詳的分析，將其法則與發展的傾向教給我們，但是關於前資本家的生產形態、前資本家的社會形態，則我們所有的只是馬克斯、恩格爾、普來哈諾夫、列甯等各個的意見。這些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家，對於亞細亞的、古代及封建的生產形態，却不如對於資本主義那樣有全面的研究遺留給我們。

據馬克斯的所見，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東洋的社會」，及「亞細亞的生產形態」。馬克斯謂太平天國悲壯慘澹的無結果，是因為沒有新原則而仍是在全然亞細亞的社會範疇之內，以與滿洲政府之「亞細亞的專制政治」相抗戰。這是我們所知

道的。馬克斯又謂此東洋的靜止的社會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糾紛，是一個絕望而執拗的糾紛，以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告終局。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八九〇年，恩格爾已既確言此勝利，以此為資本主義沒落的一根源。自然，我們若欲把農業狀態視為全社會體制之一要素，及歷史過程的結果而加以研究，則必須以馬克斯及恩格爾的意見為出發點。但是於此，我們就得要問，馬克斯及恩格爾所謂『在東洋的社會』，在亞細亞的生產形態之下，究竟是什麼意思，並且由什麼以分別此社會的體制與古代及封建的其他前資本家的社會體制。

前資本家的社會構成之區別的基準，在貨幣及商品的効用上，在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重要上，在村落社會或宗教團之存在上，在商業及手工業之組織上，都是不能見到的。一切前資本家的社會組織都有貨幣，但是經濟却根本不是貨幣經濟。雖然有商品，也有商業，但是生產却根本不是商品生產。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在各時代不同的國家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這沒有造出什麼社會構成，也沒有決定，反而只是破壞。根特、村落或宗教團體的存在，同樣不是各種社會構成區

別的基準，因為這樣的團體，即在封建制度，亞細亞的生產形態，或古代社會，（對於都市國家形成廣汎的地方僻遠之地），都是有的。這樣的團體，無疑的是爲亞細亞的專制政治作廣汎且確固的基礎，但是我們若不知道其作用，那末關於東洋的社會結構，便將一點也不能說明。不過他方面，亞細亞的社會，決不是單由各種團體所能說明的。工業與農業的結合，在一切前資本家的社會構成，也不是特質的事物。無疑的，奴隸制度正是由此以區別亞細亞的或封建的社會，是古代生產形態的主要特質之一。在東洋的，因之是封建的社會，奴隸制度亦以某種形態而存在，但這不是基本的原則，在此等社會構成上並沒有決定的、且確定的烙印。至在地租形式則亦幾不能認爲歐洲及中國中世之根本區別的標準。歐洲的封建制度與中國的社會體制的區別，在歐洲，領主即是地主有土地財產的，但這樣的土地所有，在中國却沒有。這種說法以及謂歐洲一般是勞動地租（Arbeitsrente）東洋尤其中國一般則爲生產物地租（Produktenrente）這種說法，亦不甚妥當。因爲在歐洲，勞動地租與生產物地租實俱有存在，同時在東洋，則在各國或各時代，其他形式的賦役，

也有很大的作用。亞細亞的生產形態，在東洋各國，表示着種種變化與變更，這說法是全然正當。但是關於這點，馬克斯及恩格爾業已說過。這與亞細亞的生產形態在一切東洋國家，一切歷史上的時代都無其存在，同樣是全然正當。在近東，土耳其模倣歐洲的封建制度，而在日本則封建的秩序直繼續到十九世紀中葉。但是封建的秩序，在各國雖然在資本主義，在資產階級社會，沒有純粹的形式，實際上也是以種種的變化而繼續。普通無論那個社會構成都含有過去的殘株與將來的萌芽的。然則區別亞細亞的社會的標準到底在那一點呢？馬克斯曾經說過：

『(一)公的各種勞動是中央政府的事務，(二)此外在全國除二三比較的大都市外，是完全具有着各別組織，而自身形成一世界的村落團體，分散各地。』

恩格爾對於第一的事，曾說明如次：

『人爲的灌溉，爲農業的第一條件，是團體、地方或中央政府的事務。』

至於後者，則我們由此可以說明土地所有制度的形式與社會的內容，在此等國家，何以與西洋的農業狀態全然有別。據馬克斯的所見，在東洋，一切農業狀態的

基礎並無私有的土地所有之存在；在那裏，國家便是最高的所有者。他以爲古代世界古代社會中自由的私有財產之法律觀念，是最初出現於此組織的社會構成之分解時代，即與近代資產階級社會資本家的生產形態之發展共出現於世，『在亞細亞，這不過是到處由歐人以輸入的。』自然，這意思並不是否認私有的並團體的所有及土地有這樣收益的存在這事實。馬克斯關於這點也會論及。但是自由的私有土地財產的觀念，一般亞細亞的社會，尤其是中國都是同樣，在各國所行的組織的社會秩序之分解時代開始出現。馬克斯這個主張，與下之二事實，並非矛盾，第一即中國自耶穌紀元三世紀以來私有的土地所有，已有其存在，第二土地是往復集中於收受地租者，或者說得確切點，是集中在地主之手。不過中國地主的土地所有，不是封建的土地所有，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封建中國的土地所有，從其起源已與封建的土地所有有別，因爲這是商業及高利資本對於土地之私的或團體的收益的影響之一結果。故其缺乏領主的權利，缺乏農奴制的要素，以及沒有土地所有階級的身分的孤立，到底也是與封建的土地所有不同的。土地所有不是個人從屬的結果，

也不表現通常土地所有者與像土地之附屬物樣並和土地結着緊密關係的農耕生產者間之個人的非自由的關係的。但是這事情，其意可決不是這樣即爲商業及高利資本家的根源之土地所有者，比封建的領主不向農民榨取更多的剩餘生產。中國的土地所有者正因與亞細亞的社會的拘束或傳統相一致，乃與資產階級的自由私有的土地所有不同。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與中國中世的土地所有間，有二個社會構成的區別。關於這點，若欲對馬克斯所言有所改正，則由中國過去的強辯曲解，必將更危險的惹起對於中國現狀的曲解。

因此之故，欲求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採取馬克斯之所論，即以中國爲有東洋的社會，亞細亞的生產形態之存在者。但是單由這個論據，我們不能即以之解決近代『中國之謎』。因了商業資本及高利資本，其分解作用，實及於中國的社會構成。這對於舊社會，初不能於其上安置什麼新的，與舊社會原則的不相同的社會秩序，而將舊生產形態加以破壞。由此，一部份中國的循環運動，以及趨於滅亡的專制政治之王朝，雖被破壞，却毫不樹立新原則，而惟再造相同的亞細

亞的專制政治，再讓其道於商業資本及高利資本，由過去的許多農民暴動，我們實可以明白。無疑的，『中國之謎』之解決，即現在農業關係之解明，其一部分實在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對於東洋的社會的影響中，雖然這不是完全的。因為中國已既進入國際的商品交際中。由大砲，戰爭，收買，鴉片，威脅，粗織物，鐵道及大洋航船，軍費及國際借款等之力，中國在世界帝國主義之組織中，已成爲商品販賣市場及原料供給地。現在這正以暴行，數百萬民衆無限的痛苦，數百萬農工商及苦力之頹廢窮乏，數百萬勤勞的中國人的死屍，而向此路以進。資本主義固有的法則，在中國開始了活動。機械的大工業亦在這裏開始。所以當中國成爲投放外國資本的地域，當各國對中國確立起資本輸出的時候，這個過程，便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這樣使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趨於完成。但是同時也爲此發展的阻礙。於是民衆遂不得不由『永遠循環』的內部的矛盾，以向革命求出路。

這便是研究中國農業問題之基本觀念的一般的輪廓。

一般人屢說中國不是一個國，是一個完全的大陸。所以在『中國大陸』不只是農業生產之自然條件不同，其各地方的社會關係亦以有種種的殊異，使農業問題之研究非常困難。就農業生產之自然條件言，如氣候土地極似蘇俄極東地方之滿洲與內蒙，實與黃土地及特殊氣候的北部中國，自成一非常殊異的領域。即如中部及南部中國，其土地與氣候，亦與北中國不同。在中國，灌溉實是農業生產之決定的條件。中國新疆是一種沙漠肥沃地灌溉農業 (Casen Bewässerungswirtschaft)，滿洲的收穫是一年一回，北部則二年三回，中部每年二回，南部三回，且同一期間可收穫四回者亦甚多。灌溉地之收穫量，比之同一地質之乾燥地，常可至二倍或三倍以上。北部黃土地，土壤肥沃，在普通的氣候狀態下，幾於不必施肥。反之，在南部則若不施肥，即無收穫。又在南部若無水量周到的調節，亦不能種植。在滿洲內蒙則人為的灌溉，現在居其從屬的作用。

這些事情若不加以考慮，則農業經濟的研究，便不可能。

惟研究中國農業問題有一大實際上的困難，即在中國，如資產階級國家那樣精細的統計，實全然無有。中國政府雖有統計，但全然是無用的。若把政府的報告仔細加以觀察，有些地方之耕地面積，則由此報告，竟大於全面積二倍以上；而統計要覽中在這一頁所載之耕地面積，竟有比其在次頁所記同一地方之耕地面積，大至二倍或三倍的，並且常有一地方的耕地面積，經過了一年增到二倍以上的，而過了二年，又減至一半以下的。所以我們對於那些關於全面積，耕地面積，及全國面積與耕地面積的關係的不確實的報告應有斟酌。又關於中國的人口數，我們也是完全沒有報告。由種種方面所引出的數字，是完全不足憑信的，中國的人口，據統計學者的主張，自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在這期間實未嘗增加，反是減少的。這因為國內經濟的並社會的關係之一的危機，天災、戰爭、暴動，都是使人口減少的。我們不知道中國的人口究竟三億萬四億萬，還是五億萬？而都會與地方人口的關係，我們也不知道，不過全人口的百分之八五至九〇是可以推測係生活於平地的。

同時關於各種的職業統計，我們也沒有，不過全人口的百分之七五至八〇，我們可以測定是從事農耕或以農業爲生活的。最後與資本主義之發展相關聯的都會人口的增加或減少，是由地方人口造成，還是反之地方人口之增加或減少，由都市造成，這一點，我們也不得知。在印度，我們知道從事農耕的人口是相對的增加，即地方人口在爲都會人口之負擔上而增加。在中國如上海香港大連奉天天津這幾個大都會人口增大，而同時北平蘭州西安等都會則人口減少衰落。這兩個傾向，到底是那一個強，我們也很難下斷語。在滿洲及內蒙，其植民過程，竟比昔日西歐諸國殖民北美或加拿大沿着鐵道以可驚的速力促新都市之出現樣還要迅速。但是不只中國的都會，實則一般的，凡英美日本的都會也是犧牲了中國村落而增大的。帝國主義在其都會人口的增加是由地方以造成這意義上，不變更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反之，這法則是因此擴大其適用的範圍——即帝國主義本國的都會，以犧牲殖民地並殖民地的村落而增大。不過中國自己資本主義的發展，亦更變中國都會的特性。以前，中國的都會是行政廳所在地，商業及工業之集中點，但是今日則有三種相異的都市形

態。官僚的，手工業的，商業的色彩之舊中國都會，商業洗去了都市之官僚的特色而爲龐大的商業中心地，同時發展的機械的大工業則在都市的特色上押上決定的極印，而成爲工業都市。中國的都市，同樣與印度的都市有一主要特徵，這不單是租稅，由非等價交換（商業），由高利以自村落取得剩餘生產物，且流入都市的還有地租形式的事物（因爲地主大都是住於都市）。

但是我們近代的統計學，則關於都市關於村落，都沒有多少可以信賴的正確的報告。

三二

我們在研究農業狀態以前，對於中國的農業，有二三個特性應該知道。

（一）無疑的，中國農業之根本的特色是灌溉農耕。其人爲的灌溉所演的作用，實足決定全經濟的特質。川湖池塘等等，是給水的源泉。由此，決定中國的文化根本爲一里勃亞利安人文化。故在一方爲謀農業之經營與發展，龐大的灌溉設備並防

止氾濫的巨大的河川修濬事業成爲必要的條件。但是這事情，在必要的勞動之社會的組織，歷史的過程之經過中，實成立了由一般的從屬者而爲主者的一種水利及土木官僚政治。人爲的灌溉之不可缺的是地表的平均，設地段於山之傾斜地，及講求乾燥的方法。由此設施，於是出現與土地合體的資本。土地這樣由『土地要素』——若用馬克斯的話——變爲土地資本。而獲得此資本利子的則爲地主。但是由人爲的灌溉，亦造成差別地租之新形態，即馬克斯所謂水利地租 (Wasserrente)。因爲各個農民經濟，要創這樣的設備不單是不可能，且欲維持其爲有效的狀態，也是不可能。於此國家權力之有機的干涉遂爲必要。但是國家的衰落，戰爭，及經濟之一般的恐慌，實破壞灌溉及排水設備的體系，結果致農業文化最重大的假定亦陷於破滅。基本的損害，益益頻繁。龐大的，從前豐饒的土地則變爲沼澤，可資灌溉的耕作面積因以減少。在印度日本朝鮮埃及等，灌溉是大規模的，且以技術進步，貯水池之設備，鑿井技術的完成，故灌溉的面積能不絕膨脹。但在中國，水利經濟却不斷的衰落。中國農業的危機，其最重大的原因實在於此。

(二)除了滿洲及南部二三部分的地域，在中國幾於沒有森林，因之亦無林業，尤其北部黃土地方，森林之斬伐，是廣汎的行的着的。因森林的砍去，於是在一面引起氣候的變化。而其採伐，又是不規律的。本來沒有適當的濕氣之黃土地，以此遂開始喪失其自然肥沃的特質。這樣，在北部也是以人為的灌溉為生產之必然的前提條件。因為森林的砍去，於是使水災氾濫的危機增大，並且更為頻數。欲救此危機則惟有於其地再植林。但是各個農民經濟不能擔當此事。在這裏，國家權力之有機的干涉也是必要。但是政府却不着手再植林。反之，把從前森林富源之最後的殘餘都全數賣去。如北中國，森林之斬伐日益加甚。這也是中國農業危機之所在。

(三)在土地上照例應該加補所取去的資料養分。中國的農業經濟，此根本法則是具有完全特別的意味。即在中國，因為是每年一回或三回甚至四回的收穫，在同一耕地上，所以土地的施肥，自昔即為中國農業之中心問題。在中國，用作肥料的，幾於廢物利用，可說達於極點。如人糞，泥灰，砂屑——一切都當作此用。而非常發達的輪栽耕作，則利用綠肥使土地的豐饒，得以確實回復。雖然，人是饑餓

的，土地亦不免成爲饑餓。這樣，村落與都市間的非等價交換，遂表現而爲由村落以向都市的價值的流出，都市之所殘餘於村落者無非渣滓，致土地枯竭置於放任。帝國主義便是這樣在中國與世界市場之間，行其不斷的集中的非等價交換。中國以豆、豆餅、植物油等 forms 的事物，出賣其土地的豐饒。這當中，還有租稅、地租、及高利子等，從村落奪了許多的價值以去。在這樣的過程，當然造成土地的涸竭。這樣的徵象已在許多地方明白表現（如直隸山東湖南等），因此，引起了大饑饉的到來。

（四）中國經濟還有一個大的特徵，便是在中國，家畜（蒙古及新疆地方除外）只當作使用及輓引獸，而不是爲的屠殺或搾乳。除了豬或家禽之飼養，在中國也沒有把飼養家畜當作農業的特殊部門的。因土地利用之集約化與分散化，使家畜之利用，利益日以減少。因爲利用家畜一年之間日數不多，而戰爭，徵發軍需及家畜的瘟疫，使家畜的產出及蒙古地方之牧野縮小，這增大了中國牧畜業的危機。

（五）在中國，農業技術及農業化學領域內的革命，尙沒有一般的發生。雖然在蒙古，在揚子流域曾有近代的設施，並且到處有改良種子的試驗，還有單獨使用人

造肥料的，但是大部分的農耕技術，農業生產方法，其狀態依舊與二千年前相同。反之，因為農業的破壞地方頗多，舊式之犁全然不用於耕耨，而因人間的勞動力比較獸的勞動力更廉，平地上許多相對的過剩人口，遂被代着家畜作種種送的事。農業資本之低等的有機的組織，在農業技術比較的高之勞動理解力下，以利用巨大的人間勞動力為條件。手工是中國農業最著的特徵之一。日本朝鮮印度菲律賓等國，其人為的灌溉及改良種子的利用，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多，惟關於這點，則酷似中國。

由我們的見解，這便是中國農業生產最重大的特質。不過還有要附說的，則如苗床栽培，休耕地之不足，用手插秧以代單純發芽，及人為的灌溉與應用施肥方法之需要許多勞動等等。

四

在中國農業事情的研究上，足以為特殊題材的滿洲農業事情，則大概可以分為

北滿洲與內蒙古兩部來觀。在此等地方，植民過程還是繼續着，其進展，恰以北部地方衰落相同之度而促進。這便是說，中國這個『自由土地基金』早已不是自由了。這已預爲督軍、官吏、商人、高利貸及其他投機業者所占有。昔日的自由土地，現在却一變而爲私有財產。地價及租金繼續的騰貴，土地利用之集約化，因以日增。商人及高利貸者之權力是很大的。在內蒙古，這個過程，便是旗的氏族財產，現在轉化而爲蒙古諸王之私有財產，而此等王公的土地財產，則隨即移轉於中國高利貸者，商人及土地投機業者之手，所以境况更爲慘酷。蒙古的牧畜業是被追迫入不良牧場，但是良好土地的中國的移住者，則亦常有政府殖民官形式的中國高利貸者，商人及土地投機業者覬覦着他們。

五

凡此問題的批判，屬於本論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擬就關於土地所有的形態與特質，借貸關係，賃銀勞動，土地及江河湖沼的權利關係，以及地租之形態與

特質來加以研究。凡此等問題的解答，當然足以決定中國農業狀態上究竟有無前資本主義的殘株，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果否有從前資本主義的殘物中蛻化出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之能夠解答與否，則對於中國革命的特質之正當決定，實甚有關係。

中國的實在情狀，到底給此等問題以怎樣的解答呢？在中國，我們還可以見到有領地、國有地、村落社領地、『旗領』（在蒙古）及屬於國家的所謂草茫地（*Sc-hilflander*）僧院地、收益歸於各種機關所有的寄進地、並視為屬於國有的_三積地。此外，在中國，還有所謂氏族財產的存在，此等土地在理論上是屬於祖先的祠廟，其由土地租賃所得的收益之一部雖分配給氏族的協力者，但過分的利得則多為族中即所謂劣紳者所有。這種氏族財產，在廣東廣西福建貴州地方實占所謂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〇至五〇。至在異族的征服者所居的地方，則氏族的領袖，在氏族財產之下，恰如半封建的小諸侯。而此等關係，無論如何是與資產階級社會之農業關係，絕不相似的。這是由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影響於東洋社會的農業事情的結果而發展以成的。但是私的土地所有，及私的土地利用，固已變而為私的土地所有權，我

們仍可看出其非資本主義的種類之關係。在中國，還有所謂「團體的土地所有」。中國最多的也是所謂「永租契約」，依據規約，土地所有者若佃農能按期納租，不能收回其土地。不過同時亦有一種佃農欠租不交的罰則，許多地方有債務奴隸的存在，中國的賦役勞動，固然很明白的沒有什麼重要作用，但生產者地租，換言之，即前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者地租，實是占其優勢。而為生產者地租之金錢地租亦頗有發展。至分益的佃農，則如列甯關於黑人分益佃農之所言，是一種「半封建的，經濟上的半農奴的佃農」，實為佃農的中心部分。現在其發展的傾向，是向着土地財產並借貸關係之近代的形式之創造而進。本來「永租契約」是常期的，但現在常期一變而為短期，而以比例計算的生產物地租，則變金錢地租。但是借貸關係之經濟的內容，則大體上還不是資本主義的。中國的佃農，可說完全不是收得資本利子，企業者利得及勞賃的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反是由於必要，其利得、利子及勞賃之物理的最少限度之一部須歸於土地所有者，他們實是這樣的佃農。

在土地及水利權關係之範圍，同樣我們亦可看出水的共同利用上之團體權，與

土地所有者奪取水源地的鬥爭。在許多地方，貧民還有拾取落穗的權利。而爲人頭稅、地方稅及地賦的合體的租稅。實爲表示着東洋的社會特性，具有一種地租課稅（Rentensteuer）的特長的。故其租稅不是資產階級社會之目的稅（Zwecksteuer）。但此可不是否定在中國村落，土地所有之大農與爲農業企業者的佃農的一稀薄層，有所形成。不過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雖然有了土地得以自由買賣的新法律，到底還遇了強力的前資本主義的殘株，土地之買入，出賣，抵押，是同教徒的形式，而一部則爲歐洲中世所行者。

中國的土地，直到現在，還沒有掃盡前資本主義的殘株。由我們的意見，中國既無封建制度的存在，所以此種殘株決不能稱爲封建的。這東西正是東洋的社會組織之殘株。不過總說一句，中國的國土，還是在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之壓迫下。

六

本文的第三部分，要說明在中國村落中的階級分化問題。各種社會範疇中的耕

地的配分，我們是不能以此爲中國全體的標準，而偶然以得的研究的結果，也是我們所不能滿足的。此等研究，謂南部及中部地方，全耕作面積之五〇至七〇%，在滿州則全農地之四〇至六〇%係在租賃土地的地主之手。北部則農民所有雖較多，但土地之集中過程，實漸次併入商人、高利貸、地主及官僚手中。中國的農民，大概可以分爲所有者、佃農、及半佃農，但此決不足以表明村落之階級樣相，因爲此等範疇，亦是這樣可以分爲佃農、小農、大農。中國的農民不是具有統一能形成同質的集團的。在村落中雖有階級之分化過程，但此過程，亦以農業之衰落與生產力下降之度爲止。我們爲表示關於無生及有生資本，土地之收益能力，農業之收利力及勞動生產力之配分，應當對階級分化有明細的觀察一事，在這裏，要試其研究。賃銀勞動之利用在許多時候，雖不過近隣相互扶助的一種變形，但是在這裏，我們已可以看出賃銀勞動之資本主義的榨取，資本之賃貸，強大的農業之增大與弱小農業之衰落崩壞。關於各種農業範疇之收利力，由報告之所示，農業農民之五〇至八〇%是顯然在生活限度之水準以下生活着的。所以不論從那一點提出問題來，中國

村落的中心都是貧農，是竭其勞動力以事農業而不免於饑餓困窮的赤貧者，這是顯然可以看出來的。由農業之集約化與分散化，中國農民在其自身的農業上，至僅有每年六十日或百五十日的勞動。而由外國商品的輸入，及中國自己機械的大工業之發展，實破壞田舍之家庭工業。然賃銀勞動，工業的季節勞動，家庭勞動及運搬業的收入却是很小的。

所以農民的失業，對於鄉村的打擊是非常之大。而地租、商業詐欺、高利貸利子、天災、農業經營的條件之惡化，實使階級的銳化更爲促進。由此之故，使中國村落，發生下的過程。即土地所有是急激的集中於地主商人高利貸官吏之手，而緩慢的集中於自行耕種的大農之手，同時，自耕農變爲佃農，農民的耕種則以非常的比例，分散化，零細化。階級之分化不絕進展，貧困成爲此過程中的主要特點。從生產過程中被壓迫出來的貧民，現在成爲賃銀勞動者、苦力、工業的無產階級，而生產過程之所引用者，則到底不過衰落的農民之極小部分。其殘餘者則流浪外出，移居滿洲及內蒙，或應募爲軍隊的兵士，或入山林爲盜賊。因爲不如此，他們便只

有餓死了。

這樣，農業的危機成爲農民的一危機。不過巨大的農民大眾的凋零，同時却並沒有工業的均衡的成長。工業不能吸收衰落的農民及手工業者。盜賊便是由這根柢以發展來的。在這根柢上面，從生產手段解除出來的勞動力，成爲到處賣其苦力的一階級。這個階級中人，在日本，有工業以爲吸收，而在印度中國朝鮮安南則爲革命的動力。

自然，在這裏，我們不能用數字來表示此過程的特質。並且，我們的研究還不能不利用資產階級的參考書的材料。但是即此資產階級的參考書，已足說明農民大眾困窮痛苦是如何的可驚了。因爲絞取地租者實不是大地主（在中國是比較的少）而爲小地主，所以農民的狀態，不能改良，反愈陷於惡劣。這是因爲小田紳比大田紳是更凶惡的榨取者的緣故。因爲小地主的優勢是比世界任何國家（除了印度的二三處）更緊密的存在於商人、高利貸、官吏與土地所有者之間，所以必然的使土地階級鬥爭更爲激烈。加以中國的土地，是比比利時美國印度及日本更要多的價值。

在美國，農業勞動者一月的收益，儘足以購買一英畝的土地。但是中國的傭工，則一年的工資實不達一畝土地之價。因此，不論那樣的改良都不中用，只有革命，纔能解決農業問題。而因農民在土地鬥爭上所遭遇的是對多數小田紳，及與土地所有相結合的許多商人、高利貸、官吏之絕望的抵抗，所以亦只有勞動者階級可以立於土地的農民鬥爭前面。

七

但是中國的農民，不單是由地租及租稅的絞取而被榨取的。無論就普通或就中國所特殊的以言，中國的農業經濟，若不自其與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結合以觀，到底是不能理解的。總之，在國民經濟一切，在中國生產組織之一切上，我們都要遇到高利貸資本。如村落中之小土地所有與小耕種，都市間手工業的小生產，國內資本的缺乏，蓄積的資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盡量吮取，貨幣經濟之增大與深化，妨害單純再生產常態進行的天災，傳統的慣習，以及後退的分散的，彼此間殆

無聯絡而爲部分的市場之前資本主義的特質，因了高利都如雜草之繁茂成爲廣大的根柢。而在商埠貿易之地，則與外國銀行有最緊密的結合之國內銀行及當舖，亦極繁盛。但是當舖之在中國，實不止爲一都市機關，凡普通地方亦有存在。不過在完全爲高利貸領域的村落，當舖可並不占有優勢，反之，勢力最大的還是個人的高利貸。如在佃農間則爲商人，在專行借貸之地則爲營高利的鄉紳。高利貸若爲商人，則同時爲土地所有者；同樣，土地所有者而營高利貸則亦必爲商人。質言之，商人是由高利貸以爲土地所有者的。官吏把榨取農民之三形態具於一身，此外還要加上由租稅關稅公課等以來的財政的立法的掠奪。土地所有者、商人、高利貸這三種形態，便是這樣造成的。自然，關於利子標準，是講不到的。因爲中國的經濟，即在商業方面，其利子標準，也還沒有達到成立爲國家標準的發展階段。在村落間，高利貸的利子『標準』，是上下於二成四分至三成之間。尤其是高利，當其以生產者借貸的形式而行時，實採取了一種冷酷的形態。高利資本在技術改良並商業改良之範圍上，具有特別的力而努力着。而狂暴的租稅則使高利貸者之權力更高。至高利

貸到底是怎樣把印度日本朝鮮及中國的農民經濟操於掌握，則說起來，我們儘可以說全農民經濟之半以上是陷於高利負債，這樣亦不爲過。於此，其最重要的現象之一，那便是無疑的，外國資本由國內銀行，由中國的商品分配網，以高利資本的形式而侵入中國農民經濟一事。這樣，遂造成了外國資本與中國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資本的聯合。

我們若對於高利資本與外國資本相結合的作用不能明白，那末不但中國，凡是一般殖民地的經濟都將不能理解，這一點是我們要特記的。因爲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世界市場之支配時代，商業及高利資本，不單是破壞舊生產方法，並且由小農小手工業者與其生產手段的分離，還爲新生產方法備其基礎。但是同時，商業及高利資本，有轉換爲產業資本主義的關係，這實是絞殺中國的經濟生活之矛盾之一。

八

中國的農業經濟，到底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問題，我們現在似無討論

的餘裕。於此，我們且引用中國各地農民經濟之預算數字，由這預算的分析，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供給市場的商品量，決不在四〇%以下，而此市場商品量，並且還表示着以極端的社會的集團而增加，同時貨幣之力則在農民之上益益增大。又我們若把記述鐵道、江河、海岸及海洋船舶之貨物運輸，各都市之市場交易，中國各商埠間的商品交易的海關稅報告，而加以分析，則國內市場是怎樣的趨於發達增大，深化，而流入非村落的市場之商品是怎樣的增大，凡此都可以確信了。同樣，我們由對於記述中國外國貿易的報告——惟一精確的報告——則由村落以流出外國市場的商品量，是怎樣無間斷的增大，我們也可以確信。惟此處的問題，是市場關係的發展，實不在證明其存在於中國，而為到底是怎樣，並由怎樣的條件而此市場乃趨於發展的，並且中國市場是具着怎樣的特質，我們對於這些應有理解始可。我們若以此觀點來把問題加以考察，則在中國殊尚沒有怎樣統一的國民的市場，而對於內地的消費所決定的商品價格，在部分的市場還多少獨立的表現着。並且，在此等部分之市場，中世的商人基爾特仍具有相當的力量，具有相當巨大的影響。此外

如租稅、公課、厘金、市場佣金占着商品價格不相立的部分；而在各種季節有可驚的價格的上騰；田舍價格，都市價格與世界價格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在中國市場還殘存着爲前資本主義的關係所強制支配的事，凡此一切，我們都可明白。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想由課稅制度的改善以促進統一的國家市場，國內關稅，並貨幣本位及財政制度之創設，此等努力，恐一時仍無結果。故此純然資產階級的課題若欲求其實現，則顯然惟有待之無產階級與農民了。

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是當着一切障礙以發展的，而世界市場之力則又不絕以中國農業而趨於成長。如技術並交易上之改善擴大；新文化之採用及舊文化的排斥的傾向，都現實的有所表現。世界分業，其在中國是更積極的趨於明顯。試舉幾個具體的例證，以觀察此傾向，則如德國化學工業之發展，致中國的藍靛種植完全爲所破壞，又如以甘蔗之栽培及爪哇台灣古巴之製糖工場，使中國的甘蔗種植趨於衰落。但是反之，滿洲成爲豆的世界市場之主要供給地，而落花生及其他含油的果實栽培，亦頗有發展。同時，棉花、桑樹、甘薯的栽培亦甚興盛。將來若以美國的

競爭，當然要惹起棉花栽培的危機，而桑樹栽培，現在正與育蠶的危機相關聯，遭遇着重大的危機。我們這樣可以看到各種栽培的區域化，及爲一定栽培的各地域之特殊化。然而同時還看到地方的生計表是怎樣成爲受動的；農業對於發展的工業是怎樣已不能爲其充分的原料的基礎；煙草、甘蔗、米、小麥粉等等的輸入是怎樣的增大，並且怎樣由比較良好的食物向不良的食物，即從米以至馬鈴薯的移動以行等種種現象。質言之，農業國的中國，現在反不得不輸入生活資料及原料了。貿易表是益成爲受動的。國內的不足，只能由僑民的寄回的金錢，即由勞動力的輸出，以在某程度內，抵消中國向外的資本輸出。

同時，我們更看到由農業生產物輸出之增大，精製工業的發展大有必要。大戰時運貨稅率的提高，促進生活資料，煙草、油及蛋白質工業之發展。而織物工業的發展，實與棉花栽培的發展以強力的刺戟。煙草製造工場，則以商人居間的契約，使烟草栽培趨於發展。而茶之輸出則使製茶因以發展，絲綢之輸出則使絲廠內繭之精縲大有必要。資本主義生產之內在法則，這樣使中國農民經濟革命化，惟因農業

技術根本沒有變化，加着生產的預想又是不利的，所以此過程的進行，實在非常困難。

九

研究中國農業問題，我們覺得還是把鴉片、茶、絲、棉花四種最重要的東西，來分別觀察的好。因為這都是在中國的農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的。

世界資本由鴉片輸入打破了中國孤立不與人通往還的狀態，二次戰爭，便是打開中國的門戶，以輸入鴉片。中國以銀換取鴉片，這樣馴致資金涸渴，財政陷於紊亂。鴉片貿易是開始金銀間價格關係之決算，使中國進於金幣的世界市場之一種手段，這事情，是很明白的。因了鴉片輸入與此破壞的毒害在中國之擴大，使中國到處流布着罌粟種植，鴉片的交易成爲軍閥藉商人以換取農民經濟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

以前，中國在茶之栽培上是具有獨占權的。可是怎樣英國的商業資本，在茶之

貿易上，獲得世界市場的獨占權的？英國的資本是怎樣在印度錫蘭的大農場造成茶之栽培的？而爪哇台灣並以後日本的茶，是怎樣在茶的世界市場上打倒中國的地位的？印度爪哇及日本機械的製茶是怎樣造成中國茶的危機的？還有以市場的喪失，中國的茶業是受到怎樣的破壞與衰落？凡此，都是我們所欲說的。不過由我們的意見，覺得危機的根本，便是因爲小農民經營，小家庭工業的加工业，不能與大農場及大工場相競爭對抗的緣故。於此，我們要注意的，則農民的生產費，實只茶葉價格之一成。茶的利潤，須與軍閥共分。至此外的九成，便是租稅及商人的利得，輸送與加工費用。所以中國的茶業，實是在非常困難的危機中。

我們由許多報告，因世界市場需要的增大，影響所至，中國養蠶事業的發展，似頗有望。但是，由事實所示，在農民經濟上，以繭之加工的發展，已不復成爲最重要的家庭工業之一。而由桑樹栽培及養蠶以得的利益，欲求增高，則實須有大部分商人之高利資本，且養蠶技術在中國農業是完全未經改良。同時，返觀日本意大利法國波斯等等，則養蠶事業俱有發展。這樣在競爭上，尤其在與第一線的日本的

競爭上，中國在世界市場中占其第一的地位卒為所驅逐。而以輸入中國漸次增加的人造絲競爭，又給與中國蠶業的最後以重大打擊。且不但養蠶業是這樣，絲綢工業亦完全是在重大的危機中。由這點以觀，日本的經濟實在也是被同樣的危機逼迫着的。

十

馬克斯及恩格爾，他們當在信札上考察中國經濟的運命時，對於機械的大工業，其力量是否已具有優勢，足以打破中國舊生產形態之原始的基礎，即農耕與農民家庭工業——紡織——之合體，加以注意。我們覺得這問題若由次的方法以為解說，那便可以明白。即我們只須攷察中國絲線生產之輸出入的報告便得。由此我們知道木棉在大體上已成爲機械工作而製造，並且農民對於棉織物的需要，大體上已由工場生產而滿足。至爲農民家庭工業的紡織事業，則其衣類生產之主要原料在木棉這個範圍內，實已趨於衰落。同時在織物生產之主要原料的麻，則農民的紡車，

雖爲工場的絲線生產所驅逐，但尙繼續存在。至如家庭工業之一的織物業，則由我們計算之所指示，織物輸入及中國的工場生產，大概約當織物需要之二成以至二成二分，因此之故，農民之織物業，雖有工業的競爭，尙能頑固的存續着。不過把這問題若更加以詳細的考察，則須知舊式的農民的織物，現在已變化而爲資本家的家庭的工業，大批收買者已支配了農民的生產，家庭工場不論在都市或田舍都有發展，資本之侵入於此生產方面者，實已完全的把這支配着了。同時，生產的技術，亦有顯著的變化。舊式的機械，在村落中現在改用近代的木機，甚至亦有用鐵機設立大製造場的。這樣，在近年，機械的織物大工業也是比較急速的發展着。

農民的家內工業，因了嚴酷的資本家的榨取形式，卽近代的家庭工業而被推翻置換。家庭工場及工場漸有發展。舊生產形態的支柱是這樣被動搖了。因之，中國農民侏儒經濟的基礎亦爲所動搖。在一方面，村落之全社會的並經濟的樣相，發生了轉變，而在都市則由新發展的工業，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卽近代中國的無產階級，於是這樣，全中國社會之社會樣相，遂發生變化。

十一

研究已漸到了結末，我們現在要就生活的第二資源，即運搬者的事務及在勞動力之販賣與農民經濟上家庭工業的任務其意義及有特殊重要者，一加略述。關於這方面的中國的農民生活，要有多少或完全的說明，實非常困難。自然，此等收入的根源，在貧困的，同樣在富裕的農民經濟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如編物、刺繡、還有織編草帽、製扇、花邊等等，在家庭織物之外，無疑的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許多地方，則至滿洲及南洋羣島的季節勞動，在農民家計上，亦占重要地位。他如至城市謀生，或為運輸事務，或至油廠，陶器廠作工，凡此都是支持中國農民的家計的重大事情。而農業及運送業，絲織物業，毛氈等製造上的賃銀勞動，則亦為農民經濟重要收入之源。不過殘屑與燃料的採集，還仍是農民根本的「副收入」之源。農民之失業，在村落間，依舊是未解決的生活問題。

以上所述，便是中國農業經濟的特徵。自然，我們的意思不是說中國革命能夠對此中心問題解決無遺。反之，我們不過提出最重要的幾個問題，表示現在毫無解決辦法而已。因此對於全問題實需要更廣更深的研究。我們覺得對於地方全問題之特殊性，尤其我們所沒有研究到的，應該特別注意。我們對於中國的特殊性，很明顯的，是應更進而研究，直至得到多少明確的證明。

在這經濟的根柢上，阻止着中國村落階級鬥爭之發展的，一方面乃是地主、商人、高利貸、大批買收者、官吏等，凡在集合名詞紳士(Gentry)之下可以綜括起來的，還有從紳士分出領有地產的土豪，也應加入在內，他們都是由中國專制政治的成分以立足，並以此為根據的。同時阻止階級鬥爭的發展的他方，則有農民，惟此農民由許多層以成。在中國村落，向有大農。大農在其向地主租借土地時，他也時常要受到苛稅的壓迫，即財政管理上的掠奪，在這裏，他是可以進而與地主相對抗的。但是大農同時也是高利貸，其利益只限於自己土地之租借，故農業革命是與之相衝突的。農民的大部已迫着飢餓為貧窮的農民及赤貧者了。農業賃銀勞動者在村

落中或一時不占比較重要的地位，但是若與苦力相結，則其所展開的階級力是值得注目的。據我們的觀察，大概中農與通常的貧農常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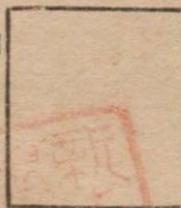
中國革命使巨大的農民大眾發生變動，都市的革命運動則使農民醒覺。故我們這裏所考察分析的農業關係，其在歷史的記錄上將不久即發生變動，這是可以確言的。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譯者

樊

仲

雲

發行處

上海法租界霞飛
路霞飛坊十九號
新生命書局

印刷所

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三六號
倉頡印務有限公司
電話北一五二九

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改編再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74192

